

Nuestra Huelga

我们的罢工

1966.11.30-1967.5.17

一场长达 163 天的，反对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由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出版

1968 年初版，2018 年重版

译者：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Nuestra Huelga

我们的罢工

1966.11.30-1967.5.17

一场长达 163 天的，反对西班牙法西斯资本主义的罢工

由埃切瓦里班达斯轧制工人出版

1968 年初版，2018 年重版

译者 余君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2021 年）

致半岛上所有城镇的工人，他们的声援让我们坚持了下来，也致学生、神父、教授及各社会地位的人，他们同样也为我们的事业提供了帮助。

致那些为了解放所有国家的被压迫者——我们希望自己的战斗也属于这场运动——在全世界无论何处战斗着的人们，尤其是英勇的越南人民，以及南美与非洲的所有革命力量。

致我们的父母和在斗争中先我们而去的人——他们已经死去、被流放或是已经退休——致他们以崇高的敬意。

致我们的孩子。¹

¹ 本段附有巴斯克语版本。——中译者注

目 录

中译者序.....	1
第二版五十周年序言.....	6
前言.....	14
第一部分 罢工的历史.....	18
我们的公司 它的特点 三年的斗争	18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41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65
审判后的抵抗	82
罢工结束了 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	109
第二部分 一些基本方面.....	113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113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122
技术人员的做法	146
官方组织的态度	165
我们的罢工是否是政治性的？它是由谁组织的？	185
第三部分 思考.....	195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195
给大学生的思考	217
后记.....	226

中译者序

几十年来，中文世界对于战后工人运动所知甚少。但我们至少可以引进国外的经验，从六七十年代革命浪潮的成功与失败中学习，为今后的斗争指明方向。我们要做的，是将阶级斗争的火种保存下来。只有阶级斗争才是可行的道路，工人阶级必将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而这本书的故事正是工人斗争的典范。埃切瓦里班达斯的轧制工人在没有任何政党或政治组织的领导下，凭借集体的意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实现了弗朗哥独裁时期的伟大壮举，实现了一场当时无法想象的 163 天之久的罢工。它也是独裁时期最长的、最精彩的一场罢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班达斯罢工教育和鼓舞了七十年代的西班牙工人运动浪潮。

正如前言所说，这本书是由工人自己写下的，关于他们罢工的历史。它蕴含着工人们朴实的情感与意志。在翻译的过程中，工人们的团结与声援活动也让我深受感动。

我们对书中讲述的故事可能不会太过陌生。班达斯在那些年里赚取了丰厚的利润，而生产出价值的工人，拿到的只有微不足道的工资。按照汇率来说，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我们能直观地看到班达斯工人的境遇。书中提到“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 10 亿比塞塔……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 25 亿比塞塔”，然后是“到了 1962 年……(每位工人)所有的收入……每月不会超过 2500 比塞塔”、“在 1962 年的巴斯科尼亚罢工中，人们发现有 212 人的年收入少于 22000 比塞塔”。在罢工发生前，管理

层想尽办法不给工人签协议，不肯在经济上让步；克扣工资，提高工作量；故意对工人的要求置之不理。而后，工作条件和待遇上的恶化变本加厉，最终引发了这场罢工。

战后资本主义繁荣、产业转型以及弗朗哥国家为进入世界市场而进行的改革，也为斗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它也是六十年代工人运动的高潮，在西共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工人委员会”陷入危机后，从班达斯罢工（1967）到哈里·沃克罢工和勃兰索尔罢工（1970），工人阶级自己领导了斗争，检验了新的组织形式与斗争策略，这些尝试点燃了整个西班牙，热火朝天的斗争在七十年代蔓延开来。从西亚特、洛卡到巴塞罗那港口，曾受左翼政党束缚的工人阶级，用自己真正的力量对弗朗哥国家予以痛击²。

当然，还有一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也格外熟悉。当时西班牙的社会氛围是保守的，文化也受到了不断的国家压制。但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暗潮涌动。同时，西班牙工人遭受着严厉的镇压，也没有属于自己的阶级工会。尽管他们在国家面前好像束手无策，但还是充分利用了一切斗争的可能性。

因为斗争仍然是可能的，没有什么能够阻挡群众前进的脚步。况且西班牙工人当时面对的是比今天中国工人更不利的条件。在反抗中，工人们发现了自己的力量，发现了自己有反对一切残暴、无耻和不平等的力量，反对这个建立在谎言和神圣规则上的社会的力量，他们在斗争中感受到自己成为了生活的主人。他们让资本主义及其镇压都变成了笑话。资方使出了全部典型的手段，对工人用尽了浑身解数，甚至调动了国家机器的力量，这些都打不倒站起来的工人阶级。

² 有关战后西班牙工人运动的更多内容（包括弗朗哥时期的运动，格拉纳达、洛卡与巴塞罗那港口的斗争等等），可参见《西班牙七十年代工人自主斗争文集》，

班达斯的创举，关键在于工人中间的自我组织，他们自发组织起来，并且培养了自己的积极分子。他们是出于本能而这样做的，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可能还没有想到这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将成就无比的事业，并为工人的斗争提供一个典范。工人的自我组织，在斗争中提高了群众觉悟，推动了动员与斗争。随着斗争的深入，工人阶级也愈发团结，他们在集会中成长，并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集体智慧。不是成事不足的左派“领导”，而是工人自己成为了斗争的主角。

正如书中所说，地下环境对于学生和工人组织都是相当有害的。各种工人组织虽然尝试参与群众行动，但也有阻碍斗争的一面。比如说，书里也质问这些组织，为什么在大好形势下没能发起总罢工，虽然没把话说得太重，可以看出工人对这些组织非常不满。就好像工人在斗争的时候，还要顾虑到这些组织一样。没有理由怀疑这些组织的积极分子对工人事业怀有的热情和美好愿望，这也不是光靠批判就能解决的“路线”问题。问题在于思路，当时的左翼工人运动认为，工人的觉悟就是服从左派的正确领导，于是各派只想着拉队伍，由自己提供政治领导，而没有推动基层斗争和自主组织，在斗争中提高群众觉悟。他们看重的是对工人日常组织的控制力而非阶级利益，甚至为了议会中的便利，阻碍和反对当时的运动。

至于为什么翻译《我们的罢工》一书，因为它是由工人斗争的参与者亲自书写的故事，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勇气与团结的榜样。工人运动离我们太遥远了，人们早已忘记了，群众自发和自主建立的组织，以及在斗争中得到锤炼和发展的阶级意识，到底是什么样子。劳动群众的自觉行动，正是实现自我解放的唯一道路。在工人中间蕴含着这样的可能性，书中描绘的未来是可以实现的。正是共同的理想跨越了半个世纪，将我们与班达斯工人联系在一起。

但将本书引入中文世界是一件偶然的事。要不是朋友推荐了这

本书，可能这本精彩的传记，连同西班牙工人的斗争记忆仍然不会被中国工人所知。感谢推荐了这本书，并一直在为阶级事业寻找文献的朋友，还有记录下这场罢工的老战士们。而我只是在尽我所能，做我能够做到的事。

与那个年代不同，我们已经没有真正寻求变革的革命者了。我们还没年轻过，就开始学着老一辈的样子讲话和思考，早已失去一切健康的直觉与反叛精神了。想要凭自己的思考找一条出路，这也是很难的。毕竟我们所学的历史告诉我们，革命是由领袖或先锋队，再加上正确的理论完成的。二十世纪的积极分子基层斗争传统并没能扎下根，或者说一点也没留下。引进文献也是为了找寻这一失落的传统。

本想在这里记录下我自己的生活的，但发现自己写不出什么。我没有自己的话，在表达生活时，用的都是家长制和资本主义市场的语言。这里没有文化，更没有对文化的需求。为了寻求答案，我曾经历过漫长的思考，也犯过许多错误。当我发现这个可悲的生活绝不是必然的，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可以实现时，又陷入了无力和迷茫。这个完全保守的环境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的动力，也没法教会人严肃的斗争。在这里，我做着最大胆的梦想，尽可能地成长。我反对上一代人，又感到和这一代人格格不入，我痛恨他们的麻木和愚蠢，这个生活的一切又是难以置信的荒谬。在这样的氛围中，怎么会不感到烦恼呢？不管是哪个年代，对旧规则难以忍受、反叛传统的人，总会有相同的烦恼，他们与旧式家庭、学校与生活之间的矛盾总是相同的。不管怎么说，我对新一代是充满信心的，他们对一切事物的漠不关心，就是对自己无力掌握生活、对强加给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反抗，他们已经很少相信这个无视他们意愿的社会承诺的美好未来了。总有一天，青年会走出属于自己的道路。虽然我最富激情、充满幻想的学生时代都被无谓的事情消耗

了。我的经历可能不会留下什么，但这些历史文献所承载的信念与希望将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在翻译的时候，我时常会想，让我回到过去能否成为一名坚强的战士？我的缺点有很多，或许并不是最适合斗争的材料。但谁又是“适合斗争的材料”呢？革命能够实现每个人的价值，随着斗争的深入，阶级社会所认为的成功与失败之间的差别将消失。我不承认阶级社会的成功标准，斗争也不是留给伟大人物的工作。人应当自己解放自己。

多亏了疫情，我才有空闲翻译一些著作。《我们的罢工》其实去年挺早就翻译完了，但为了对读者负责，我必须把译稿校对到令我满意的程度。本书由西班牙语翻译成中文，感谢 Rodrigo 解答了校对上的诸多问题并进行了部分校对，还有龚义哲、李星与吴季对文字润色与定稿提供的重要帮助。我对自己成为这本书的翻译感到十分荣幸，我很喜欢这本书，也对它的价值抱有信心。

2021年3月29日

第二版五十周年序言

前言

班达斯冷轧公司罢工五十周年之际，出于对这场罢工的兴趣，Intxorta 出版社找到了一些一起的班达斯工人，希望能将《我们的罢工》一书再版。

我们的唯一要求是不对文字进行改动，只加上这篇新序言，因为 1968 年出版的这本书最直接、最诚实和最完整地讲述了这场冲突。它是由罢工的亲历者书写的，这场历史性的罢工是我们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起事件，它是一次非凡的经历。

班达斯罢工五十年后，第一版的 17000 册早已售罄，再版是为了让人们便于了解班达斯冷轧罢工的各方各面，回到过去的岁月，从当事人的角度来认识它。

鸣谢

首先，我们要向已经过世的、曾和我们并肩战斗的班达斯工人和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的敬意。安息吧，你们的记忆将永远活在这本书的每一页中，这是你们的书。

它是一次团结的壮举，每一位罢工工人及其家庭在这场史诗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以无私的精神，奉献出了巨大的热情，进行了无数次个人与集体的行动、凝聚了伟大的阶级意识。“小人物”

办成大事的情况是很少见的。

此外，我们还要对支持我们斗争的许多人和团体，尤其是巴斯克和全国的工人，再次表示感谢。没有他们一直以来的帮助，这场冲突没法坚持这么久、取得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

我们担心会遗漏，故没有列举这些人的名字。



当年的合影（1967年）

《我们的罢工》一书的出版

在长达 163 天的罢工期间，我们曾在几份传单中承诺，有朝一日一定要把我们的经历记录下来。

我们当时就认识到，必须把罢工的鲜活经验和我们学到的东西分享出去，尤其是分享给工人世界和工会，还有其他社会人士和团体，例如专业人士、大学、教区、媒体、基督教工人青年团和天主教行动兄弟会，以及为支持我们的斗争而建立的各种公司委员会。

显然，我们没法在当时毫无政治自由的环境下，出版一本关于我们的罢工的书，但在1967年2月，罢工的过程中，弗朗哥政权将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José Antonio Osaba）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也就是将他驱逐出境。这就为我们提供了可能性。

何塞·安东尼奥在被捕之前逃到了法国。自从他在那年三月离开以来，我们专门把当时发生的事相关的所有文件送到圣胡安·德·鲁斯（San Juan de Luz），以便他能开始编写书的初稿。

在罢工结束的几个月后，我们的朋友古鲁齐·阿雷基（Gurutze Arregi）把书稿送到了我们手上。奥萨巴把初稿交给我们校对。在六个月内，我们将这本书定稿，并决定了这本书的名字：《我们的罢工》（Nuestra Huelga）。

1967年底，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从圣胡安·德·鲁斯到巴黎找工作，同时寻找可以把书出版的出版社。在这项复杂的工作中，他得到了耶稣会士大卫·阿尔门蒂亚（David Armentia）的宝贵帮助。来自巴斯克乌雷塔门蒂（Uretamendi）的纳蒂·费尔南德斯（Nati Fernández）和安赫尔·加西亚（Ángel Garcia）也无私地在他流放法国的第一年里陪同他。

他起初打算让“伊比利亚之轮”（Ruedo Ibérico）出版此书，这家出版社在巴黎出版反法西斯书籍。奥萨巴和该出版社的负责人谈了几次，但他们的提议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他们出版的书开本很大，成本也高，而且只在巴黎的书店里卖，这极大地限制了这本书在西班牙地下发行的可能性。出于这些原因，我们不得不另寻途径。

在与支持我们事业的法国团体第一次接触后，我们看到了其他可能性，但我们很快了解到，没有一家法国出版商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然后出现了一个新的选择：由我们自己来出版这本书，为此我们需要一家印刷商接下这个棘手的工作，因为班达斯的工人没有法人资格，这可能会触犯法国的法律。

出于慷慨和信任，我们的法国朋友承担了风险，让我们能够着手出版，所以我们能够自行决定出版的数量和开本，把它设计成《圣经》的一半大小。用的纸比普通的贵，但这样可以大幅减轻每本的重量的。

这样它就能更加适合分发和地下流通，而且把书设计成这种大小，按照“货物”重量来算，付钱给走私商，让他们晚上把东西从西班牙边境运进来要便宜很多。

毫无疑问，书在过境时会遭遇各种危险，但还是有 17000 本书送到了各个目的地，然后被分发开来。唯一值得一提的故事是，一对吉普斯夸的夫妇，在边境附近的一个地方取了一些装书的包裹，但回去的路上车胎坏了。他们只好把车停在路边，清空后备箱，把备胎和千斤顶拿出来。在搬包裹的时候，路过的国民警卫队主动帮助了他们。在担心包裹里的书被发现的“心跳加速”的几分钟后，他们继续了他们的旅程。

出版和运送一万多本书的全部过程，用的都是罢工期间慷慨捐资的声援基金余下的部分。这些钱是为了声援而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将大部分的书都无偿赠送了。

不用说，班达斯的男女老少，以及所有以千百种方式支持我们的人们，都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接受并阅读了这本书，我们在罢工中做出的承诺已经实现：把它变成典范和一部活生生的历史，讲述为自由而战的人们与独裁政权的各种代理人进行的六个月的艰苦斗

争。

另一方面，《我们的罢工》在社会上的传播与影响，让这本书实现了它最基本的目标之一：让工人世界和所有为争取民主而斗争的社会力量能够从书中学到各种东西，并推动斗争。

忠于我们的时代

历史难免会对人们试图描述和分析的事件给出不同的说法。班达斯冷轧公司的管理层从未对书中证据确凿的事实给出另一种说法，更没有对缺乏自由——这有利于他们的经济和商业权力的垄断——的问题表明态度。他们不过是散布谣言，试图歪曲冲突的起因，以及工人坚决反抗社会和政治暴行的原因。

由于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权力是没法永远得到保证的，我们认为可以再版我们的书，并完全保留它原本的内容。

想要改写我们罢工的历史、改写由我们自己担保的本书第一版，必须拿出新的证据和文献。毕竟，我们是这场斗争的主角，它考验了我们的力量、我们的家庭，考验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没有压迫的世界的承诺。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视野、社会和政治思想没有开阔，因为我们的生活因各方面的新经验而得到了丰富，不应让它再回到我们在那个时代不得不经历的，极大限制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的独裁统治之下。

当时班达斯的工人平均只有 30 岁，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这也是我们的第一份工作。捍卫我们利益的工人小组成员不属于任何工会或地下党，这说明我们完全是自发组织起来的，而且我们始终保持着牢固的团结。

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个小组加入了天主教行动兄弟会，以便获取阶级意识和有关工人运动历史的重要知识，但作为教会组织的兄弟会，它尊重刚崭露头角的我们（不像工会那样），也没有指示我们每个人具体该怎么做。

冲突的经验跨越了时间

弗朗哥政权在 1976 年倒台，被民主社会、被一个承认基本自由——包括言论自由、组织自由和罢工自由——的法治国家取代。

正是这些权利的缺失，促使我们和平的劳资冲突逐渐变成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残酷的社会政治对抗，当时人们在不同战线上为伟大理想和政治事业而奋斗。

我们没有想到，这场劳资冲突变成了以经济权力和独裁统治为一方，以数百名班达斯工人和动员起来支持我们的其他社会团体为另一方，两方之间极为不平等的一场对抗。

面对这一现实，简直不敢想象我们的罢工居然能顶着前所未有的镇压大获全胜。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抗争迫使他们揭开了自己的真面目，揭露了他们的虚伪。

过去四十年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对于当代人来说，我们在独裁下的生活已经成为了一段遥远的历史，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对它完全不了解。

生活和物质条件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我们社会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社会不平等、无数的腐败与不合理的政策，人们对更平等的分配，对教育、就业和知情权等方面机会平等的愿望仍未实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的罢工》所讲述的短暂却激昂的历史，能为我们当今社会提供什么？显然，每位决定阅读本书的人都会得

到自己的结论和教导。

就我们而言——除了团结与勇气的伟大典范——那场冲突对当下最直接的意义就是，这个故事描写了许多人的行为，通过辨别和分析这些行为，可以帮助我们对当下许多人的行为进行推测，这就是斗争带给当前的最大启示。

而在这场冲突中，可以鲜明地看到两大社会阶级相互敌对，工人阶级反对获得中产阶级支持的上层阶级，需要认识到，这种阶级划分一定会影响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

现在的问题不是要重拾仇恨，也不是在判断是非，而是要讲明责任与个人良心的问题。

班达斯罢工体现了人的不同行为，从正直、慷慨和勇气，到最露骨的压迫、怯懦与服从，这些都是人所共有的情感。

为了理解我们的说法，再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我在执行命令”，“他们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这些说法在纽伦堡审判期间震惊了世界，这是纳粹最骇人罪行的始作俑者为自己开脱的借口。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罢工》一书的教训，现在也应该继续呼吁每一个人，无论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追求基本的价值观，如践行正义、团结互助、热爱真理；不能为了逃避困难，或为了物质利益、政治或工作上的好处，让自己的内心屈服于强者的法则。

在任何时代和社会中，甚至在所谓进步社会中，都存在着正义与非正义、真理与谬误之间的不断斗争，这似乎让书中所反映的、彻底消灭人与人之间一切形式的不平等与痛苦的梦想，离我们更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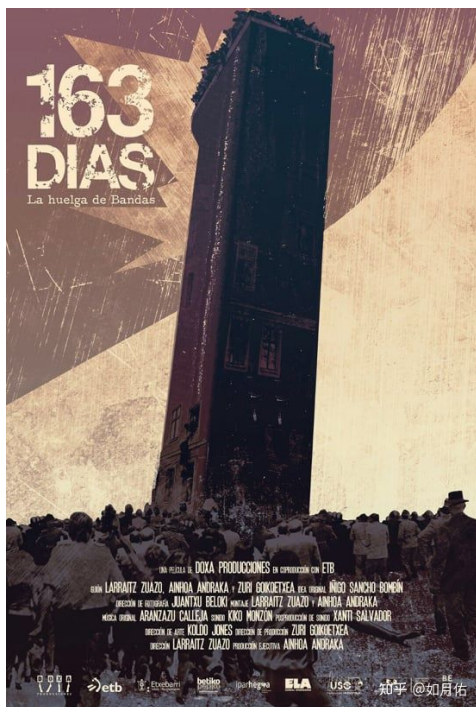
由于这些原因，最好是选择个人与社会契约的形式，这种形式既远离过度乌托邦的历史乐观主义，也远离极端悲观主义。

最后，我们希望在五十年前以极大的热情与对真理的渴望写成的这本书，能够带来感动、启迪与价值观上的认识，引导我们的生

活朝着更有价值的方向前进，让我们力所能及地建立一切美好。

前班达斯冷轧罢工协调小组成员

2018年5月于毕尔巴鄂



在《我们的罢工》五十周年之际，还拍摄了一部讲述罢工的纪录片：

预告片：<https://vimeo.com/ondemand/163diaslahuelgadebandas>

正片：<https://vimeo.com/257547655>

前言

“真理没有两条路”³

经过了五个半月，我们的罢工结束了。尽管我们带着痛苦和愤怒，它的结束仍然是光荣的。为了终结我们的抵抗，他们必须要调动整套镇压机器，这也给政权上了一课：被它玩弄的人就本性而言，是很少受到资本主义掌控的。

在罢工的第三天——当国民警卫队手持武器把我们赶出工厂时——我们非常明确地说：“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我们遵守了诺言。我们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为了强迫我们回到工厂，他们不得不拿枪口对着我们，还用上了越来越多的暴力手段。为了瓦解我们的抵抗，毕尔巴鄂银行下令用暴力将工人从有利于抗争的新岗位上赶走；根据旨在使镇压合法化的法律，我们受到了不合理的审判；西班牙政府强行将我们的同志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他们使用暴力——拷打、审讯与监禁——威胁和恐吓我们最优秀的领导人。他们用暴力禁止我们开会，而这些集会对于我们是否能够继续组织下去是至关重要的，他们也威胁将我们赶出自己的房子，而我们的房子是用自己的钱买下，却归于公司名下的。为了瓦解工人的团结，他们动用了最后的暴力手段，在比斯开宣布了“紧急状态”、驱逐了四十多名工人领导者、监禁了数百名工人、实行了居住登记……这一连串的暴虐行为，将在本书中——道来。

但我们胜利了。是的，在法西斯资本主义政权下，六百个家庭

³ 原文为巴斯克语“Egiak ezditu bi bide”。——中译者注

能够坚持一场长达 163 天的罢工，就是一场意义非凡的胜利。以下是我们复工当天，在传单上写下的内容：

“我们胜利了，是的，我们胜利了！尽管我们似乎是被击败才不得不复工的。工人历史的空白页一如既往地是以红色的墨水——鲜血所书写的，而那些最优秀的人的牺牲，则是为了促成工人运动的光辉篇章，必须付出的高昂代价。”

应当承认，我们最终丢下了几位领导者的做法是不公平的。在这五个半月的罢工中，我们高喊着“要么全走，要么全留”（TODOS O NINGUNO）的口号，与他们并肩战斗。我们怀着深沉的痛苦将他们留在了外面。但是当情绪平静下来，我们就会明白，如果我们继续团结在一起，相互帮助，我们本可以忠于这一口号。

另一方面，如果认为解雇就能让工人失去领导者，那可错了。不管监狱还是流放地，甚至死亡，都不能打倒一位工人领导者。他们越是受到迫害，就越能激励工人不要停止斗争。什么也不能让我们分离。此外，我们的事业不仅限于工厂的狭小边界，它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事业。不论是在班达斯或是其他地方，重要的是，为了反对经济上的剥削，反对我们遭受的社会、文化与政治压迫，我们将继续斗争。

这就是我们的教训。整个半岛的工人阶级始终关注着埃切瓦里发生的一切，他们懂得由班达斯工人开辟的道路通向他们自身的解放。对我们来说，这就是让我们充满希望并且感到自豪的重要原因，它使我们坚信，我们遭受的一切并不是毫无收获的。有些人在重振旗鼓的工人阶级面前吓得发抖，想方设法贬低我们斗争成果，但我们不会再次被骗了。

虽然我们的罢工向前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要明白，这并不是一次完全的胜利。毫无疑问，我们也有落败的地方。虽然我们的抗争和战斗是英勇的，却未能充分团结起整个工人阶级，使它站起来反抗法西斯。从我们浅薄的观点来看，很难分析为什么没有发生总罢工，至少在工人觉悟最高和最可能发起斗争的工业中心没有发生。的确，由于我们直接参与了这场战斗，我们可能并不是冷静和客观判断这些问题的最合适人选。我们是否在正确的时机发动了斗争，还是太过仓促了？我们是否将自己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了？我们是否认识到要将自己的立场坚持到底？工人组织对此是如何反应的？这些组织是出于真正的革命觉悟，真诚地加入工人的事业，还是只关注派别利益？它们的出版物关注这场冲突的哪些方面？它们评判的依据原则是什么？工人愿意跟随我们吗？

必须向工人阶级和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提出类似或其它的问题。本书中——在这里，我们也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将就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而无意深入到问题的本质去寻找根本原因。书中呈现的内容，代表着拥有共同想法和目标的六百名罢工者的思考。但是，我们中间当然还有政治思想各异或分属不同组织，以及不属于任何一方的人。因此，我们不可能仅表达我们当中某一部分人的判断与立场。

这是我们的书。它是由经历过罢工的人写的。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是的，我们希望怀着激情记录下在这 163 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全部的感受、希望和遭遇。我们试图忠于事实，忠于我们的事实。这些真相是坚实的，有时也是苦涩的。我们希望在书中揭露那些从未被世人所知的暴行、无以计数的谎言、卑劣的野心与自私。但我们不在乎他们的丑态。因为这本书不是为了他们而写的。这本书写给我们的阶级兄弟，写给所有带着美好的愿望，真诚地想要了解人民，渴望走到人民中间，想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在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讲述罢工期间发生的基本事件。为了不
把本书写成冗长的历史，必须略去许多的事迹。但书中的材料，已
经足够对发生的所有事情提供一个完整的全貌。

第二部分将考察我们认为重要的某些方面，从而让人们对这些
方面的意义和重要性有更清晰的认识。

最后，本书的第三部分和最后部分是专门给工人积极分子和大
学生的思考，我们尽量将相关的经验成果总结在几页中，也衷心希
望从这些思考中——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把它交给未来的读者进行
批判——能够得出新的思想。

我们希望将这本书，将这一切交给那些支持我们、支持半岛人
民，为了反对资本主义及其帝国主义的最终形式，为了全世界受压
迫者的解放而斗争着的人。

1969年11月30日于埃切瓦里
“我们的罢工”三周年纪念日



我们的罢工

Nuestra Huelga

1966.11.30-1967.5.17

巴黎Ruedo出版社，1968

第一部分 罢工的历史

我们的公司 它的特点 三年的斗争

班达斯冷轧（Laminación de Bandas en Frío (S.A.B. - A.H.V.)）位于比斯开省的埃切瓦里镇（Echegarri）——距毕尔巴鄂市中心四公里，毗邻圣塞巴斯蒂安的主干道——那里是内维翁河（Nervión）的流域。在四百米远的地方，可以找到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S.A. Basconia）的旧址。

在 1955 年班达斯厂区动工之前，这整块约 60000 平方米的土地都是农户住房和菜园。如今，这片地区已经成为工厂，变成了内维翁河流域最重要的工业园区，共有约 20000 名工人。在这里汇集着西班牙凡士通（Firestone Hispania）、艾德萨（Edesa）、圣米盖尔纺织（Talleres San Miguel）、几内亚兄弟（Guinea Hnos）、普拉德拉兄弟（Pradera Hnos）、塞布拉斯蒂卡（Ceplástica）、帕克尔（Parker）、梅塔卡尔（Metacal）、巴斯科尼亚（Basconia）、圣安娜德伯卢埃塔（Santa Ana de Bolueta）等公司。

班达斯所在的土地归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所有。其余的工厂设备由巴斯科尼亚与比斯开高炉各出资 50% 兴建。班达斯之所以通过合资的方式建立，原因是起初国家给了其中一家公司开发冷轧设备的权利，后来又允许另一家公司进口机械，而市场条件容不下两家公司，所以决定建立一个由两家公司共同持股的工业园区。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由以下人员组成：

比斯开高炉董事会

名誉主席：

维克多·查瓦里（特里亚诺侯爵）

阿方索·楚卢卡

主席：

胡安·德·阿吉雷

第一副主席：

佩德罗·卡雷阿加（卡达瓜伯爵）

第二副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珂

董事

埃米利奥·阿尔米尼奥拉

奥古斯丁·里奥那

胡安·安东尼奥·阿兹那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

威廉·克隆奇

诺曼·奥巴德

加布里埃尔·查瓦里

何塞·奥拉瓦里

何塞·马努埃尔·德尔克劳斯

马努埃尔·奥尔多涅斯

阿尔·埃博索尔

阿方索·阿尔卡拉·加里亚诺

佩德罗·加林德斯（皇家阿普雷西奥伯爵）

胡安·马努埃尔·冈达利亚斯

伊格纳西奥·萨图鲁斯特吉

安东尼奥·加里格斯

查尔斯·施瓦茨

罗伯特·格雷厄姆

胡安·安德烈斯·马尔多纳多

菲利普斯·霍金斯（比利亚贡萨洛伯爵）

恩里奎·伊瓦尔维亚

何塞·玛利亚·祖比利亚

格雷高里奥·伊瓦拉

何塞·马努埃尔·祖比利亚

威廉·郎（祖比利亚伯爵）

秘书长:

胡安·玛利亚·戈亚罗拉

执行委员会:

主席:

伊格纳西奥·穆古鲁萨等七名委员

经理:

费尔南多·塞拉诺

恩里奎·加西亚·拉马尔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会

主席:

佩德罗·冈达利亚斯·乌尔吉珂

董事

卡西尔达·安普埃罗（圣费尔南多·德·巴雷拉侯爵夫人）

华金·加丹·德·阿拉

路易斯·米奥塔

恩里奎·莱克利卡

佩德罗·安普埃罗

何塞·冈达利亚斯

埃斯特万·莫兰

费尔南多·龚德拉

秘书:

路易斯·艾萨卡

由于自 1962 年以来，巴斯科尼亚持有班达斯的股份达到 66%，巴斯科尼亚的首席执行官兼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拉苏尔特吉（Fernando Gondra Lazúrtegui）接管了我们公司。他的职务如下：

巴萨乌里有限公司主席
莫雷诺里奥哈金属设备有限公司董事
农具有限公司秘书
航空制造有限公司董事
北方白云石有限公司董事
内维翁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董事
高级制铁（梅塔卡尔）有限公司董事
西班牙电解炼铁公共事业公司董事
纳瓦拉海泡石有限公司董事
毕尔巴鄂银行董事
洛芙拉铁路公司董事
萨维罗煤业及附属有限公司董事
特科那顿有限公司董事
金板（西班牙）有限公司董事⁴

资本：来源、走向和收益

班达斯的建造预算是多少？这家公司现在市值多少？谁为它出的钱？由于资本主义的不变法则，班达斯就是工人们为少数人的利益用血汗筑成的。在内战后的几年里——直至 1958 年左右的“稳定计划”——钢铁生意都相当红火，这首先要归功于铁的黑市。

以巴斯科尼亚的总经理龚德拉为例，估算下来，他每年将 3000 万比塞塔收入囊中。与所有的钢铁生产商一样，巴斯科尼亚对每公

⁴ 《董事会及理事会数据》（Datos del Directorio de Consejeros y Directores），Dicodi，马德里 1965 版，第 143 页——原注

斤出售的铁都会“抽成”，这样一来可以估算出，实际销售额达到了每年 10 亿比塞塔。这可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又和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有什么关系呢？

多年以来，他们拿的是填不饱肚子的工资，到头来还要被解雇，老的和干不了活的都要被赶走。在 1962 年的巴斯科尼亚罢工中，大家发现有 212 人的年收入少于 22000 比塞塔⁵，这可是年收入！为了淘汰这些工人，1965 年有 315 名工人被强制退休——正是这些工人以辛勤的努力，在陈旧的厂房里创造出了巨额利润——同时政府还批准将 900 多名工人开除。

除了董事们令人眼花缭乱的财富——龚德拉的财产估计超过 10 亿比塞塔，很大一部分存在了国外银行——和股东们永远丰厚的红利外，巴斯科尼亚还通过变相投资建立了庞大的准备金和秘密基金。1959 年，它进行了二次发售，股东每持有一股旧股可获得三股新股。它还投资了其他十家公司，并且都占股 50%。

比斯开高炉的情况也类似，虽然这家公司的超额利润似乎都凭空消失了，因为几年后发现，这家公司无法翻修其庞大而老旧的设备。

这两家公司为了建立班达斯冷轧，投入了约 25 亿比塞塔。公司当时的市值——经过了大幅增长——还要更高。为了估价，我们可引用最近几年公司采购的设备及其价格的近似值⁶：

电解镀锡生产线·····	190.000.000
2 台热镀锡机·····	40.000.000

⁵ 参考比塞塔兑美元汇率，当年比塞塔的购买力几乎等值于今天的人民币（2020 年数据）。公司的财富和工人的收入，对于国内读者来说应该是相当直观的。见 <https://www.measuringworth.com>——中译者注

⁶ 译者对于轧制设备及原材料等名词并不熟悉，翻译时经过多番查找，希望能避免错译。——中译者注

9 台退火炉·····	30.000.000
扩建酸洗设备·····	30.090.000
布利斯车床·····	170.000.000
（辛辛那提）磨床·····	12.000.000
镀锡铁分选机·····	5.000.000
镀锌生产线·····	220.000.000
表面冷轧设备的厂房·····	85.000.000
总计·····	782.000.000

还必须考虑到，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未分配的超额利润支付的。

对于巴斯科尼亚来说——由于质量低劣、无法遵守交货时间和订单数量等等，本地常失去商业订单——班达斯非常重要，它是旧驴被卸下石磨并宰杀前的那匹新驴。但是，对于比斯开高炉而言，班达斯的经营只占其商业活动的不到 10%。因此，巴斯科尼亚在 1962 年恰逢其时地得到了高炉的 16% 股份，占股达到了 66%，高炉占股则为 33%。这项收购是由公司的商业部和总经理等人负责的。通过这项收购，巴斯克尼亚接管了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商务官等职务。

这家公司于 1959 年中开始生产。它的生产范围包括冷轧板和冷轧带钢、镀锡铁皮、电解薄钢板和镀锌板。它是（伊比利亚）半岛市场上唯一生产这些材料的生产商，冷轧板除外，因为从 1966 年开始，恩希德萨（Ensidesa）也开始生产冷轧板了。而我们都知道垄断是怎么回事，也知道它能赚多少利润。

根据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其年产量（1764 年数据）如下：

冷轧金属板·····	135.000
------------	---------

镀锡铁皮·····50.000
 电解镀锡白铁·····60.000
 镀锡金属板·····45.000
 总计····· 290.000 吨 / 每年

(尽管这些数字尚未完全核实，但可以作为参考)

这意味着销售额达到了将近 40 亿比塞塔。由于每吨的平均成本价格约为 10000 比塞塔，总成本不会超过 30 亿比塞塔。为了估算利润，只需要做简单的减法就行了。现在不难理解，在大量钢铁生产商蒙受亏损的几年里，巴斯科尼亚是怎样扩张、快速摊销、偿付贷款并保持利润的。下表中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

公司名称	1958	1959	1960	1961	1962	1963	1964	1965	1966
A.H.比斯开			11	10	6	0	0	0	0
杜罗 费尔盖拉	12	9	10	10	7	4	0	0	0
巴斯科尼亚	30	14	14	14	12,5	12,5	12,5	12,5	10
圣芭芭拉	8	8	8	7	7	0	0	0	0
埃切瓦里	13	12	11	14	13	12	12	12	—
锁业联合	21	19	18	18	16	15	14	14	—
(取自 1965 年毕尔巴鄂银行金融机构的数据)									

看来赚到钱的不只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

“全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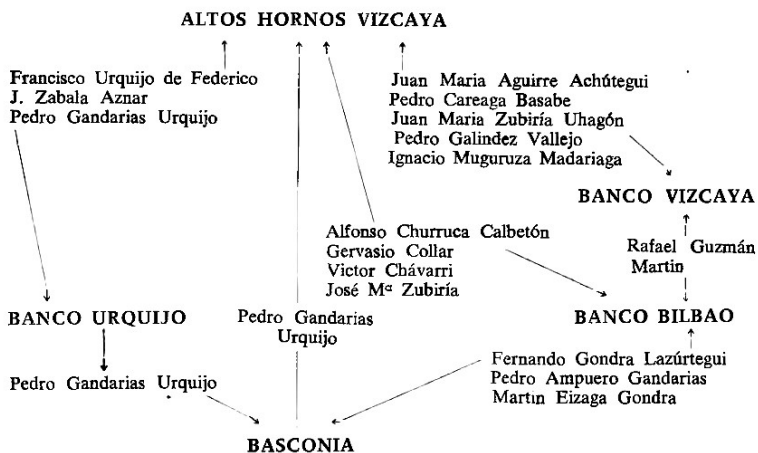
如今，在半岛上有七家大型银行：中央银行、西班牙信贷银行、乌尔吉珂银行、西班牙美洲银行、桑坦德银行、比斯开银行和毕尔

巴鄂银行，它们以直接的方式，或通过在其他银行的共同董事，实际控制了全部现有财富。

这一点我们是肯定的，因为实际上是这些银行在管理国家的全部资金，而公司为了获得用来投资的资金，就要向它们请求贷款，受它们的绝对控制。

这种依赖关系导致七家大型银行的一百五十名董事，同时在各行业最重要公司的董事会中任职：石油行业 27 名；电力行业 43 名；水泥行业 38 名；化肥和化学品业 25 名；制糖业 8 名；钢铁业 37 名等等。

至于我们埃切瓦里公司的所有者，也就是比斯开高炉和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也已经跻身大银行的全能家族了。下图展示了，它们是如何通过共同董事的关系链被结合在一起的：



这种紧密的关系使两家公司的所有者可以轻易获得需要的财务支持，这一情况发生过很多次了。

金钱掌管政治生活

然而还不止这些。这种经济力量可以完全控制当前的政治体制。这就解释了，在近几年——当上述公司难以为继的时候——政府再次站在了少数人一边，不仅动用镇压机器，还向人民滥收苛捐杂税，尤其是加重最穷苦人民的负担。

通过所谓的“协调”，钱从社会转到了资本家手里。同时通过公司和政府的协定，政府向它们发放了总计数十亿的贷款。例如在 1965 年，比斯开高炉获得了 43 亿比塞塔的贷款（在十五年内偿付）用于设备的现代化改造，最近巴斯科尼亚也拿到手 5 亿。

至今为止，现政权已经向钢铁行业提供了超过 450 亿比塞塔。此外还有美国资本的支持，包括美方的贷款、由美方参股班达斯高炉 28% 的股份，以及从美国进口冷轧机械设备的优惠条件。

但是，剥削者的全部实力和盟友还不止这些。有一家 1907 年建立的公司——它在 1940 年前叫作“钢铁业贸易中心”，之后改称“钢铁业中心”——它由众多从事相关行业生产的公司组成。它的成员享受的好处有：一，为产品制订共同价格。二，获取订单并根据成员各自的分工和生产能力分配订单。三，最重要的是，向政府施加压力来维持贸易保护主义的关税，或者在必要时新设或增加关税，避免带来威胁的一切竞争。

在它的董事会中有 11 家钢铁公司和相关产业的代表，总共 26 名。其中就有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的代表。

为了能够充分理解本书叙述的许多内容，我们还需要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西班牙国家的政府部长卡米洛·阿隆索·维加⁷也在“钢

⁷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Camilo Alonso Vega，1889 年 5 月 29 日——1971 年 7 月 1 日），1907 年入伍。1934 年参与镇压阿斯图里亚斯矿工起义。1936 年内

铁业中心”担任职务。

这些介绍是为了使我们对半岛上的剥削者有一个浅略的认识。

我们的罢工并不是针对某些人或者某家公司的孤立战斗。权力与财富的集中构成了当今资本主义的实质，工人阶级也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战场。

对于资本的力量和它伸进社会中的手，我们只做了简单的概述。

现在该谈谈我们自己——班达斯的工人，还有我们短暂却意义重大的历史了。

我们创造的财富

如上文所述，这家工厂于 1959 年年中开工。那时只有 70 名工人。职工人数迅速增加。到 1960 年初，车间、办公室职工和技术人员加起来达到了 500 人。到了 1962 年，尽管厂房新增的设备需要人手，我们的人数大致还是在 700 人上下。工种的大致分布如下：

车间工人	560
办公室职员	70
专家、工程师等.....	70

我们的背景如下：70%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按人数比重排序是：布尔戈斯、埃斯特雷马杜拉、安达卢西亚、莱昂和莱

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7—1939 年任纳瓦拉第 4 师团司令，期间晋升为准将。1939—1940 年任陆军军事教育总监。1943—1955 年任国民警卫队司令。1957—1969 年任内政部长。1959 年转入预备役。1969 年退休。——中译者注

万特。也就是有大约 30%来自全国其他地区。⁸

我们的收入

到了 1962 年，我们的收入仅达到最低工资标准，顶多加一点很少的奖金。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平均每月不会超过 2500 比塞塔。1962 年，公司管理层胡安·艾罗多伊签署了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公司的集体协议。由于公司所有重要的经济活动——线材的进货、销售、财务和会计——都是由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直接控制的，作为补偿，艾罗多伊在预算上享有一定的自由，但（我们认为）受他支配的东西就和劳动力的预算一样微不足道，即不超过总费用成本的 4%。

在这份协议中，工资和奖金相比以前提高了。比方说，法定最低工资是 36 比塞塔，而短工的工资定到了 71 比塞塔。奖金（后来我们将其视为冲突的直接原因）在工资中的占比开始提高，（如果用最快速度干活的话）大约有 40%到 70%。随着这种制度的建立，还订下了荒谬的指标，为了提高产量，公司也频繁抬高指标。就拿短工来说，在 1962 年大约每月能拿 2200 比塞塔，再按照工作量能拿 800、1000 或 1200 比塞塔的奖金（后来随着工资的增加，这些奖金也成比例增加，它成为了我们的基本收入，但随意克扣奖金的情况也严重了）。除了收入的改变外，还建立了一个标准——所谓“能者多得”的利润分配方式——它把每月产量和劳动力成本挂钩。我们通过它得到的工资大概占了我们总收入的 20%到 35%。当然，由于我们的过度劳动增加了产量，公司才是最大的获益者。

⁸ 看来新资本主义有一项“技术上的”计划——也就是工人来历的“多样性”——的这说法是真的，他们认为这会阻碍工人的团结。——原注

这份协议于 1963 年 7 月到期。到了 10 月，公司开始新的劳资协商时，艾罗多伊已经不是班达斯的管理层了。

巴斯科尼亚（当时已经持有了班达斯 66% 股份）任命董事会成员米奥塔担任我们公司的新代表。虽然当时伊格莱西奥·伊达尔戈还没上任运营经理——这才是掌握实权的位置——实际上伊达尔戈已经是龚德拉的真正代表了。

在公司和班达斯代表团的会谈中，希斯内罗斯表现出了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在七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用老办法来拖延谈判时间：要求提交更多的报告、修改提案、重新答复，然后进行新的调查……最终，当所有人都觉得协议马上要签下来的时候，希斯内罗斯却说公司没有答应任何东西。龚德拉已经做出决定（不签），专家们——他们之前愿意达成协议——也都俯首听命。事实上，考虑到我们应得的更多增产补贴，以及工人的其他要求，我们的处境更不利了（然后在 1964 年 5 月，我们第一次进行了一场 15 天的罢工）。

其实巴斯科尼亚另有算盘。他们开始重新规划公司的发展，莫名其妙削减我们的收入，还制定了少得可怜的工资标准。

他们玩弄计件工资的标准——这一标准完全由他们制订，而且不容质疑——从而减少我们的到手数目，直到分文皆无。

因此，尽管我们的工资增加了 16%——由 1964 年 8 月劳工代表（la Delegación de Trabajo）发布的为期两年《强制性规定》（la Norma de Obligado Cumplimiento）规定——我们的实际收入却减少了。这出于两个原因：一，由于新的工资制度，我们的收入会减少 20% 到 30%。二，16% 的工资增长仅仅弥补了生活成本的增加。

随后在 1965 年 8 月，根据前一年生活成本的提高，他们对工资进行了新的调整。在《强制性规定》中也给出了对新一年度的规定。经过了一系列的紧张局面后——由于公司拒绝接受比斯开高炉指示的增长率——决定将工资提高 15.3%。

这里清楚地反映出，我们在 1966 年的实际收入要低于 1962 年。这是因为，产量大幅提高，我们的工作量也同比例增长了，而假装我们没多干活，等于不折不扣的掠夺。

除此之外，资方还不承认许多工人的专业职称，扣除我们的奖金，减少医疗保障，强制无偿加班等等。



人员管理

以上是经济状况的变化，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关系的恶化，还要更厉害。

在艾罗多伊任职期间——当然，剥削制度没变——公司施展“人道主义”手腕，于劳资之间营造“和平”关系。艾罗多伊（在他的脑袋里）希望公司上下都处在“和睦”当中。为此，他使用了新资本主义的技术：工人也能通过生产得利，向员工公布公司经营情况并且采用弹性工作纪律。他不让工头严厉管人，反而要求善待工人。在这方面，虽然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尊重，但我们在资本主义里的

最底层位置仍然没变，无论这个资本主义是野蛮的还是“文明”的。

随着艾罗多伊离职和米奥塔上任，情况开始变化。我们的收入逐渐减少了，同时人员管理方面也开始恶化。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到来之前，我们主要是受经济上的压迫。他一当上运营经理，警察制度就深入到了公司生活的方方面面。

从那时起，工人的所有要求都会被拒绝，任何过失或粗心大意都会受到不公平和严厉的惩罚。为了打破剩下的希望，他们无视了许许多多的请求。部门负责人拒绝签署提交给他们的文件副本，以致我们无法证明自己提出了请求，或是要求得到答复的期限。

提交的抗议或请求至少有几百份。这当中还没算上大量的法院裁决。

下面是一些没被解决的工人诉求：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以下由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enlace）代表电气维护部起草，
鉴于：

根据由劳工代表团与审议委员会批准的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我方要求引用其中第 29 条：

第 29 条：“工作量评估的审查”。对于不同工作的劳动价值，应当在评估中视情况决定，例如：

- 甲．机械化程度
- 乙．操作方式
- 丙．影响疲劳程度的条件
- 丁．工作量或其他

公司的设备增加了 62.2%，而维护人员减少了 60%，因此我们

认为有必要在公司代表团第一次会议上，引用上述条款进行评估。

技术数据：

自 1962 年以来增加的设备。

第二套表面冷轧设备。

布利斯车床。

磨床 55 台。

热镀锡机器 2 台。

镀锡电解制备生产线。

镀锡电解生产线。

再分拣生产线。

镀锌生产线。

起重机（C/A） 5 台。

1962 至 1965 年

15 台工厂设备

28 名正式电工

1962 至 1965 年工人类别

一级工 10 名

二级工 15 名

三级工 3 名

1966 年

24 台工厂设备

21 名正式电工

1966 年工人类别

8 名

4 名

9 名

签名

致省劳工代表先生

尊敬的先生：我们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谨代表班达斯冷轧电器维护部、电气部与总后勤部员工，

鉴于：

1964 年以前，公司为了大修，会安排员工休假，并在夏天进行三轮（以半个月为一轮）的设备停车。

在此期间，我部门都会投入全面维修，而公司为我部门员工提供最高额奖金。

但自 1965 年开始，在没有事先告知公司代表团的情况下，公司为了提高产量和效益，停发了我们部门的奖金。

因此，现在根据机器停车的时间以及管理部门指示的日期，在全年里的各时间段进行设备维修。

由于上述原因，上述部门工作人员的收入被减少了。

经我方代表团提出正当的要求后，公司承认我们有权得到补偿金。

公司给出了一个大致金额，承诺每六个月发一次，我方代表团同意了。但是半年后，公司并没有给钱。

无故拖延四个月后（这引起了强烈不满，甚至导致了两个小时的停工），公司同意支付与先前商定的近似数目，同时称我们的要求是不合规定的。

代表团声明自己从不知道有什么规定，我们要求的是公司答应的补偿金。

双方同意讨论这一有争议的规定。但公司没有遵守承诺，还强行拍板，使我们只能得到原商定金额的 46%。

在下一个半年结束时，此事仍未解决，因为代表团和工人不接受资方克扣以及不支付约定数目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求您承认我们的权利，强制公司遵守其承诺的金额，或者恢复到与 1964 年相同的工作制度。

上帝保佑您健康长寿。

签名：公司代表团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主席先生

本文由镀锡车间员工起草。

本文是为紧急告知公司管理层以下内容：

本车间此前同其他车间都配备可靠专业的辅助工。

但自去年 7 月 12 日以来，我们被告知这一岗位被取消（已经执行），这迫使我们将该岗位的工作分配给剩下的同事。

该指令违反了《钢铁业工作条例》中关于职务的内容，以及集体协议中相应的条款，因此我们声明，我们不会接受原本属于辅助工的工作，这一工作不属于我们的职责，我们要求恢复这一独立的岗位。

我们要求公司管理层解决我部门人员不足的问题，不得随意撤销岗位，并填补人员空缺。

如果这种情况无法解决，我们将报告给主管机构。

您真诚的。

1966 年 7 月 14 日

致电气维护部总工程师先生

本人自 1965 年以来一直担任高级职称的电器维护电工助理。根据班达斯冷轧工会集体协议第 89 条，我们要求重新评定我们的职称，以及下发拖延至今的克扣工资。

66 年 9 月 26 日于埃切瓦里

致冷轧公司代表团

本文由平整机设备部门员工起草，

鉴于：

我们希望复核我们的职称评定，因为设备经过了改进，因此操作方式也改变了。我们还要求复核我们的生产奖金。

同日，我们将此事告知部门的总工程师先生，但他不想负责此事。

因此，我们已履行合规程序，

故我们请求：

告知管理层我们希望职称评定通过，并得到生产奖金。

您真诚的。

66 年 10 月 26 日于毕尔巴鄂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代表团

因工人提出大量要求，为履行职责，我们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致公司代表团：

工人们对于现任社会秘书处（la Secretaría Social）负责人卡尔巴乔先生的态度深感不满，尤其是在工作时间喝酒——这是他诸多危害公司工作安全的行为之一。我们认为他的态度极不认真，且违反了 1963 年 11 月 25 日由省劳工代表颁布的《内部规章条例》（el Reglamento de Regimen Interior）中的条款，其中第十四章第 220 条对饮酒做出规定：“禁止在工作场所中饮用超过半升以上任何种类含有酒精的饮料”。

对于省劳工代表所颁布条例，工人们未被告知有任何变动。但有几次，几名工人因将不超过半升的红酒带进工作场所而被扣了几天的工资，而在公司的食堂里，工作时间为早八点半至下午四点半的员工却可以在就餐的半小时里无节制饮酒。也就是说，那些遵守制度的人受到了惩罚，同时公司又允许无限制喝葡萄酒。

出于两个原因，公司没有同意公司代表团有关完全禁止含酒精

饮料的要求：

(1) 未经劳工代表批准，不得修改《内部规章条例》。

(2) 即使上述事实使协议（指禁酒）成为一纸空文，实行禁酒也对轮班和在非正常时间工作的人员造成了损害，这表明以出于安全考虑为由要求禁酒是不严肃的。

如果将“工作场所”仅理解为车间，而不包括食堂，那么卡尔巴乔先生在更衣室里收走工人阿隆索先生一瓶红酒也属于越权行为，因为更衣室位于车间外面，和食堂在同一栋楼里，而在食堂的就餐时间内，他也会随意没收大家正在喝的红酒。对于上述情况，工人要求代表团：

(1) 将本文抄送省劳工代表。请省劳工代表先生：

要求管理层遵从《内部规章条例》第 220 条所规定的内容，一视同仁。

(2) 对于卡尔巴乔先生一再违反现有规定或滥用职权的情况，应当采取《钢铁业工作条例》的惩戒措施。

(3) 公布公司代表团通过的决议，以便员工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此事上的责任和义务。

您真诚的。班达斯轧制工会联络员。

1966 年 6 月 10 日

致车间部门首席工程师先生

本文由金属板车间员工起草，

鉴于：

如您所知，一年半以来，我们一直要求改动某些控制装置，将宽度为 3.8 mm 的线圈减少 0.6 mm 或以下，因为减少宽度能让控制装置的效率达到最高，或者至少接近最高效率工作。

同样，我们的奖金也因此（一年半都未调试装置）蒙受损失，因为这一装置上的改动适用于镀锡生产设备，且仅用于这个目的，它能使我们的工作小组更适应生产、更高效工作。

近期，绕线机输出的电流被减小，这意味着中央电机要输出更大的电流，使转速降低了。由于未进行必要的调试，它导致我们的奖金减少。

因此，我们要求在 30 天内解决上述的异常状况。如果得不到立即答复，我们会派代表团前往工会和劳工代表那里，请他们派人检查我们的控制装置。

66 年 10 月 28 日于毕尔巴鄂

我们回头来看人员管理和经济上的某些问题，其中有些问题至今还在困扰我们：

1966 年的几个月里，在我们的要求下，工会联络员检举我们的同事在一些设备上每天工作 12 小时，已经持续两年多了。三班倒减少一班之后，工人们变成两班倒，多出来的人没活干了，剩下的工人要拼命干活。来公司巡视的劳工监察员总是在管理层的陪同下履行职责，他告知我们的代表，将拟定一项禁止违反工作时间的规定……但 12 小时轮班制仍在实行着。

同时，退火部门里的全体工人还向劳工代表索要赔偿，因为多年来他们一直在毒性气体超标的环境下工作，一直想得到补偿。直到今天，这些问题仍未解决。

在这家公司里，无论筹集资金还是投入生产，都会经手天文数字般的钱，但搬运伤者的救护设备——由于工作设施的特点，工伤特别多，有些很严重——只有一辆旧小货车，同时这辆车也用来运货。它的保养奇差，开车时经常要发动几次。公司的医务室也是沿用巴斯科尼亚的，因为我们公司（班达斯）没有这种必要设施。

如果说在本章的开头，可以看到巴斯科尼亚和比斯开高炉多么轻易向我公司投入了资本，这家子公司又如何“精明地”把利润转移给两家母公司，现在可以看到，他们是多么随意地把巴斯科尼亚的工人调到班达斯，对我们又造成了多少麻烦和困难。

为了调动工人，我们被“给予”了三个月的例假，当然没人这么要求过。接着我们来到班达斯工作，像新人一样，先试用了三个月。我们中有些人被要求签署三个月的第二期合同，上面写明，由于这些人在第一期试用中干过各种岗位——当时这些岗位都是管理层自说自话安排的——导致我们的资质无法核实。如果我们最后到班达斯工作，就将失去在巴斯科尼亚包括工龄在内的所有资历。而且他们还没结算工资，就把我们从巴斯科尼亚的花名册上划掉了！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公司甚至还复印了很多放假三个月的通知。

就是这样，他们一有可能就随意调动资本和人力——这两样说到底就是工具——而不管是否损害到其他人的权利。

渐渐地，这家公司变成了地狱，压迫变得难以想象。

我们什么都不能干，干什么都要受罚。公司和劳工代表团还有其他组织勾结在一起，为所欲为。毕竟，班达斯的工人又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斗争的三年

从上面的情况不难看出，工人的觉悟在不断提高。

如果说班达斯工人掉进过资本主义的陷阱——它以较温和的方式掩盖了剥削的实质——那么很快我们就会有机会发现真正的现实。

在 1962 年的罢工中——它从巴斯科尼亚蔓延到了整个比斯开

——我们还在继续上班。或许当时我们以为，自己的命运与整个工人阶级的命运无关，我们较优越的工资足以保证自己拥有美好的未来。

随着艾罗多伊上任，公司完全落入巴斯科尼亚的掌控下，上述立场的弱点彻底暴露，我们完全任由公司摆布了。

我们这才醒悟过来。原则上，工人不该为了相差无几的比塞塔互相咬，必须坚定地、一点一点地组织起来，走向反抗压迫制度的斗争。为此，需要在厂内建立防御的手段，并从这一点出发，与其他工人建立联系，加入共同的夺取权力的斗争。

从1964年5月开始，我们真正组织起来了，为了抗议公司拒绝签署新协议，我们进行了15天的罢工。

在此期间，我们选出了第一支团队，它在接下来几年里几乎不知疲倦地工作。从这一新建的团队中，涌现了新的领导者。他们的威信来自履行使命时的奉献精神。

随着管理层施加了更多的压迫手段，我们的抗争也逐步深入，最后在1966年5月，蛮横又癫狂的阿方索·卡尔巴乔·拉卡萨律师被提拔为人事主管，他对员工的压迫简直变本加厉。

在1965和1966这两年里，为了抗议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多次停工了几个小时。有一回，为了留住一名被公司解雇的同事，我们停工了20小时。

工人们一天比一天团结。他们的经验也丰富了。

1966年夏天，我们在工厂里搞了几次集会。经过一系列讨论之后，我们决定参加工会选举，通过公司代表团将合法性与地下抗争的策略结合在一起。在竞选代表团和联络员时，我们最优秀的领导者当选了。当时是在1966年9月。

在十月和十一月期间，管理层又施加了压力，他们想要罢免新当选的代表们。罢工之前举行的几次会议上，我们做好了应对更激

烈对抗的准备。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参加了 11 月 15 日的会议。在 20 分钟里，他都在大谈他们打赢的那场战争，还暗示：“我们都希望以后不需要一场新的 1936 年”。此外，他还声明“公司不会答应任何东西”，然后就走了。在当天的会议上，他“拐弯抹角”地提了下面两点：

“……要了解我们当前的政治形势，还要考虑到政治、社会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代表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它的任务不仅是支持工人的要求，还要向公司提出适当的建议，比如怎么提高产量、改善产品质量、提升现在的工作质量、节约材料、减少浪费、更好地利用原材料、重新利用工业废物、提高工作效益指标、保养机械设备等等……我要补充一点，代表团在这方面的建议很少。他们还让公司更加担忧，因为他们提的要求只会增加运营成本，产生消极的后果，他们各种要求越来越多，但从不关心怎么提高产量和质量。”

罢工爆发前的最后几个月，劳资关系越来越剑拔弩张。很多时候，我们的情绪将近要爆发，但我们的领导者试着说服大家，发动孤立的罢工有风险。我们对之前几年的事情还记忆犹新——孤立的罢工被迅速粉碎，带头工人也都给撤换了——这让我们静下心来等待更关键的时机。

另一方面，我们也试图参与到整个比斯开省的行动中，当地的工人组织都在尝试着把工人的力量协调起来。

但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我们将进行一场反对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最重要斗争，它将实现以往看来根本办不到的诸多目标。

罢工的开始 我们抗争的第一个月

之前的一切，都为罢工做好了铺垫。

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管理层对工人收入减少和厂里的监狱制度还不知足，在 1966 年 10 月开始推行降低生产奖金的总体计划。这项计划是由新上任的部门负责人——工程师乌鲁蒂亚实行的。他带着年轻技术官僚的头脑、虚荣心和贪得无厌的野心，刚来到公司就“考虑”修改奖金的比例。这样做不但能证明他的“科学头脑”，还能在上司面前露一手，对于大多数专家——驯顺的、私欲薰心的资本主义奴仆——来说，这也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和平时一样，他们的做法没有事先争取任何人的同意，甚至不用费心征求劳工代表的授权，因为他们知道，劳工代表从不会要求管理层承担任何责任。因此，他们系统性地减少了各工种的奖金。受影响的工人再次抗议，但没有得到书面答复，只是被口头告知，自己的要求被拒绝了。由于不受约束，他们觉得可以为所欲为，继续逐步推进计划。在热镀锡工之后，轮到了电解镀锡工。我们电解镀锡的同事们——他们的机器是厂里最现代化和性能最高的设备——他们的奖金减少了将近 50%。当他们的要求无人问津后，决定在 11 月 14 日停工一个小时。停工刚开始，那个该死的劳工代表监察员萨利纳斯就赶过来，他对公司的可耻干涉闹出过各种乱子，包括害得以前的公司代表团集体辞职。他跟平时一样，又一次威胁了工人，而没有解决冲突的要害。

当时，金属板轧制车间的工人已经被克扣了一个多月的奖金，每人一个月几乎少拿 1000 比塞塔。10 月 28 日，他们写了最后一份声明——甚至都不想留下备份——要求重新核实他们的工作量，并抗议削减奖金，但是没得到回应。因此，他们决定用勉强达标的合

规最低效率来工作，从 11 月中旬就开始这么做。几天后，为了提高产量，车间部门的工程师卡佩拉斯特吉亲自上阵，叫他的手下通过强制和威胁让工人提高生产效率。管理人员在车间里待了很久，想挑出可以借题发挥的毛病。工程师本人也经常出乎意料地冒头，这是他的老习惯了，所以全厂都叫他“值班老鼠”。他每次出现，都会威胁工人，暗示他们会被开除——不过还要考虑他们之后的表现。这种做法通常是用来向那些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施压，让他们脱离工人的集体行动。这是管理部门的老办法了。当没规定要加班的时候，卡佩拉斯特吉会说：“让我们看看，你们一个一个从我的办公室走过后，都在说些啥”，他就这样一直折磨着比较软弱胆小的人。总之，这是资本主义不变的法则：你越是软弱，受的剥削就越狠。

局面有时非常紧张。关于其他车间和工种也会减少工资的流言——它们后来被办公室里的同事证实了——让所有人都很紧张。到了月底，大家觉得需要做出特别的决定。

11 月 28 日的声明 公司和当局的反应

我们的几位代表在 11 月 27 日星期日举行了会议。所有人一致同意，如果再不采取特别的反抗，工作条件就会让那些可恶的家伙无止境恶化下去。我们认为，如果不能阻止日益加重的压迫，其他人也会受到绝望情绪的影响。其实这场会议没有决定发起罢工，而是在 1962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法令允许范围内起草了一份声明，试图敦促解决奖金减少的问题。这份声明在 1966 年 11 月 28 日一早发出，它还明确表示，如有必要，所有人都将参与罢工。其内容如下：

埃切瓦里冷轧公司代表团

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与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致管理层

鉴于：

受金属板轧制车间三个工作小组的委任，且作为其中一员，对于发生集体冲突一事，我们有责任告知代表团、管理层及主事劳工组织，如果仍未解决引发问题的原因，我们宣布下个星期三停止生产。

在这里，我们简要说明工人宣称的引发问题的原因，并为真实性提供证据。

金属板车间的工作奖金，是几年前根据生产速度和加工材料的种类等条件决定的。

我们多次被要求在中央电机以更快速度运转，即机器转速更快的情况下工作。这将导致产量增加，也因此工作量增加，但任何时候都没有给我们付过奖金。

由于电机被强制以过快速度运转，因此损坏严重。最后它维修了，现在必须按低于限制速度来工作。

在这些情况下，管理层：

(1) 在机器运转速度增加，从而产量和工作强度提高时，没有增加奖金。

(2) 由于上级的原因，例如命令让机器超过最大限制速度运转，导致了机器故障，却扣除了工人的奖金。就和平时一样，他们没有通知受影响的个人和公司代表团，也没有依照《国家工业条例》(la Reglamentación Nacional para la Ind) 第 46 条向劳工代表提出审核的要求。

我们提出了合理的抗议，但问题没有解决。

以下事实加剧了这一情况。

一直以来，工人们都没有用来记录他们工作量的表格。这让奖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了骗局，因为根据《国家工业条例》第 45 条，“应当以清晰简明的方式记录数字，以便毫无困难地计算出各生产者的报酬”，以及公司集体协议中更详细的第 31 条，最后是《内部规章条例》第 86 条。14 日，工人要求公司提供表格，但毫无回音。

由于无法事先算出用不同材料进行生产的相应速度，工作安排就要拖延好久，因此，工人们几天之后才能知道他们正在干的是什活。这种滞后造成了许多冲突，因为在部门中没有负责管理和协调的人。管理层完全清楚这一点，但毫无补救的意思。

由于奖金不公平地减少了，由于工人付出的更大努力没有得到补偿，因此，我们降低了工作速度。

金属板车间的工人从未想过使生产效率低于最低标准。而按照最低工作标准来安排工作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事先算出最低产量及对应的生产效率，但由于缺少计算必要的要素，在计算时又是不可避免错误的。

最近几天，工人们受到了毫无理由的监视，受到了口头上的威胁，并被强迫用最高效率进行操作，这是滥用职权的行为，且违反了集体协议中的规定。

综上所述，根据劳工部于 1962 年 9 月 20 日颁布的有关集体冲突的法令规定，

工人要求：

如果今天上午，管理层没有立即与代表工人的联络员和代表团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我们将向劳工代表提出仲

裁，要求管理层必须：

——根据以前的计算方式来支付奖金。——提供全部关于生产量的数字，并按照集体协议第 24 条中的规定执行。——工作安排最迟不能拖延超过三天。——尊重员工，惩治滥用职权的行为。

以上。

66 年 11 月 28 日于埃切瓦里

签名：胡里奥·埃拉斯·马丁

签名：尤斯塔基奥·帕雷德斯·戈梅斯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66 年 11 月 28 日于埃切瓦里

模糊不清的签名

说实在话，假如劳工代表团真的是一个监管劳动标准遵守情况的机构，如果它真的有仲裁和调解的作用，它就应该当天召开会议，确保问题马上解决，避免冲突。但不要忘记，班达斯工人早有铁证表明这个组织首先是政治工具，它和其它政治工具一样，不过是为了将法西斯资本主义的劳动纪律压在工人身上。因此对它来说，重要的不是寻求解决冲突的公正办法，而是压制工人在声明中表现出的，在一切必要情况下捍卫自身利益的坚定立场。可能正因为这一点，直到 29 日下午，它才召集了公司代表团举行特别会议。这给了我们强烈的印象：工人的决定不受重视。

鉴于官方在 28 日的沉默，29 日上午，几名代表团成员去了劳工代表的办公室。他们受到了劳工代表伊波拉的接待。工人们表示，他们担心管理层没有及时递交工人声明。劳工代表表示收到了声明，

然后他们还得忍受一套套要为公司和“大局”考虑等等的说教。他们受到了无数次的羞辱，空着双手，怒火满腔地离开了。

当天下午召开了工人要求的特别会议，持续了大约四个小时。从会议记录中就能看出管理层的虚伪态度，萨利纳斯监察专员又完全站在了公司这一边：

“1966年11月29日下午3时30分，在埃切瓦里召集了特别会议，本次会议公司代表团在卡洛斯·卡尔巴乔主席先生主持下进行。副主席D·卡洛斯·菲利皮尼。会议秘书D·埃梅特里奥·古铁雷斯，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有德尔·巴里奥、佩雷斯、卡乔、罗德里格斯、埃拉斯、费尔南德斯、拉米雷斯、帕雷德斯、冈萨雷斯、迪亚斯与莫亚。

开场，主席说明了本次会议召开的目的，即讨论由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和帕雷德斯先生提交的声明，该声明在会议上被宣读。

主席认为声明含有威胁的意味，因而公司不愿意采纳声明中的意见。他指出了工人进行申诉需要遵循的方式和合法途径，例如逐级向上申报。发言完毕后，公司代表团立即向劳工代表提出异议。

埃拉斯先生提出，该声明已经遵循了程序，因为约一个月前，这份声明上的要求就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过了。金属板车间的工人除了在各场合口头表达了他们的诉求以外，还写下了这份至今未得到回复的声明。

主席认为，如果声明真的没有得到回复，那一定是因为它还有待研究，但他并不准备采纳它，因为其中含有不合规的内容。

……

代表团成员（埃拉斯与帕雷德斯）提醒主席，酸洗车间、电解镀锡车间、热镀锡车间的员工以及捆扎机操作工都在等待答复。他们还告知主席先生，至今仍未得到他们反复要求的统计员工工作量的表格，这是计算奖金数额所必须的。

代表团成员向劳工代表递交声明时，主席并不重视，只表示已经通过劳工代表了解了工人的需求，并且劳工监察员马上就到场。

劳工监察员先生到场后，主席表示公司愿意同抗议的工人对话，如果没有达成一致，就把事情交给公司代表团处理。如果达成一致，就交给劳工代表。

代表团再次提出反对，因为公司在这些程序和审议中花费的时间太多了。

劳工监察员先生收集了代表团的意见，声称已经向部门负责人提交了书面声明，但工人们表示未得到答复。监察员表示曾与负责人谈过话，也口头转达了工人的意见。他补充说，负责人要求提交书面报告，因为工人意见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提出这份声明的代表团成员埃拉斯先生坚持说，他没有收到答复。

对于这份作为本次会议召开原因的文件，监察员指出其语带威胁，并要求撤回这份声明，用另外的表述重新起草文件，公司会在合理的范围内予以考虑。

代表团成员认为不应当由他们自己，而应当由委托他们的工人对此作出决定。

会议议程结束，18时30分会议闭幕。”

签名：主席 秘书

此处的戳记上写着：埃切瓦里公司代表团。班达斯冷轧。

会议如此这般持续了四个小时，这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即使我们的代表不断遭受压力，他们还是拒绝收回这份声明。

代表团回到了宿舍。其他人得知了会议上发生的一切。很多人都期待着发生点什么。

“他们成天想办法逼我们干活，这怎么受得了！现在要是让步，以后还不得让他们骑到头上！肯定要跟他们干的，我们就干吧！现在这样已经没什么可以失去的了！谁都看得明白，没别的路可走了！”工人们做出了决定：11月30日早上六点，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工人的自豪与顽强，再一次地坚定了他们的信心。而这一次，管理层得到的教训将超出所有人的预料，他们将为接连压迫和顽固不化付出高昂的代价。



罢工开始了

在头两天里，所有部门都停工了。尽管紧张局势还在加剧，我们的办公室同事——加上所有管理层——还在工作。焦头烂额的管理层不断找来代表团，要求向工人施加压力。这么做当然毫无结果。

第一天里，我们每个人都收到了一份信，扬言要解雇和停发工资。他们发出威胁，叫我们回去干活。此后的 163 天中，他们加在我们身上的种种难以置信的威吓与胁迫等等，正是从这份信开始的。

十二月的第一天，也就是罢工的第二天，公司的各个角落都张贴了一则告示，上面宣布：如果我们继续停工，就要下解雇通知。我们拒绝接受发到手上的解雇通知。

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团结起来了。甚至对我们自己来说，这样的团结都是难以置信的。只有了解了之前三年发生的一切，才能够理解它。也就是说——通过上千起小事，通过在各自问题面前团结一致，通过我们中逐渐涌现出的一群领导者（我们完全信任他们，交由他们来组织行动、会议和集会，收集每周的资金等等）——工人当中建立了真正的同志情谊。对于我们的日常斗争来说，这次罢工是意料之外的。在残酷无情的压迫面前，我们时常束手无策，我们曾悲观过。谁又能告诉我们，这将是三十年来历时最长，也是最英勇的反抗法西斯资本主义的战斗！

罢工第二天的晚上十点，发生了一件值得一提的事。第一批被解雇的是本来要从下午两点开始值班的同事。他们意识到了这一切蕴含的巨大不公——他们切身懂得自己为这家工厂付出了多少汗水与辛劳——决定不放弃自己的岗位。没有人提出过一句口号，但相同的反应在工人中间蔓延了开来。来换班的工人们也聚到了车间旁边一栋楼的公司食堂里。在那里，他们得知被解雇了，于是做出了

与上一班同事相同的决定，但公司不让他们加入上一班的同事，于是他们以抵抗到底的同等决心留在了食堂里。

然后，我们度过了充满斗争意志与同志情谊的刻骨铭心的三十二个小时。当天晚上，留在里面的人和车间的同事分享了夹肉面包。夜晚很快过去了。人们围坐在火盆和炉子旁，眼里闪烁着激情的光芒。热闹的茶话会还有歌声和笑话，盖过了睡意和疲劳。

早上六点，第三班工人来到工厂时，一切都组织得井然有序。一些人负责安排就餐，还有一队人负责监视工厂和工程师们的活动，这些工程师在想主意瓦解工人的抵抗，在工人队伍里搜罗叛徒，横加恐吓等等，另一些同事的任务是安排大家轮流休息，我们就在地下室里临时准备的纸盒和床垫上睡了觉。

到了八点半，我们都自发聚在工厂里。我们成群结队地在厂房旁边和管理层办公室前面慢悠悠散步。虽然当晚十分疲惫，每个人的脸上都露出了坚定的决心和每天不断增长的与压迫者抗争到底的意志。

管理层开始紧张起来。他们没想到出这种岔子，必须作出回应。没有什么比威胁和诽谤更好了，这是管理层惯用的武器。早上九点，每天给餐厅运面包的小货车出现后，我们请送货员把剩下的面包卖给工人。他愿意再送一趟面包，但为了不连累他，我们谢绝了。一大群人找我们买面包，当场付了钱。而在办公室里，运营经理希斯内罗斯和人事主管卡尔巴乔还有其他人，给警察、国民警卫队、工会和劳工代表打电话：“罢工者用武力袭击了一辆运面包的车，抢走了所有的货物”、“他们还威胁所有进入车间的人”、“侮辱职员”、“阻碍工作”等等。代表团听说了此事后，当着所有人的面揭穿了这些虚伪的指控。当时的会议记录如下：

“主席先生声称我们在装卸货物时，阻止了货车的正

常行使，按照主席先生的说法，货车受到了袭击，工人拒绝离开工厂附近。按照公司的说法，这些扰乱了公共秩序，因此要把这些告诉省长，用政府的力量强制工人离开此处。

一位代表团的成员发言说，他不知道什么叫‘公共秩序’，因此也无法转告给主席口中的‘扰乱公共秩序’的人，代表团的成员们都知道，要传达给工人的信息不过是：公司认为公共秩序被扰乱了，于是要用武力驱逐工人。

为此，主席给了代表团成员三刻钟的时间，然后把他们的决定告知他。

到点之后，代表团再次开会，代表们告诉会议主席：他们收集了大家的证词，事实证明小货车的正常装卸从来没有被阻碍过，只是一群工人经过的时候，偶然挡住了这辆车，当被告知他们挡住车了以后，工人就散开了。至于那辆小货车，它根本没受到袭击。当司机把面包送到食堂之后，他只是把剩余的面包卖给了工人，工人也正常付了钱。代表团的成员并不否认发生的事情有些乱，但这是人员聚集以及困扰人们的饥饿带来的必然结果。

同时，主席很清楚大家也是这一态度。”

管理层的意图很明确：这样的情况是无法容忍的，得用武力来解决。他们连工人留在厂里几个小时都不愿意。要不然我们可能忘记，自己只是为他们效劳的奴才。

由于代理省长的优柔寡断——他在选举前夕更想在幕后行动，而不愿摊上丑闻——管理层最初的打算落空了。劳工代表和管理层达成一致后，与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开了会。

平庸的卢克桑代替伊波拉完成了使命：镇压、威胁和斥责。再次发生了这样的场面：“你们犯法了”、“罢工者的态度扰乱了公共秩

序”、“我们收到了运面包和运锡的货车遭到暴力袭击的消息”、“你们的声明是威胁性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当然，肯定不能让他唱独角戏。我们的代表勇敢地走上前，揭露了正在上演的闹剧：“我们每天也受到了很多强迫，我们找了你们那么多次，但还是受着更多的不公正待遇”、“我们的同事都及时通知你们了，还想让我们怎么样？”、“看起来你们只看到我们在违法，好像公司不是一直为所欲为一样”、“如果法律是坏的，那就把法律改了！”、“这简直难以置信，我们几乎没怎么准备过这些事，而你们却抓住了所有细节”……

最后，会议无果而终。我们的代表毫不动摇地站在了全体工人的立场上。



分发传单

从12月1日起，我们就开始分发传单，上面逐日记述了我们的罢工活动。传单向罢工者传递消息，表达我们所有人的观点。它的每一篇通讯都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进。透过通讯表达的思想，我们的

工人觉悟不断增强。靠着公司和警察深恶痛绝的秘密渠道，我们在五个半月里，一天都没有停止出版活动。

第一篇通讯写道：

“在工会和劳工代表等的干涉下，管理层硬要加重工人想解决的问题。”“他们还在用傲慢的态度挑衅，但只要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条件、停止不公正的对待，我们就要继续罢工。”

这些传单极大鼓舞了我们。最初的几个小时里，当一切都未尘埃落定，传单的出现让我们感到：我们背后还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不是赤手空拳在战斗。

次日中午，当大家都在工厂时，“当日传单”送到了我们的手上。外面的同事和朋友，一大早就把传单给了我们的妻子。让我们摘录几个段落：

“我们正在书写工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章。对我们的解雇是无效的。我们不会离开这里。我们就呆在这里，有错的恰恰是他们。他们那样压迫我们，他们从我们身上掠夺了那么多：承诺、奖金和职称；他们对我们的惩罚如此不公平，只能用暴力来落实；别把罪责归咎于任何一个工人。有错的是他们。我们的妻子现在很平静，她们也为我们感到自豪。我们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她们，更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他们在明天能被像人一样对待，无忧无虑地生活。振作起来!!! 冷静下来!!! 带给我们食物和香烟吧。今天下午，妇女们也来到了巴萨乌里工会。”

我们的妇女们展现出了顽强意志、团结能力和牺牲精神，在几个小时里给我们带来了装满食物和香烟等的纸袋和包裹。为了给我们带东西，她们有很多人来到了工厂的大门口。她们被绰号“巴利阿多里德人”的警卫粗暴地拒之门外，这也是由人事主管指示的卑劣的压迫伎俩。她们中有个人甚至被用力推倒在地，旁边的人反应激烈，警卫不得不后退。最后她们隔着工厂周围三米高的金属围栏，把袋子扔了进来。我们可以隔着围栏交谈，听到她们的鼓励声。很多时候，她们在送食物的时候会附上几句话：

“你们坚持一整年也没问题。”“不用担心我和孩子们，我们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们待在工厂的其余时间里，这样的场面持续了很久。很难描述当时的心情。我们的妻子、工人朋友在外面，我们则是在里面，受着他们满怀热情的支持；所有人都经历了难以忘怀的时刻。

几天后，一位办公室职员告诉我们，一些工程师和其他管理层，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尔巴乔等人从对着围栏的窗口上取笑我们的妻子，还说三道四。

驱逐

2 日下午是我们在厂里的最后一个下午。管理层没能从政府那边得到关厂令。省长在生病，而代理省长没有点头。但是必须记得，资本主义还有很多的镇压力量。国民警卫队唯命是从地进行了新的镇压。别忘记了，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等人都是法西斯军队的预备役。在他们和龚德拉的要求下，晚上 8 点，从一片漆黑中，

开来了第一批载着国民警卫队的吉普车。队长在办公室稍作停留后，来到了食堂，说是政府命令他疏散工厂。我们要求他出示书面文件——“我是通过电话接到命令的”。我们的回答很明确——“没有书面文件，我们是不会离开的”。然后他们就开始威胁，他们做得最绝的是在晚上 11 点——在他们和管理层与工程师们策划好采取行动之后——大约 50 名拿着冲锋枪和步枪的士兵把我们赶了出去，还用枪托吓唬我们。食堂里的人被赶了出来，然后是车间里的同事。我们被赶到了办公室前面，被士兵团团包围。我们的剥削者透过窗户看着“行动进行中”，对这场表演心满意足。

同一时间里，我们的妇女们占领了工会。我们用传单通知了她们中的很多人，晚上六点在巴萨乌里工会开会，大约有两百多人到场。当时也举行了代表团的会议，我们有必要向代表团表示支持。她们也是班达斯工人，当我们占领工厂时，代我们履行职责是很正常的。她们到达工会后，却被拒之门外，并被告知代表团会议将在毕尔巴鄂举行。尽管如此，我们的妇女还是坚决进入了会场，要求解决我们的问题。官员们吓坏了，给他们在毕尔巴鄂的上级打了电话：——“班达斯的女人们闯进来了”；——“她们要求工会介入”；上级立即回答：——“马上赶出去”，地区劳工代表回答说：——“你们要是动她们，可要吃不了兜着走。”代表的回答很明智，他们意识到了动武的后果。会场被占领了四个小时。她们说，如果有必要，会继续占领下去。要不是听到国民警卫队把我们赶出厂，她们肯定会坚持下去。在紧张的 32 小时后，她们就赶来看我们了。

就好像是预见未来一样，第三天早上的传单上写道：

“工人历史的一章将会变成一本书。是的，为了讲述这三十二个小时发生的那么多伟大的故事，需要写下很多的页数。这里面有多少同志情谊、团结精神与勇敢的壮举

啊!! 这里有多少觉悟的工人意识!! 我们的女性劳动者做出了怎样的榜样! 她们向我们证明了, 她们也在用自己的力量和剥削者进行着殊死斗争。

现在, 我们希望在技术人员、车间师傅和管理人员身上, 也看到这样的力量。

对于管理层来说, 今天同样是快乐的一天, 因为它写下了资本主义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在那几个小时里, 他们把公司变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一座军营!! 国民警卫队用冲锋枪指着我们工人!!

我们会向你们算账的。听清楚了: 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 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 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

虽然没有枪, 我们希望有一天也把你们——卡尔巴乔、希斯内罗斯和卡佩拉斯特吉——也都赶出去, 你们已经有了一个无法抹去的“头衔”: 人民的敌人。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没有露面的大人物, 那些派你们来、让你们用卑劣的手段为他们效劳的资本家。”

在星期六上班时间里, 这张传单也到了办公室职员、车间师傅等人的手中。看见我们被赶出去后, 他们也下决心了。于是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人事主管面前走过去(还受到了他的威胁)加入了罢工。到了星期一, 留在里面的最后一批人都出来了。总共有四个工贼, 我们都不屑于提他们。

从那时起——除了工程师和专家外——所有的工人到最后一刻都保持团结, 这是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的典范, 它表明了如果团结在一起, 我们将会拥有怎样的力量。

这场冲突开始时, 没有人预料到它会持续那么久。我们一般只

罢工几天。出于这样的看法和战术上的原因，我们认为代表团和联络员们没有宣布罢工是适当的。对此，我们一致同意何塞·奥萨巴同志（他在厂里当杂工，也学过法律和经济）的意见。管理层拼命想除掉他，那我们就更想把他留住。

同样，部分罢工者被留作后备。他们的任务是留在厂里，监视容易发生火灾或爆炸的设施，比如储气罐、电机房和锅炉房等等。

这些决定是我们自己做出的，而不像工会认为的那样是强制性的。

从5日到10日，过去了一周，我们还在等待劳工代表的决议。前几天工会拒绝介入冲突，最终召集了工会调解委员会——它由相同数量的工人与雇主代表组成——讨论奖金问题。对他们的态度转变起到决定作用的是，我方代表团向马德里的官员发了一份电报，在这封电报中提到：

“鉴于比斯开金属工会拒绝解决班达斯轧制的冲突，我方要求国家金属业主席立即到场。”

后者立即给毕尔巴鄂打了电话，命令工会介入此事，甚至派了两名生产技术人员来协助调解委员会的工作。到了第八天，该委员会做出了有利于工人的报告，承认减少奖金是违反规定的，但这一结果对任何人都不具强制性，因此毫无意义，它仅仅是让劳工代表的工作好做一点。而劳工代表又拖了几天才得出解决方案。

我们组织起来了 最初的集会

与此同时，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举行了会议。从中午一直开到

七点，我们组织了一支三百多人的队伍，任务是跟进冲突的进展，并回收分发下去的传单，以免遭到秘密警察的“追捕”——有大批的秘密警察监视着我们，配备了好几辆全副武装的吉普车和巴士。我们开会的地点，没法让所有人都听见代表们的声音。说来惭愧，工人们只好在街上开会。为了缓解局面，同时看在工会的面子上，我们得以借用当地奥查考加（Ocharcoaga）的教区学校。

对于这场罢工来说，那几个月的重要性和意义是最大的。我们的集会是一所真正的工人运动学校。它直接和根本的目的是让所有罢工者都参与进来，听取所有意见后，更好地做出决定。的确，如果不能这样开会，那么我们抵抗的能力就会被极大削弱。在这三十年里，由于无法集会和缺少组织，许多罢工都坚持不下去。法西斯资本主义非常清楚怎样防止工人使用自己的基本权利。这一点也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受到了怎样的凶残镇压。

为此，工人无数次质问当局：为什么允许资本家开会，允许他们组织起来，还向他们发放贷款等等，而我们就被禁止在自己的地方开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会和罢工基金？这些问题不需要回答，因为工人非常清楚原因：政权是那些幕后牵线人手里的木偶。而在西班牙，资本家用来操纵政权的木偶线如此之多，如此有力，以至于这些手段都是相当露骨的。这些政治闹剧不过是为少数金融和工业巨头的利益服务的。

在罢工的头一个月里，当局不敢直接动用武力。有几个原因让它没法出手：大选前不能闹出丑闻，加入了“共同市场”的西班牙也得“允许罢工”。

如果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并且是反对大选的，情况对龚德拉会更有利，正因为事实并非如此，他关于立即镇压的要求被搁置了。此外，他们使用了其它更巧妙的手段向罢工者施加压力，从来没人认为罢工者能撑得这么久。第二个月里，这场冲突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力，我们的解雇案上了法庭，期间的劳资停战束缚了政府的行动。但是，政府的行动没有满足龚德拉的胃口，他的想法并不是“先进资本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而是像老权贵一样，代表部长们的“强硬路线”。虽然龚德拉和巴斯科尼亚董事会都是精明的商人，但在这里犯了大错，因为他们这是在促使工人觉醒。事情就是这样。⁹

当时，警察得到的命令只是控制住我们，再渗透进奥查考加的集会。集会一直持续到当月中旬。教区的学校容纳不下我们五百人，所以我们打算再找一个地方。在当时的奥查考加，工人正在紧张地经历着这场罢工最重要的时刻。



⁹ 我们必须强调一点——因为它会对工人斗争的未来带来危险——埃切瓦里的经理，“先进”的年轻资本家何塞·路易斯·埃切瓦里（José Luis Echevarría）是新资本主义的领导者，他正在用一种古老的欺骗手段来麻痹工人，也就是给他们提供廉价的股份，把他们“提高”到小股东的无力状态上。——原注

口号：抗争

12日，省劳工代表的决议正式下达。这份让人半懂不懂的文件忠实地反映了那位劳工代表伊波拉·洛斯特的为人：费尔南多·龚德拉与资本主义的奴仆，一个狡猾的家伙。（后来，审判中的证词暴露了这份决议的真正意图，明确承认了管理层调整工人奖金的做法是非法的，并裁决恢复奖金至原有数额。）

这一天里，我们的代表团在公司参加了会议。以下是会议重要部分的记录：

“……主席声明，鉴于劳工代表的决议，公司决定遵守其中的规定，因此它首先将向代表团成员提供目前的奖金制度，即车间内的规章……”

然后，主席请与会者审查这些条例。代表团成员应目前罢工人员的要求，同时代表他们向主席递交一份文件要求签字，其中向公司管理层提出了建议。以下是逐字从中摘录的内容：

(1) 将全体员工恢复到之前的职务，包括相同的职称、相同的权利，乃至集体冲突前的所有权利，不追责，且撤回批示的文件和发出的解雇通知。

(2) 遵守比斯开劳工代表的裁决，其内容也同样适用于以下工种：电解镀锡生产线、热镀锡4号和5号机、机械维护部、电力与总后勤部门，及其他生产部门。

(3) 遵守法律以及集体协议中，涉及管理层与员工和公司代表团等等之间关系的条文规定，尤其是上述条例涉及对待员工的方面。

一旦上述三点得到解决，工作人员便回到工作岗位。

宣读完这份文件后，主席表示明天可能发出公告，其中将答应新的工资要求。同时表示要核实工人的资历，补偿他们因工龄问题蒙受的损失。会议对这份文件的其他方面也予以承认，但没有在文件上签名，因为主席声称谁也不能预料以后的事情。”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等着代表团回来。这些消息在我们中间激起了极大的愤怒。绝不可能接受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他们就是想解雇我们！这里再次流露出了伟大的工人意志。我们的代表表示，他们会用为数不多的合法手段继续斗争，我们所有人也都表明了继续罢工的态度。当天，大家还决定就解雇向法院提起上诉。

从那一刻起，事情已经非常明白了：管理层想达到目的，需要的只是时间。但只要我们还有力量，只要情况还没有绝望，我们就要提出抗争下去的口号。接下来几天的传单里，再清楚不过地表现了这一点。

“他们真是狡猾，想让我们被疲惫压倒。我们的抵抗要像砌在城墙上的顽石一样坚固。团结就是我们的壁垒，每个人就是一块坚石……公司要给我们一块‘蛋糕’，但代价是让我们的同事受到损害。我们说过，我们决不会放弃诺言，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的路。有些人可能担心公司的决定。但是我们会不会答应它……我们是正在觉醒的新人。如果想玩弄我们，就要当心不要唤醒人民。”

管理层的企图居然落空了。别忘了，三十年来，龚德拉和许多资本家完全操纵着工人阶级。在这些情况下——这一点已经在罢工的几个月内暴露出来了——他们再也不能轻而易举地挫败工人的斗

争了。以往总能打败工人的龚德拉，这次他的自尊可要大受打击。他就算用上了所有的镇压手段也没能让我们屈服！可以说在半岛，或者至少是在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已经没法再以胜利者自居了。因此，12月14日传单上的话具有重大的意义：

“那些想看到我们乖乖回去工作的人，现在该有多么惊讶啊。我们发过誓，并且也会实现我们的话——既然你们拿枪赶我们走，除非我们的权利得到承认，否则你们也得用枪才能让我们回来！！尽管来吧！！我们将把这两个月的罢工写在工人历史上！！”

在最开始的日子里，两个月的罢工对我们来说简直是痴人说梦，那在当时可是无比光荣的壮举。谁能想到，我们不仅坚持了两个月，而且在之后又坚持了三个多月之久啊！

个人的要求 办公室职员：公司的希望

管理层意识到自己的天真后——他们觉得工人会很快回到混乱又毫无尊严的工作中——只好采用新的威胁。那些人在12月1日坚决要开除我们，在12月9日给我们每个人的挂号信中声称公司“决定让您永远离开工作岗位”，现在却要我们全回去上班。他们这样做，只是再一次表示威胁，既然他们已经让我们“永远离开”，可以认为他们并不需要我们。当然，资方正在假装招募新员工。按照洛佩斯·马图拉纳的提议——在未来的几个月里，他会想尽办法对付我们——公司在当地报纸上刊登了招聘启事，并写明岗位申请“通过邮件受理”。我们在当天的传单上，揭露了公司的真实意图：

“为了分裂我们，管理层从贫乏的脑袋里又想出了阴谋的主意。他们说，想到班达斯上班的人可以‘书面申请’！他们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说虽然我们不敢进去教训‘四小鬼’¹⁰，但看了招聘启事，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写信讨工作。这是为了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错了！！谁要是上了套，我们都会看到……”

虽然我们当中没人搭理过这种令人气愤的做法，但在最初的二十天里，管理层对办公室职员寄予厚望，企图通过他们来破坏大家的团结。于是，通过一些藏在队伍里的叛徒，他们试着单独找一些文员谈话：——“大家都是员工，我们应该解决各自的问题”，蒙赫（卡尔巴乔派来的走狗之一）说道。但是，大家的尊严与团结再一次挫败了他们的肮脏阴谋。我们不仅之后将和办公室同事一起开会，而且在加入罢工的他们提议下，我们将消灭职位的差别，都成为大写的工人，不管坐不坐办公室，也不管工种职称是什么。这项让所有人团结如一的做法，可不只是一场简简单单的胜利。在传统的绝大多数罢工中，办公室员工都留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在背叛同事，也没有身为劳动者的自觉。因此，在罢工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在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文员和管理层下属部门的职员，她们在斗争中经常走在前头，为集体事业提供了宝贵的帮助，反过来教训了多次试图让她们背叛的人，那些人还认为办公室职员更软弱更“驯服”。在这十五天里，伊达尔戈·希斯内罗斯的话一直在她们耳边吵个不停：“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有更优厚的地位，不应该加入罢工者”、“如果你们离开岗位的话，公司会考虑你们的去留”……

¹⁰ 上文提到工人中间有四名工贼，他们在罢工后仍然继续工作。——中译者注

官方工会的丑态

12 月的下半月，民族工团主义中心¹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想办法发挥其工会的作用。

12 月 21 日，我们派去马德里的两名代表往毕尔巴鄂打了一通电话，他们被告知：国家金属业主席——工程师埃斯瑙拉已经召集公司在第二天开会。当天晚上，代表团的其余成员准备次日一早动身前往毕尔巴鄂。

在整个 22 日里，代表团——他们疲惫不堪又昏昏欲睡——还有工会的政治干部都在等龚德拉答应派来的代表。他们白等了，不管是这一天还是后一天，管理层派来的人始终没露面。就算我们的领导者非常愤怒，埃斯瑙拉还是给公司找借口，当然了，他根本就不会有什么反对资本主义的立场。垂直工会¹²及其所谓的“调解”角色，再次变成了笑话。

12 月末和 1 月初，在毕尔巴鄂开的其他会也都没什么用。卡尔巴乔说，公司是一棵病树，必须修剪掉损害它的枝干。代表团反驳说，他们同意这是棵病树，但砍掉的枝干肯定是不再长上去了。

就这样，民团工会已经无力干预我们不断成长壮大的斗争了。从 1967 年这新的一年以来，我们已经成为了整个半岛上工人抗争的

¹¹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 Nacional Sindicalista, CNS）是长枪党建立的工会组织。在弗朗哥法西斯政权下，它是唯一的合法工会。1935 年长枪党成立了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Central Obrera Nacional-Sindicalista, CONS），1940 年，民族工团主义工人中心与全国雇主联合会（Confederación de Empleados Nacionales, CENS）合并为“西班牙工会组织”（Organización Sindical Española, OSE），它的地区组织称作“民族工团主义中心”（Centrales Nacional-sindicalista, CNS）简称“民团工会”。——中译者注

¹² “垂直工会”（sindicato vertical），即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炮制的御用工会，由于它禁止工人之间发生横向的联系，只允许对工人进行垂直的、自上而下的统治，故被称为“垂直工会”。——中译者注

中心与象征。

在关于解雇问题的审判中，合法斗争的策略也发挥了作用，在一月——也就是罢工的第二个月里——这就是我们整个战略的重点。

审判 准备工作 意义 宣判

直到 12 月 12 日，劳工代表才发布决议，公司代表团也在这一天召开了会议，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向法院提出上诉。

但是，当我们看到公司的态度时——他们想让我们空手回去，还想解雇我们的同事——事情就开始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

在 9 日，我们收到了一封给 564 位罢工者的挂号信，上面正式通知了解雇，因为在 2 日里，我们又拒绝回去工作。因此，我们有十五天的时间可以提出申诉。

在履行所谓的程序后——拜访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律师，起草要求，递交上去等等——这段时间很快就结束了。为了争取时间，律师建议我们让工会进行调解，因为这样一来，申诉期就能被顺延到调解之后。

我们的代表到了工会，要求工会立下单据并签字。我们得知，必须在第二天到巴萨乌里当地的工会办公室去。所有罢工者都赶去了，但是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不能去，因为他们要到毕尔巴鄂开会。在他们缺席，罢工群众也被蒙在鼓里的情况下，我们签署了工会给的文件，后来检查文件后，我们的律师惊讶地发现它们并不是关于调解的单据，而是由拉迪诺人¹³卡布雷哈斯负责的工会法律服务处（los Servicio Jurídicos Sindicales）匆忙准备的起诉书，我们感到

¹³ 拉迪诺人（ladino），西班牙人和南美土著人的混血。——中译者注

被侮辱了，他们为了“挽救自己的荣誉”，让自己的律师把案子抢了过来。（就这样，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工会还在拖后腿、假装赢得了我们的信任，并在工会报纸上——毕尔巴鄂的《铁报》（Hiero）和马德里的《人民报》（Pueblo）——发表了一些记录，他们太丢人现眼了，都不配我们搭理。）

有意思的是，垂直工会觉得公司雇了自己的律师，是对“他们工会”的不信任，毕竟欺骗群众这种事，让他们工会来干才是最合适的。

正如上面所说，我们班达斯的工人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月都自掏腰包，请私人律师来给我们提供正直的辩护和需要的法律支持。

在能够自己组织起来之前，我们只得借助工会的法律援助。我们在他们那里受的屈辱是一言难尽的，例如都开庭了，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来干嘛的，就当日常事务来做，完全没准备。（他们连发生了什么都搞不明白！）更不要说法官、工会律师和公司之间的亲密关系了，案子就好像是他们的内部问题一样。我们的一位同事说过——在以前一桩他们吹嘘的“调解”中——“他们像是我镇上的吉普赛人。要卖一头驴子的时候，总是会开十倍的价，无论再怎么讨价还价，他们最后还是赚到了。这里的情况是一样的：公司（他们要惩罚我方的工会联络员）一开始开的价很高，让它减少了一点要求，它就立马答应成交了，然后工会就跳出来说已经安排妥当了。”

这不过是问题的表面。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工人阶级完全被排除在规则的制订之外。我们来看，是谁组织了工会和法院？是政权。是谁建立了政权？是资本主义。工会和法院是干什么用的？用来束缚工人的手，再假装是在保护他们。

甚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工人阶级直接受到资产阶级的压迫，而法官、律师和工会的政治干部，把自己

卖给了资产阶级，他们至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当我们走进法院和民团工会那种地方时，总觉得走进了敌人的地盘。他们也拿我们当敌人看待。仅仅是工人的身份，就让我们受到了多少次被当成说谎者的屈辱！是的，在只有证词的情况下，特鲁埃瓦（Trueba）和希伯特（Gibert）——这两位法官平分了贿赂——多次指责工人：“你们看，工程师先生和董事先生是不能撒谎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现实下，我们看到他们不仅撒谎，还诽谤我们，实行不公平的惩罚和压迫我们，我们非常清楚那些把自己出卖给金钱的人，干得出比这些更过分的事。所以说，法官也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劳，否则他们就不会待在那些位子上。

我们为什么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了解了我们的想法后，许多人会问：为什么班达斯工人会求助于法院？为什么对你们的集体解雇提起上诉？答案在我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当到处都是妨碍工人行动的重重困难，最坏的作法就是逃避，离开阵地，什么都不做，让我们就这样被打垮。更糟糕的是，这样做会引起我们的麻木和退缩。走上法庭的时候，我们知道胜诉的把握是很小的。但是我们这样做，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工人克服了行动上的犹豫不决，下决心和公司对着干。同时为了声援，其他同事也旁听了审判，这也激发了工人们的团结。除了发现我们受到的无数欺骗之外，我们还意识到了必须斗争、必须反抗。而对于公司的辩护士和诸多惩罚的指使者卡尔巴乔，以及工程师、专家和其他管理层来说，毕恭毕敬地在法庭上作虚伪的证词，并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事情。这一切都是为了揭露公司中的深刻压迫，让我们意识到是谁造成了这种压迫。这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工人正

在团结起来、组织起来斗争。

这样一来，不难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把解雇的案子告上法庭。事实上，法院的最大成就是捍卫了不公正，因为《劳动法》是用来镇压工人的，法官的思考方式也从未超出主流舆论。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这恰恰是因为每个人都孤立地看待自己的事，没有注意到这也是大家的事。

毫无疑问，我们的所处环境受到了沉默和无视。报纸不仅是为了审查制度，也是为了所属的资本集团服务的，这件事和其他可悲的现实，都被法西斯独裁所掩盖了。

只有没法再视而不见时，报纸才被迫开口，但即使它们带有倾向性，也无法掩盖当时的斗争是为了人民事业的伟大利益而进行的。

我们懂得，出于政治上的原因，我们无法赢得这场审判。我们也指出，这个案子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只有在罢工权和工人自己的工会得到承认的情况下，我们才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判决，但这同样会导致这个垂死制度的崩溃。

尽管如此，班达斯的案子必然造成巨大影响。它将成为铁证，暴露这个政权的一切腐败、揭露工人阶级的真实状况——而这正是政权竭力在国际组织面前掩盖与伪饰的。我们确实想要赢得道义上的胜利，彰显我们的权利。在辩护时，我们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宣示了罢工的正当性。我们的辩护是有力可信的，并且实现了目的。

如果不对解雇提出上诉，15天期限后事情就了结了，而且公司还可以按照雇佣合同，威胁把工人赶出房子。（事实上在四月份，向中央劳动法院（el Tribunal Central de Trabajo）提起的上诉被驳回后，公司就发布了一份声明（当时已经进入了“紧急状态”），威胁我们不复工的话，就要被赶出家门。）

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的艰难抗争来说，真正的问题是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团结与牺牲精神，还要灵活运用战术。后者使我们在走进

比斯开法院之前，可以用合法的程序搞斗争，向法院提起上诉等等。于是，我们把残暴的武力镇压推迟了足足五个月，使罢工坚持了五个月之久。到了那时，半岛工人阶级和国际上的工人们已经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在敌人控制了报纸的情况下，是怎样与法院、工会、警察和政府等等作斗争，最终赢得战斗和削弱对手的。更不用说这场运动唤醒的工人团结所具有的价值了，在我们的帮助下，工人的事业已经往胜利的方向迈出了一步，狠狠打击了那些想尽办法阻碍我们团结的人。

同时，有一些人回应了我们的需求，给予了至关重要的帮助，他们是阿隆索·加西亚（Alonso García）和鲁伊斯·希梅内斯（Ruiz Jiménez）教授，还有我们的律师卡瓦耶罗（Caballero）、阿雷东多（Arredondo）与希梅内斯·德·帕尔加（Jiménez de Parga）。这也是一次让审判尽可能公开的机会，它能沉痛地打击资方无数次肆意妄为地将工人领导者单个或是集体解雇的做法。还有下面将要谈到的，一直以来都是那么无耻的、工会对代表团和联络员下的保证，他们所谓的“没有随意解雇”等等。



最后的准备工作

在我方律师写好起诉书后，我们就必须认真做好组织工作。在朋友们的帮助下，我们将这份文件复印了几千份，因为每个人都要一式四份。工会法律服务处把事情搞得很复杂，因为卡布雷哈斯要求我们每个人都签署一份放弃工会法援的文件，即使我方代表团从一开始就告知了他们。

有趣的是可以看到，以前从未真正捍卫过我们权利的人，现在却对此事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他们要表现出自己作为工会的“职能”，假装自己是被工人接受的。更何况这桩案子里有那么多人被解雇，他们就更需要这么做了。（当判决对工人不利后，法律服务处发表了一份声明，指责我方律师不称职，声称自己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工人辩护。）

为了避免牵扯到其他的人和事，我们在起草起诉书时需要很谨慎，要花很大功夫。我们按期写完了起诉书。在正常情况下，这很简单。但当时，我们不得不临时上阵，尽可能地利用工会提供的，而不是由我们的地下组织收集的材料。是的，我们有地下组织。罢工迫使我们用临时的组织来满足对于真正工会的需要，这一组织不是为了最优秀的积极分子服务的，它在长期的地下活动中，为六百多人解决了眼前的急迫需求：场地、印刷、交通和资金，甚至是医疗援助。不难理解，尽管地下组织通过它的积极分子向工人提供了帮助，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帮助都是不足的。

随着开庭临近，我们的期待也与日俱增。集会上的气氛也变得更活跃。我们的领导者不断重复：“罢工不会在法院取得胜利，它是为了我们的团结和抗争。”“我们去打官司，不是相信法律会支持我们，而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改变。”“这将会是工人阶级历史上

少有的成就，就算目前来看我们遭受了失败，但长远的角度上，它是一个重大的进步。那些在芝加哥为了争取八小时工作日而牺牲的人，他们没有享受到这项权利，但是接下来的几代人，却收获了由他们播下种子并用鲜血浇灌出的成果。”“我们这几个月来承受的一切，还有这场审判，无疑会迫使他们承认我们所受的不公平。或者说，让他们在我们的压力下承认这一切，只有资本主义再也顶不住我们集体的力量时，它才能承认这些不公。”

我们费了很多周折，得到了使用司法宫大厅的许可，这样一来，就不用在当地劳工法院十分狭小而老旧的房间里开庭。就算我们得到了许可，举行会议的大厅也都重新粉刷过了，法官们还是不愿挪出自己的小窝——它们每间最多只能容纳二十人，而且通常都不会被使用，因为审判都是在私人办公室进行的，这是为了不让别人旁听。

最后，在大家的期待中，终于到了1月14日这一天。

审判开始 证人 法官离席

时间很早的时候，就有上千人聚在法院前面了。

这些人大部分都是班达斯的工人，还有我们的妻子。跟着一起来的，还有当地其他工厂的许多工人。来的人里还有学生、律师、神父……以及混在人群中的所有社会政治部¹⁴的秘密警察。

很多工人早上就到了，另一些参加了下午的审判。由于审判将从上午9点一直持续到晚上8点，期间我们没有离开法院，最多只

¹⁴ 社会政治部（Brigada Político-Social, BPS），正式名称为社会调查部（Brigada de Investigación Social, BSI），是弗朗哥法西斯政权的特务机关，1941年3月8日成立，1978年12月4日撤销。——中译者注

是在附近的酒吧里吃点夹肉面包。

早上，法院达成了调解的决议。由于场地条件对审判过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听见我们的答复，我方律师只能走到外面，大声把公司的提议喊给我们听。“**要么全走，要么全留！**”的口号，表明了我们对于解雇的坚定态度。在只能容纳二十人的房间里，挤满了整整一百多号人。其他人把脸贴在玻璃上，想搞明白里面都发生了些什么。

这样一来，大多数被解雇的工人都跟不上审判的过程，到了中午我们就要求安装扬声器，让走廊、广场和街道上也能旁听里面的情况。法院官员拒绝了，但是工人的强烈抗议还是迫使他装上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很快把下午开庭所需的材料准备好了。于是，上千名与会者的紧张情绪得到了缓解，他们挤在一起，因为看不到法庭而冒汗，现在他们就能听见律师和证人的发言了。工人和学生的脸上洋溢着捍卫我们的热情，他们的面孔一起汇成了一幅壮丽的景象。

至于审判的经过，在这里无需赘述，因为巴塞罗那的新世界（Nova Terra）出版社出过许多这方面的书。

只需强调它的重要性就够了，这些天里，即使在法律这样模糊的领域内，工人们也难能可贵地感受到了自己的正确。

当阿隆索·加西亚和鲁伊斯·希梅内斯用他们出彩的辩护，把龚德拉的律师鲁伊斯·萨拉斯（他没什么本事，只会拿以前开除罢工者来说事）逼得直冒冷汗时，这是多么难以忘怀的、充满希望和欢愉的时光啊。

但是，提一下鲁伊斯·萨拉斯这个人也很有必要。他的辩护不过是向公司献媚，还说我们的要求和这场冲突都是没有依据的。对于我们受压迫的现实处境，这一点是相当重要的。因为鲁伊斯·萨拉斯不仅是在为法律的不公正辩护，同时也在为资本主义最露骨的不平等辩护。

在鲁伊斯·萨拉斯帮龚德拉打官司的几个月后，他就被提名为西班牙法院（las Cortes Españolas）的检察官，并在 67 年 9 月 26 日的《西班牙邮报》（El Correo Español）上发表了以下声明。采访者问他：“如果当选，您在未来有什么规划，或者有何致力实现的目标？”我们从他的回答中摘录了部分：

“……我将始终致力于为西班牙和比斯开服务，毫无保留地忠于元首弗朗哥、忠于我们‘七月十八日’的理想¹⁵和《国家基本法》（las Leyes Fundamentales del Reino）。我们要一个有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作支撑的，在社会、政治和文化上不断发展的，统一而强大的西班牙。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接受为了‘西班牙万岁’的伟大目标而实行的一切。在经济方面，必须对生产财富的活动进行有效坚定的协调与领导。在社会方面，我们要保障劳动者受到特别的关照，让他们在国民收入中取得最大的一部分，因为在分配生产收益时，工人必须占据特权地位……所有这些都基于我们的信仰，它也是全体西班牙人的信仰，同时它又给我们每个人都提出了义务……”

那我们还要求罢工权呢。这些奴性十足的人把法庭当成闹剧，还想来继续欺骗我们。

律师发言完之后，证人们开始宣读证词。也许我们的剥削者很少受到当时那样的侮辱。他们上去发言时，只能从我们身边走过，还得听着许多在其他场合绝不会听到的话。他们的发言也很有代表性。尤其是龚德拉的证词，它很好地展现了我们的处境。被问及“罢工是怎么开始的”、“头几天做了什么决定”等问题时，他只能紧张

¹⁵ 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时期，叛军在 1936 年 7 月 18 日挑起内战。——中译者注

又笨拙地辩解，还想躲在公司和政府的背后。“解雇罢工者之前，我请示了政府，是上面叫我这么做的。”“金属板车间奖金的处理方案，虽然我没有参与起草工作，但是我和代理省长曼雷萨先生，还有劳工代表伊波拉先生一起在政府里研究和决定过了。”“我觉得以新员工身份重新入职，也不会损失什么。”“是省政府建议我至少解雇十到十五人的。”

（两个月后，在我们的代表和临时省长曼雷萨之间进行的一次对话中，证实了12月12日的处理方案确实是在政府里制定的。）

不用多说，卡尔巴乔、洛佩斯·马图拉纳、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乌鲁蒂亚和龚德拉等人的话让我们越来越冒火。他们的谎言和污蔑彻底激怒了班达斯的工人。

八点休庭了，到下周一再开庭。此时仍有上千名工人聚集在法院门前。我方律师刚走出法院，工人立即向他们热烈欢呼，直到他们从工人的视线中消失。

但是这一切还没有结束。过了一会儿，龚德拉和他那帮人也走下了台阶。“暗线”们为了保护主子，全都靠了过去。他们一个接一个走下台阶。就算装出平静和傲慢，也掩饰不住紧张。他们从我们中间穿过，上了豪车。恐怕没什么能比这件事，更能表现出他们的装腔作势了。有几个人发出嘘声，很快大家都开始发出嘘声，这声音比最响亮的哨声还要有力。不难看出这些人有钱有势，但不用解释也明白，他们是敌人。

在充满欢乐和希望的那一天里，人们逐渐聚集在了一起，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大，不仅是我们街道上的人，整个毕尔巴鄂周边的工人都加入了我们。这里再一次，理性的力量战胜了力量的理性。

在同一天里，学生们趁着阿隆索·加西亚在场的机会，尝试在德乌斯托大学组织一场以“集体冲突问题”为题的讲座。但是他们没能办成。它被校长何塞·玛利亚·迪亚兹·阿塞维多以“这样一

来大学就成了支持工人的了”为由拒绝了。这时候他们要来装中立了。然而，大学为这个政权提供了合作，在压制大学生和教授们的要求时（工会自由、更大程度参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等等），或者在它培养“高新技术”专业人才——这个过程是和老板们（还有为他们效劳的金融寡头政府）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的同时，培育资本主义——它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资助和掌控了“久负盛名的”德乌斯托大学的发展——需要的政治和社会意识时，情况就不同了。

“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在1月16日，也就是最后一次的开庭时，我方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向龚德拉提出了新的问题，而龚德拉——资产阶级权贵最坏的代表——的回答，更是凸显了他那麻木不仁的态度：“不，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公司代表团的会议。”“由于我的职务，我和工人没有任何交集。”“我只负责做出决定。”

这些话给与会者产生了相当糟糕的印象，甚至鲁伊斯·希梅内斯回到马德里后，给学生上第二学期的课程时都说：“在毕尔巴鄂的经历之后，应当承认，我被迫重新思考自己关于所有权的许多看法了。”（龚德拉的这些话“我只负责做出决定”完全反映了公司的实情。巴斯科尼亚董事会的其他成员——他们都靠费尔南多·龚德拉的“高效管理”发了财——以书面形式告知我方代表团，龚德拉（不管是在罢工中，还是在别的时候）始终代表着董事会全体。而股东们——资产阶级通过股份公司建立的“社会民主”的代表——只管收取丰厚的股息，别的全不在意。1967年6月——罢工结束的那个月——在股东大会上宣读的公司年报中，一个字也没提到我们的冲

突，谁也没要求对此事进行说明。然而在上一个财务年度（1966年）的报告中，每一段都提到：“我们特别向公司的全体员工致以应有的赞许，并再次对他们提供的服务表示感谢……”）



等待宣判

约有一千五百名工人参加了我们在1月17日的集会，它仍然充满着审判期间的激情。当天的传单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感受：

“这些日子是多么重大啊。所有人都意识到，这场审判不仅对于我们，而且对于所有的劳动者来说，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如果大家继续团结下去，无论怎样的协议我们都能争取到。就像现在我们做的那样。在这几个月里，没有什么能比我们所有人的团结更伟大。这是工人最伟大的胜利，它使一切都成为可能。”

“昨天我们的律师不能来开会。但是他们马上就会赶

来的。他们说，只要有需要就给他们打电话。难以想象他们为我们感到多么自豪。对于他们来说，这场审判同样也成为了历史。”

“我们要再次感谢其他工厂的兄弟在整个罢工期间做的一切。如此众多的工人以无数方式予以的帮助，使胜利成为了可能。”

“我们可以告诉我们的妻子，我们已经为家庭的未来做了一件伟大的事情，而她们也在这一切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满怀信心地等待审判的结果。这也是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判决。”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都在等待。说实话，没什么人觉得判决会对我们有利。1月18日的传单这样提醒我们：

“不管结果是什么，都不值得奇怪。如果判决是不利的，没有人会沮丧。它将证明，我们在法律面前仍然是无能为力的。但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将保持坚定。必须再坚持数月，直到最高法院审理此案为止。来自各地的成千上万同志，他们准备为了我们的事而抗议。在我们把道理明确摆出来之后，没有人再能愚弄我们了。”

“但我们拥有整个工人阶级的意志，所以无论何时都不缺少任何东西。”

同一场集会上，我们决定在第二天举行一次无记名投票，对判决结果做好提前准备。我们的领导者试着让每个人都尽可能按自己的想法作出决定。在1月19日的传单里就能看出这一点：

“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我们必须为以后做好准备。无论结果如何，我们今天的投票将代表我们的决定。”

“第一点。输掉审判并不意味着罢工失败。它也可能是这种情况：——我们得到了工作，得到了援助，得到了工会。”

“为了以后没有谁说自己当时没想到，现在我们应当预见更坏的局面，比如罢工还会持续、我们会沮丧等等。

考虑所有情况后，请决定：

“输掉审判后，我想：
与被解雇的同事一起以新员工身份复工，
或是抗争下去直到事情公正解决。”

每人都得到了一张票，在要选的答案上打了叉。其他工厂的几位同志把票收集起来，然后计票。投票的结果非常惊人：360名在场的罢工者，全票决定抗争下去。

十天后才宣布了判决。1月30日，双方得到了结果。众所周知，法官是在和马德里各方打过招呼之后，才下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

宣判

当地报纸以特别的方式报道了判决的内容。据说毕尔巴鄂市长和有名的资本家，《西班牙邮报》和《巴斯克人民报》的经理哈维尔·伊瓦拉掌控了关于这件案子的所有新闻。我们必须利用罢工得到法律判决的机会来影响公众舆论，因为这能够鼓舞工人们的士气。

法律当然是不讲感情的。但它也只不过是资产者维护自身利益

的东西。

审判的结果占据了报纸的头条，由特鲁埃瓦法官宣布的判决被通篇引用，占了好几个版面，因为它肯定要比另一个法官希伯特宣布的判决对我们更不利。后者至少确认了公司以前的情况，并且说明这场冲突应当：

“将其定义为纯粹的劳工冲突，并归因于在公司与生产者之间持续数月的敌对气氛。”

另一方面，特鲁埃瓦的声明如下：

“……主席（公司代表团主席阿方索·卡尔巴乔）声明罢工工人阻止了货车的正常装卸，根据他的印象，运面包的货车遭到袭击，加上工人不肯离开工厂，公司有理由认为工人影响了公共秩序，因此公司告知了省长先生，让政府派出部队强制人员离开上述区域。”

公司提出的毫无证据的指控（他们怎么可能拿得出证据！），再一次被法官写进了判决事实里。

更过分的是，特鲁埃瓦还引用了 1962 年 9 月 20 日法令（有关集体冲突标准）的废话，将其作为判决的依据——这项法律旨在界定罢工的合法性——说明“工人的声援活动”和劳工冲突之间具有微妙的差别：

“（劳工冲突）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情况下，直接由工人的劳动条件引起的结果（这里是特鲁埃瓦自己强调的），否则将被视为非法行为（这里是我们强调的）……”

如果对工人声援活动的这种判决还不够，特鲁埃瓦在同一份判决中，还声明未受到车间奖金制度问题影响的罢工者：

“如果他们的出发点正确，与同事保持一致的精神是值得赞许的，而他们未对情况进行检验与评估就加入了罢工，这一态度势必造成严重的后果。”

他这种无耻的说法——称赞工人保持一致的同时，又否认了这样做的所有可能性——无法掩盖自己的明确意图，那就是：让罢工的任何尝试都不可能。

宣布判决之前，法官还做了一系列完美的考虑：

“……负责劳工纠纷的司法机关的任务，正是有效规范与判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此类事件对公司和工人自身，亦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损害，阻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有证据表明，某些方面的生活水平正在逐步倒退，而工人的行为就是不断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我国多年以来还没有发生过如此胆大妄为的行为。为了避免它再次发生，必须予以最严厉的制裁。”

正如特鲁埃瓦坦白的那样，西班牙司法的使命无非是“最严厉”地压制一切反对弗朗哥西班牙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活动。司法界一直标榜自己独立于政治权力，可是它无比鲜明地站在了支持政权、颂扬半岛“经济繁荣”的一边，这与司法界的说辞完全矛盾。

按照自己的那套逻辑，法官最后宣判：

“根据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工人无权要求赔偿。”

重申决心

如果我们当时没有对不利的结果做好准备，判决肯定会造成更糟糕的影响。大家的想法凝聚成了一句口号：“上诉失败不是罢工失败”。

虽然整个气氛都鼓舞我们继续前进，但领导者还是希望尊重全体罢工者的意愿，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让大家做出选择。

这样一来，也能驳倒公司和当局一直以来的诽谤：“工人是被一小部分人操纵了”、“有境外势力在背后指挥”，还有其它老生常谈的借口。

宣判的那一天，大家得到通知，第二天尽可能来参加新的投票。

1月31日，560名罢工者中有500人到场。会场入口处分发了当天的传单：

“我们为工人阶级的自由已经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今天，是时候做出决定了，这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决定。因此，我们应该好好考虑自己的意见。”

“所有人都有权利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一来就没有人能说，决定不是由我们自己做出的。我们始终要对自己的决定负责，并且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

“当我们做出决定时，应当牢记：所有的工人都在等待我们的回应……”

经过其他工厂的工人委员会计票后，投票结果如下：在500票里，有494票支持继续罢工，2票反对，4票弃权。

唱票后的热烈掌声清楚地表明：把仍然具有力量与可能性的抗争进行到底，对于五百名班达斯的工人和在场的上千名来自其他工

厂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庄严的决定。

罢工还将继续三个半月，这也表明了我们要把抗争坚持到底的决心。

审判后的抵抗

毫无疑问，班达斯的**管理层早就知道，对他们有利的判决改变不了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抗争，还有我们身边的声援活动和支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也就是说，不像我们这样由法西斯军国主义完全统治的国家里——都得按其它做法来办事。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认为班达斯面对工人的压力时，还没有用上多少“统治者的手段”扑灭罢工。

弗朗哥独裁统治下，资本主义已经习惯了享受这种绝对的权力，但这种权力也腐化了它。因此，它完全蔑视工人阶级，在这三十年牢狱般的岁月里，它将我们更多地视为在剥削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某物，而不是值得尊重的一股力量，也不是要用新资本主义的福利来收买的危险敌人。

也许，正是由于腐败和视而不见，龚德拉没能及时意识到，我们的抗争是不会被他的伎俩打败的。于是，每当他看到我们没有中招时，又会把希望放在其它诡计上，绝不会甘心采取迫使我们无条件投降以外的方法。

从二月到五月的斗争中，我们遭受的镇压不断变本加厉，到了最后，他们施展的手段还包括了宣布紧急状态、流放和监禁等等。

收买的企图

宣布判决的前几天，为了破坏工人团结，管理层筹划了新的行动。通过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和其他工程师，公司和一些向来奴颜婢膝、跟工人不团结的车间师傅勾搭上了，答应只要在宣判之后复工，就给他们钱。公司想利用工人输掉审判后的悲观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团结的瓦解会削弱许多人的意志，让他们接连复工，从而打垮抗争。这就是资方想要的结果。

我们的领导者察觉了正在酝酿着的阴谋诡计。他们为了劝阻可能叛变的人，召开了多次会议。

“同志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完全自觉参与斗争的。但是我们听说，管理层想让某几个人打破团结，要他们不顾其他人的未来，先回去工作。如果这里有任何一个抱这种想法的人，请他上来解释这么做的理由。从第一天起，我们就希望所有人自由表达意见，但是如果有人没有在大家面前说出自己的想法，就在集体问题上私自搞鬼，那将是不可饶恕的罪行。

如果真有这种人，我们要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背叛？你们在这几个月里失去了什么吗？如果需要钱，你们和其他人一样，都能找临时工做。

你们不能找借口欺骗任何人。除非你们现在能反驳这一点，否则回去工作就是最卑劣的自私自利，就是想讨好那些剥削我们的人，给自己捞好处。

更糟糕的是，也许你们和我们在一起只是因为害怕，而不是因为了解斗争的全部含义。如果你们现在回去，只会暴露这个悲惨的事实。不要忘记了，你们自己就是被压

迫阶级的一部分，而你们只想着向上爬到压迫者和他们的走狗那帮人里。

好好想想你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你们的名字。最好不要一辈子都背负着背叛者的骂名。”

当听说队伍里可能有叛徒时，大家群情激奋。很多人不愿意相信，我们都要求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但我们的领导者还是给了他们最后一次机会。

事实上，在那些天里，由于担心自己叛卖的后果，没有人敢这么做。

罢工中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二月初，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工会拒绝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新的培训。如上所述，罢工开始时，出于战术原因，我们决定让他们继续担任职务，以免他们被轻易赶走。

但判决结果出来后，管理层想要利用队伍里的叛徒打破团结时，工会拒绝了为代表团和联络员组织新的培训，以此强迫他们复工。

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举行了新的投票，对代表团和联络员的去留进行集体表决。跟平时一样，投票之前，先要听取大家的不同意见。几位以战斗和奉献精神著称的代表团成员和工会联络员，把他们的处境告诉了大家。就和当时我们决定让他们待在岗位上一样，现在我们让他们离开岗位，让他们完全加入到我们的命运中。

事实上，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意见，投票压倒性地支持他们加入到罢工中。除了在卡佩拉斯特吉的诡计下被选进去的几名专家和工程师之外，36名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全都拒绝复工。当天，他们递

交了辞职信，只留下四名代表团成员和代表办公室人员的联络员。

这场投票中，我们还决定，让罢工开始时留下来监视电器和储气等设施的同事离开工厂。管理层对他们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试图让他们相信：他们的处境已经不同了，一旦离开工厂，公司就不让他们再回来。他们大多数人离开了工厂，只有几个师傅中了公司的计谋。

工贼们

在管理层施加的压力和金钱的诱惑下，队伍里出了几个工贼。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向他们保证，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会保护他们，并且从那时起，占领工厂、埃切瓦里与巴萨乌里周围的城镇，以及奥查考加的街区。

为了钱出卖我们的叛徒有四个：车间师傅劳尔·戈梅斯、胡里安·安杜拉加、坎迪多·萨拉查，以及文员弗朗西斯科·阿梅兹。

公司打算解雇的那些除外，其他的师傅都收到了一封写着奉承话的信：里面说他们能以“同样的待遇”回到他们“管理”的岗位上……同时威胁说，最后通牒就在2月13日。

要么因为我们中间出现了叛徒——在工厂里干活的师傅增加到了9名——所造成的士气低落，要么因为师傅是我们当中最没有觉悟的，接下来的几天里，他们三两成群地回到了工厂。只有四个人始终和我们站在一起。

到了2月12日，在车间师傅和文员中，走出了六百名罢工者中的二十名工贼。

那几天的传单上，控诉了这些人反对工人团结的罪行：

“罢工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队伍里就出了两个叛徒：格雷戈里奥·佩雷斯和伊图尔韦。现在，又多了好几个卑劣无耻的家伙。”

“从没有过如此的背叛。他们只配得到唾弃。所有的工人都不会站在他们这一边，他们就是害群之马。”

“我们不会容忍叛徒。如果在我们中间还有这样的人，滚吧！整个工人阶级都鄙视他们，这些叛徒只配给资本当奴才。”

“它攸关所有人的利益，所有人的面包，所有人孩子的未来，而这些卑鄙无耻的家伙就只盯着自己自私和懦夫般的利益。他们只能得到羞耻和愤怒。他们也只能在羞耻下离开。”

“我们必须向龚德拉证明，他的臭钱对我们一文不值。他没法收买我们。”

显然，这在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中间也造成了极大不安，因为这同样也是他们的罢工。

但车间和办公室员工的紧密团结让我们克服了愤怒和痛苦，因为逃兵基本上都是师傅。

当然，这些人不希望看到的反应也发生了。工贼们在街区里住不下去了。在各个地方，在酒吧、商店和大街上，人们都在斥责他们的行为。当时群情激奋，暴力事件也不断发生。他们中有许多人心怀恐惧和愧疚，暂时搬到亲戚家去住了。

然而，最有力和戏剧性的场面，就发生在工厂的大门口。我们的妻子，她们一大群人怀里抱着小孩，大声地斥责那些懦夫：他们背叛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斗争。和她们站在一起的，还有一大群来自附近工厂的勇敢女工，她们的支持和帮助也

始终激励着我们。“工贼！”“不知羞耻！”“我们的孩子会知道你们的名字，还有你们的背叛！”“你们背叛同志拿了多少钱？”等等。埃切瓦里的“新员工”，就这样从两列女人的队伍中间低着头，羞愧地走了进厂。

国民警卫队的镇压越来越强硬，只有我们的孩子在场时，他们才会稍微克制一些。他们在街区里没收了斥责工贼行为的所有居民的身份证，还对这些男女老少罚以巨款——从五百到一万比塞塔不等。



公司前的路

公司的来信与我们的回信

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收到了公司的来信，他们重复了与师傅们收到的信里一样的把戏。信中提到“法官和劳工代表认为你们的诉求合理”、“只要回来上工”、“我们将亲自登门请您回到工厂，并保证与以前同样的待遇”……同时要求在2月21日之前回复。

信里的最后一句话，表明了他们想分裂我们的意图：“最后，我们希望强调一点，您应当下定决心离开情绪化的环境。”

在这封信里，每一行字的背后都是说不完的无耻。或许，只有这些年里饱受压迫的收信人自己，才能理解它的真正含义。这不是别的，只是对付工人阶级的新办法罢了，这种办法就是言行不一：先说几句漂亮话，做一些慷慨的承诺，以此掩盖自己的野心。他们唯一的实话就是要剥削我们。

前两次的诡计失败后，在工会的协助下，管理层给我们寄了一封署名“几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的信。这封信和后来的两封信一样，里面都有几个“不认识的同事”抱怨说，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不该再多做什么等等。

我们都知道这些信是在公司的办公室里写出来的。那天的传单评论说：

“公司再怎么给我们寄信，也分裂不了我们。信的后面署名‘几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我们很想知道，这里说的是公司新来的员工，还是最近‘顶班’的起重机和吊机的操作工们（工程师和专家们）。看看他们，连线圈都搞不定。”

“在给你们的回信中，我们会署名‘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因为我们前面讲过，我们的团结是牢不可破的，正是这些天的斗争，最终让我们团结如一人。”

“因此，我们要提醒公司，不要忘了我们每个人的身边还有自己的同志。”

不管是对这封匿名信，还是不久后我们每个人还会收到的信，我们的答复就好像是从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而答复也确实是集体做出的。我们的回信如下：

“致班达斯轧制公司管理层

我们今天已收到你们的来信，不想让你们久等。这一答复是集体作出的，因为——尽管你们并不理解——并不是这个或那个人，而是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着现在的局面。在这里，给你们写回信的，是我们全体被解雇的工人。

我们知道，你们花了多少努力和心血来分裂我们，按照你们的希望让我们复工，也就是说，复工的时候，把我们中的一部分人留在大街上。请你们这一次永远地认识到我们之间的分歧。我们现在正不慌不忙地干着各种活，毕尔巴鄂银行的计谋也没能得逞。目前，我们的律师鲁伊斯·希梅内斯、阿隆索·加西亚、阿兰东多、卡瓦耶罗和希梅内斯·德·帕尔加先生，正在起草我们对比斯开劳工法院判决的上诉。

虽然在宣判的时候，你们一度打破了我们之间团结的纽带，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想回去。此刻，作为具有技术知识的工人，我们同意与班达斯轧制公司对话，只要你们接受我方的条件。

我们的家人现在也不担心。我们所做的一切决定都告知了我们的妻子。她们知道我们曾保证过要把住的房子保住。我们正在履行诺言，而且会无限期履行下去。

前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工作条件极为恶劣，收入也少了很多，我们并不是不急着回去，但是你们也知道我们的要求。

最好让人事主管好好想想手下的管理人员和自己的所作所为，停止对我们的粗暴和不公正的对待。

如果想要袭击我们的队伍，或是找出带头的工人，你们将会一无所获。就像你们在比斯开找不到任何一个工人

给这家公司工作一样。

每过去一天，你们每施压一次，都会使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困难。只有我们都回到工作岗位上，问题才能解决。所有让情况复杂和恶化的行为，不会对事情的解决有利。

没有别的话要说了。班达斯轧制工人

埃切瓦里——1967年2月

他们把曾在师傅当中施展的诡计又用到了这里，但得到的结果是：收信的工人中，没有一个改变心意，他们表达了与集体一致的态度。

重建团结

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事情，它将结束我们规模不大，但却令人痛心的分裂。

由于他们扮演的角色那样令人不齿，我们的妻子在厂门口的责骂是那样情绪激动，又令他们痛苦，而他们犯下的背叛行为又是那样露骨，师傅们承受不住良心的重担，于是决定再度离开工厂。让他们大多数人回来的，比起自己被坐实和资本家勾结在一起，更多的是出于害怕，他们中有几个人肯定还会再一次背叛我们。

当时他们达成了一致，告诉管理层自己拒绝继续上班。龚德拉下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不让他们离厂，甚至还请被解雇的师傅们回来。不管是讨好、承诺还是新的威胁都不顶用。他们的态度十分坚决，甚至还让办公室的代表团成员和联络员，以及最开始的叛徒佩雷斯和伊图尔韦都跟着他们一起走了。

2月18日那一天成为了工人们的节日。我们的传单这么写道：

“我们的团结又取得了新的胜利。今天是值得高兴的日子。我们要告诉班达斯的工人和整个工人阶级一个重大的消息。那些曾经被公司用欺骗的手段收买的工人、师傅和职员，在几天的短暂分离之后，决定再次和他们的工人兄弟站在一起。”

“让我们以他们应得的尊重接受他们，欢迎他们站回我们这一边，因为我们必须一起坚持到最终的胜利。”

“师傅们做的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从公司离开，而是当公司承诺安排他们这个级别的员工时，他们回答说，这不是级别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就是所有人的立场：要么全都留下来，要么全都走。这是我们团结的胜利。”

“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把戏落空了。现在留给专家和工程师的，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牵着主人的狗出门散步，要么走出去和工人一起跟资本主义斗争。在这个资本主义里，他们只能变得更为低贱，直到毫无地位可言。”

“学着今天走上街头的师傅和职员的榜样吧，他们向工人证明了自己的尊严，加入到了斗争之中。”

“众所周知，在我们的口号里没有划分等级，只有‘所有人’，因此，我们要提醒工程师和专家，他们也是拿工资的，他们也同样受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我们没有对此抱有太多幻想，他们已经烂到根了。他们的背叛是老早之前的事，只有正直的人——他们将自己的生活扎根在人民中间——才能够挣破锁住专业人士的金链。对于班达斯以及许多地方的专家和工程师而言，或许已经太晚了。

管理层被我们的新胜利给激怒了，在龚德拉的周旋下，那几天政府部门终于下令，动用大量的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阻止我们在巴萨乌里开会。

但是，师傅们的离开，以及我们抵抗意志的随之增强，让顽固的龚德拉也开始动摇了，他再次失去了信心，不相信罢工会轻易瓦解了。手握大权的那么多年以来，他头一次产生了这种悲观的看法。

不可能的谈判

龚德拉通过中间人要求与我们的代表会谈。他从没想过跟工人扯上关系，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根本没考虑过和解，如今却“屈尊”要求谈判。

2月25日，我们的六位代表与这位巴斯科尼亚总经理进行了首次谈话。这场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尽管龚德拉的处境很糟，他还是和以前一样傲慢，就好像他无法克服不得和工人直接对话的耻辱：——“我已经得到了省政府的支持。”“我知道这场罢工是政治性的，也希望很快能证明这一点。”“你们只不过给某些人利用了。”“就算这样，我还是准备重新考虑解雇的人数，甚至会给予补偿，但这之前我要询问劳工法院。”

我们的代表没有浪费时间跟他胡扯，直截了当告诉他：——“工人都是公开发表意见的，所以你的话没有任何依据。这都是老掉牙的说法。”“没有经过我们的同事，我们是不会允许解雇的。”“既然你有这么多办法刁难我们，如果你真的想和我们达成协议，我们希望你现在也能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弥补对我们造成的损害。”

尽管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我们的代表还是同意参加第二次会议，龚德拉答应在那次会议上，就解雇等问题给出最后的答复。这

场会议延期了几天才召开。我们的代表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参加会议的，也就是：绝不允许他像上次那样对待我们。但是龚德拉还是老样子，甚至倒打一耙：“我已经告诉过你们，这场冲突是由一小部分人指使的。”“这场罢工是没有正当理由的。”“我一直都在按上面的指示办事。”“被解雇的人不会超过员工人数的 5%。”我们的回答很简单。“唯一有错的是你和你代表的制度。”“要说解雇，也该解雇你这样不像话的管理。”“你应该知道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就这样，我们结束了和这个人的苦涩对话。虽然他必须结束这场冲突，但他连表现得稍微聪明一点，或者写两封“和解书”都做不到。

虽然龚德拉多次告诉董事会，罢工马上就要结束了，但是工厂仍然没有开工。

他在这次尝试失败后，还想证明工厂已经开始运作，但他至少需要一些人去开机器，给人工厂一切如常的印象。

在一月和二月里，他在比斯开招工的尝试失败了。而卡佩拉斯特吉通过其它工会的一名律师在杜兰戈（Durango）弄来的一点人，他们在了解实情后就离开了公司。

毫无疑问，接下来他们采取的最为卑劣的行径，不过是班达斯管理层的腐败、残暴和完全无视人的尊严的真实写照。

穷人的市场

正如本章开头所述，傲慢与权力让他们无法向任何人或事物低头。他们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了底线，也没有了任何道德准则。以下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龚德拉的几个走狗悄悄离开了比斯开，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去向——这是几个人之间的秘密。他们的任务就是：把人带回来。不管带谁回来都行。不管多大岁数，也不管身体和家庭情况怎么样，什么人都行。必须把人塞满公交车，再拉回毕尔巴鄂。越快越好！

他们招人的方式就是：哄骗、答应给钱等等。

招来的人都是最穷苦的人，他们来自加利西亚、莱昂……这帮人像猛兽追赶猎物一样，到处窥探着人手。

工会在集市上张贴了告示。这张告示就像是钱塔达（Chantada）的加利西亚贵族在讲话：“比斯开的大公司需要工人。优厚的待遇。发布者：地区劳工代表。”

这些告示没有提到别的。除了每个月能拿多少之外，上面只说工人到7月18日还能领到五千比塞塔。关于这场罢工和我们的真实情况，他们一概没提。值得一提的是，巴斯科尼亚的没良心律师伊瓦拉、奴性十足的师傅洛哈斯，还有同为律师的卡尔巴乔的合伙人奥尔蒂斯，为了把人招到班达斯去，他们还在一间台球室里张贴了告示。

最后是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把人给找齐了。我们在3月31日的传单上记录了当时的情况：

“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在哪里？他好几天都没在公司露面。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他的行踪被故意闭口不谈。看起来是管理层给他下了直接命令。马图拉纳可是他们的左膀右臂，而且受着相当的信任。看起来，马图拉纳先生也很想在班达斯的冲突里崭露头角。听那些认识他的人说，他的野心很大：他想飞黄腾达，当上大领导。但想要在管理层面露一手，也不那么容易……”

“班达斯的冲突不仅是一片战场，它还是我们鲜活历

史的课堂。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一天人们会为它著书立作。但我们会把它的两章历史印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其中一章是野心、奴性和狂妄，那些人享有权力，而这些权力是通过把人们踩在脚下得来的。另一章是真诚、正义、尊严和同志情谊，这些人宁愿承受危险、贫困和痛苦，也不愿背叛自己的良心。在这一章的最后，是我们的口号：**要么全走，要么全留。**”

我们在火热的战斗中，写在字里行间的内容几乎成了预言，就在当时，正有更多的被压迫者将受到残酷对待，他们将被逼用自己的劳动损害自己的阶级兄弟。

这些人不断赶来。许多人是怀着希望来的。这些忍饥挨饿、没有工作的人，总是在与他们所深爱的土地分离的痛苦中，怀揣着自己的希望。这就是移民的古老历史。

但事实和他们想的不一样。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真实情况是残酷的一击。工厂还在停工，厂房空了，外面是国民警卫队的团团包围，老板也骗了他们。而让他们最难受的，是当他们见到了我们，见到了我们的妻子，见到了我们的孩子时；“你们别去上工！”“想清楚你们在干什么！”“和我们站在一起吧，你们不是只有自己！”“不要玷污了你们出生的土地！”——我们来自加利西亚的同事对他们的同乡喊道。

埃切瓦里收容所

他们像犯人一样，进出工厂都要由武装警察的吉普车押运。当他们想逃走时，公司就在埃切瓦里当地离工厂很近的地方买下了两

栋公寓，每间房间六个铺位，让新招来的人住进去。他们被禁止上酒吧，以免跟我们接触。就像被关在监狱里一样，他们只能从远处听见我们的声音，通过一排排枪支围成的篱笆看到我们的脸。直到后来，他们才能诉说那段日子里难以忍受的痛苦。

一天晚上，我们的一群妇女前去住满新来的人的那栋楼。她们敲门：——“开门！我们是班达斯的工人，想和你们谈谈！”里面传出了痛苦的声音：“不行啊，我们被关起来了，钥匙在国民警卫队手上！”不用再多说什么了。看到这种悲惨的、让人非常难受的事情时，没有人不会气血上涌，没有人不想跟这个用暴行维护特权的制度作斗争。

这时候也离宣布紧急状态不远了。而宣布紧急状态，就是要隐瞒他们的真正意图——正如我们在其他章节所见——然后制造假象：“近几个月来，不断发生影响工作自由权的非法行为”。当然了，他们指的肯定不是那些因为穷，被迫强制劳动和背叛工人阶级的埃切瓦里的新囚犯。

他们一个接一个逃掉了，在参加我们的集会时都非常激动，也都得到了我们热烈的掌声。下面是来参加集会的人向我们解释他们怎么来到了这里，还有他们的想法。他们在诉苦时由于情绪激动，经常会断断续续，说不出完整的句子。

——“我结婚了，有五个孩子，我住在加利西亚的……那里生活非常艰难，几乎找不到工作，而我们的土地又很少，这样子根本没法活。有一天在集市上，我看到了工会贴的比斯开招工的广告。我回去和老婆谈了谈，然后就决定离开老家。在我找到住的地方后，她就会和孩子们一起过来。”

——“我和工会签了合同才来的。他们掏钱送我们来。”

和我一起来的人，都是因为收到了劳工代表寄的信，让他们来工作。关于你们的情况，他们啥也没说。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糕的一周。我以前都是挺胸做人的，这几天感觉自己就像是犯了罪。不管怎么说，现在我已经在了你们中间了。”

——“我15岁，来自蓬费拉达（Ponferrada）。我以前给车间当帮手，听到能来比斯开的时候我就来了。他们先是给我们培训了15天，因为我们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农民，大家连扳手都不知道是啥。要是我爸知道我在班达斯，他肯定要宰了我。”

——“我有二级硅肺。我把这个告诉了工会，但从毕尔巴鄂来的先生说无所谓。当时我非常高兴，因为我家的经济情况很困难。现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们到了略迪奥（Llodio）之后，就从乘公交变成搭出租。当时我们就觉得不对劲。后来我们意识到，这是想隐瞒我们来到埃切瓦里的事实。在被你们的老婆围住，听到她们的喊叫之后，我们才知道发生了什么。起初我们想走，但警察逼我们进厂。在工厂里，他们说你们所有人都在搞政治。”

——“因为没有钱，我只好找这份工作。这是我这辈子最糟的日子。”

无需解释，这些话在我们中间激起了什么样的感受。要认识我们敌人的真面目，这些例子就绰绰有余了。

另一方面，这件事还给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严重的问题。

在这段悲惨遭遇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只想回家，回到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给他们大部分人垫付了回家的路费，还给了他们一些钱，

让他们能开始新的生活。

我们帮那些希望留下来的人找了工作。在决定他们要住在谁家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吵。我们都想把他们带回自己家。我们与那些受到了残酷的欺骗、经历了一生中最痛苦经历的人们团结在了一起。他们中间还有几个人，因为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开机器，出事故受了伤，还失去了几根手指。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做了。还有一群人接着给公司干活。里面有一些人属于“弗朗哥卫队”¹⁶或者是混入其中的警察，他们试图打探消息、瓦解我们的抵抗。除此之外的其他人都是出于自私的想法，丝毫不关心我们的处境，只管自己能找到活干。

直到罢工结束，甚至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一直在搞这种“人才引进”的把戏，但是从岗位上逃离的人很多，他们还是没能实现瓦解工人团结的目的。

直到罢工结束，罢工者中的叛徒人数始终没变。这十三个人的名字，这些把阶级兄弟出卖给剥削者的人的名单，将会永远被班达斯和工人运动的历史铭记：艾米利奥·蒙赫、劳尔·戈梅斯、费里西安诺·贝斯、塞昆迪诺·弗朗西斯科、佩德罗·安杜拉加、胡里安·安杜拉加、阿尔贝托·洛哈斯、毕尔巴鄂、佩德罗·伊图尔韦、格雷高里奥·佩雷斯、塞维里诺·伊斯基尔多、伊格纳西奥·纳瓦斯凯斯和坎迪多·萨拉查。

局势升温

¹⁶ “弗朗哥卫队”（Guardia de Franco）是1944年至1977年弗朗哥独裁统治期间，西班牙的一个极右翼准军事组织。该组织主要由长枪党的“老近卫军”组成，对政权内部的变化采取了不定的立场。弗朗哥死后解散。——中译者注

用上了所有手段后，他们还看不到我们的抵抗何时结束，于是又用了其他方式来威胁。

自三月中旬以来，他们就拒绝为我们提供医疗服务。我们的妻子和孩子也不能在门诊看病。3月15日的传单对这种难以置信的不公正写道：

“昨天，我们呼吁全比斯开的工人阶级团结起来。今天，我们更要重复这句话。”

“大家看到，龚德拉和卡尔巴乔他们那伙人对我们用尽了凶残的手段。但这一次，他们已经没有底线了。谁也想不到，他们居然想用疾病来打倒我们，工会也在后面帮他们。昨天，我们的代表告诉我们，当没工作的人拿着失业卡去领医疗保险时，他们就对这些人说：‘去班达斯，那里有活干。’”

“你们就是这样理解工人的尊严的。难道能够容忍这样的暴行吗？你们对我们的妻子和孩子的痛苦就没有丝毫尊重吗？”

“龚德拉，只有你要为此负责，如果发生了什么，我们会来找你算账的。”

“我们向比斯开的全体医生呼吁，请你们不要听从龚德拉的指示，因为我们可以肯定，你们不想在自己的良心上留下这么大的污点。”

“同志们：如果他们以为使出这样的招数就能打破我们的团结，他们就错了。不管有没有（生活）保障，我们都将继续前进，直至得到公正的对待。就像我们现在吃饭不靠龚德拉一样，就算他现在不让我们看病，我们也会想到办法的。”

事实确实如此，因为比斯开并不缺有良知的医生。在很短的时间内，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小型的医疗救助组织。

后来，警察那边也发起了新的攻势。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路易斯·莫亚在登记住处时，因为和奥萨巴住在一起，就遭到了逮捕。从四月开始，他们就频繁召集代表团和联络员来作证，让他们对罢工的延续负责，并以此威胁他们。

4月4日，为了声援我们的斗争，无数家公司都停工了一个小时。当天下午，还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声援游行，大约有一万名工人和几百名学生参加。

镇压是残酷的。头戴钢盔的武装警察向示威者施暴，甚至对妇女也毫不留情，造成很多人受伤。这三个小时里，市中心的多个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在阿雷纳尔（Arenal）、格兰维亚（Gran Vía）和萨瓦尔夫鲁（Zabálburu）这些地方，都能听见人们喊道：埃切瓦里！班达斯万岁！自由！

在整个四月里，为了我们遭受的一切不公，为了反对工会的不作为，也为了声援我们的罢工，大家各自举行了罢工来抗议，参加这些罢工的人数一度超过四万人。



神父的抗议

4月12日星期三晚上八点，为了抗议这几个月来我们的遭遇，八十位神父上街游行。他们的队伍从教堂出发，缓慢地走过格兰维亚，一直到莫尤阿（Moyúa）广场。他们在政府大楼前待了二十分钟之后——省长拒绝接受他们的签名文件——就往主教府方向走，递交了如下声明：

“近来，当局对我们人民的压迫日益加剧。警察对和平游行的群众暴力镇压、随意拘捕、审讯、殴打并虐待被捕者，为了拿到证词，还用这些手段威胁他们。”

“受到此类非人待遇的很多人，他们只是认识到自己的公民责任，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或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或是作为被公共权力定义为‘地下’和‘非法’组织里的积极分子，他们只是以自己的天赋权利在勇敢地表达，每个人都必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己，自由地与他人交往。”

“在工人的问题上，我们谴责1月27日对工人游行的暴力镇压、3月12日对‘德国矿厂’的一百四十名工人的随意拘捕、4月4日对为声援班达斯轧制工人进行的游行的暴力镇压、系统性的迫害、逮捕、审讯和对工人领导者的无理罚款，最后，我们也谴责将他们其中一人不公平地流放国外的做法。”

“在政治的问题上，我们谴责对巴斯克国庆日（Aberri Eguna）进行的暴力镇压、逮捕、随意罚款、审讯、流放，以及系统性地迫害各个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的做法。”

“作为教会的神父，我们有义务维护所有人的神圣尊

严，我们以和平的方式，表明我们对警察以及当局的镇压行动的公开谴责。”

“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我们作为人和作为神职人员的良心，这一良心使我们不得不为我们人民所受的不公正对待而感到有罪。1967年4月12日于毕尔巴鄂”

罢工的几个月里，所有人都开始觉醒了。在资本主义和它的统治工具对我们的加剧压迫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团体也以自己的力量作出了回应。

整个半岛的工人都做出了回应，但毫无疑问，是比斯开的工人在最坚定地捍卫我们。

为了班达斯工人的事业——可惜的是，以前没有发生过这种事，也许发生过，但没有一直团结到底——还发生了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所有的地下组织决定统一行动，发动积极分子和整个工人阶级，采取反抗资本主义的具体行动。（但毫无疑问——这也是我们最终失败的部分原因——有一些组织不幸没能理解，在政府把罢工镇压下去之前，我们还有机会把罢工扩展开来。因此，这些组织进行的声援行动，始终没能超出象征性的作用。不过有些组织确实尝试过将斗争推动到当时情况允许的最高水平。）

宣布紧急状态

面对我们团结起来的危险，当局再次脱掉了欺骗和自由化的面具，在金融和工业寡头的压力下，比斯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那一天是1967年4月22日星期六。政府机关“字母”（Cifra）通告了紧急状态，其内容如下：

“在最高贵的国家元首阁下的主持下，埃尔帕多宫召开部长会议。

根据内政部长的建议，本法令获得批准：终止《西班牙宪章》的第 14、15 和 18 条，在三个月内宣布比斯开省进入紧急状态。

援引该法令的理由是，近几个月来该省屡屡发生非法行为，影响了国民经济、劳动纪律与工作自由权，违反了法律规定与相关法院判决。其行为扰乱公共秩序，且地下组织在境外支持下异常活跃。

为维护国民利益，内政部根据现行法律采取必要措施。

停止生效的法律条款

《西班牙宪章》中停止生效的条款如下：

第 14 条——任何西班牙公民有权在本国领土内自由定居。

第 15 条——在未经当局授权、未经法律允许的情况下，不得进入西班牙公民的住所，或是对住所进行登记。

第 18 条——未经法律批准，不得随意拘留西班牙公民。

在 72 小时内，所有被拘留者应将被释放或移交司法当局。”

不用说，新的局面受到了所有当地媒体的热烈拥护。

在《西班牙邮报》发表的一篇“编辑说明”中，他们企图掩饰这些措施的影响范围：

“我们可以说，政府宣布最低限度的紧急状态是为了暂时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确保公共秩序不再受到那些一再试图扰乱和平的人影响。”

同样是在这些日子里，他们还谴责所有为支持我们的事业而进行的游行和罢工，将它们称为“街头暴乱”。电视台和报纸还大力报道一件关于西班牙水手的事件：在意大利的锡拉库扎（Siracusa）港口，在一艘挂利比亚旗的船上，一名西班牙官员被德国官员扇了耳光，为了维护这名官员，水手们在4月3日离开了岗位。

几个月前，他们也在关注类似的事件：当时有一些年轻的西班牙女工，因为抱怨得到的食物而被荷兰的一家工厂解雇。西班牙劳工专员为这些女工辩护，并要求涉事公司撤回决定。

当然，这两件事不过是有力地证明了他们的虚伪。他们无非是想保护移民带回西班牙的大量外汇。为此，他们把国外的工人团结与廉价的爱国主义混为一谈，同时又谴责和攻击工人声援我们的活动。

“人头滚滚”

在比斯开的新局面下，首先就是一连串的逮捕和流放。在整夜的搜查后，有150多名工人积极分子被关了起来。

在五一劳动节前几天，这些人里面有15人被流放到了西班牙各地。他们像牲畜一样被塞在卡车上长途奔波，睡觉也只能在监狱里，就这样一个个在偏远的村子里被放下，身边没有留下钱或任何东西。他们基本上都是三个人一块带走的。尽管西班牙农村地区也生活在国民警卫队统治的恐怖中，但在许多时候，他们仍然得到了同处在

弗朗哥国家下的受压迫人民的帮助，这些人也在等待着自己的解放。

在得知他们的下落之前，他们的家人不得不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当他们去监狱送饭的时候，才第一次得知自己的家人被流放的消息。而他们得知的也只是，“他已经不在这里了”。他们去了警察总部打听消息，然后又被赶去省长那里，在几个小时的等待后，一名官员才含糊其辞地回答了他们。

监狱和流放还不能让这些入满足，为了阻止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他们在毕尔巴鄂集结了令人印象深刻的镇压力量。当然，工人阶级在那一天里没有出现在平时游行的地方，他们在等待更有利的时机发起反击。

我们的报纸无耻又腐败，《西班牙邮报》在5月2日关于毕尔巴鄂发表了以下评论：

“5月1日无事发生。大量的毕尔巴鄂人利用周末的假期，在周六离开了镇子前往布尔戈斯、拉里奥哈和避暑的沿海城市。在昨天，尤其是在早晨的好天气下，成千的人来到了晴朗的海滩，多么美好的夏日时光啊。镇子里没什么人，当然，5月1日这一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虽然为了避免发生任何紧急情况，治安部队在各个要地巡逻，但毕尔巴鄂昨天还是度过了一个平常的假期，温度宜人、车辆稀少而且完全平和。”

大量的毕尔巴鄂人“离开了镇子”，因为他们被堵住嘴赶走了。他们在“好天气下”被关进了监狱，无声无息地消失在了阴影中。当它说“这一天什么事情也没发生”的时候，想必是在对我们进行暗示。他们的“当然”是指紧急状态、野蛮的镇压，还有对当地的军事接管等等，都是“理所当然”的。至少他们的逻辑就是这个意

思。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无论这家还是其他任何一家报纸，都不会讲出在这些日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就好像他们不是早就知道一样。

但他们无法掩盖这一劳动者的节日在其他城市中的重要性。比如在塞巴斯蒂安，节日的前几天里，当地分发了大量的传单，呼吁工人进行示威、用行动来声援班达斯工人。工人决心庆祝五一，那也是三十年来最重大的一场游行。半岛各地都在高喊：“班达斯！”和“埃切瓦里！”，它们已经成为了劳动者的口号。

抗争接近尾声

五一节之后，镇压继续压在了我们身上。秘密警察和国民警卫队好几次在奥查考加教堂把我们包围了起来，他们撤销了我们的出入许可，还不准我们举行任何集会，甚至在公共广场上也不行。

即使宣布了紧急状态，我们还是想继续罢工，团结一致抗争下去。

对我们的封锁越来越严密了。即便这样，5月5日的传单仍表现出坚定的战斗意志：

“我们的总经理费尔南多·龚德拉说他在巴黎，看来不是假话。就因为这个，我们的代表团还没从马德里回来。他们在等龚德拉先生回来告知他们由官方工会代表做出的公司给代表团的答复。”

“自然，没有人说的话能比龚德拉先生分量更重了。龚德拉先生就是公司。只有他是董事会的成员。龚德拉先生是大小股东中唯一的一位。这里只有他。只有他的话能

算数。他是比斯开唯一的老板。其他人也都说，做主的是龚德拉先生，他很有头脑。而我们只想说，他就是个混蛋。”

“但他不能让我们回去。就算他们有皇帝发话，或者上帝的指示都不行。‘龚德拉神’施展了所有法力，还是不能解决他的问题，现在他又动了动万能的手指，把整个比斯开都圈进了紧急状态。”

“最近在比斯开发生的所有罢工，都是由老板们所说的很有头脑的龚德拉造成的。”

“15名工人被流放，这也是很有头脑的龚德拉干的。其中一位就是公司代表团成员：我们的同志路易斯·莫亚。”

“龚德拉神将继续下达命令、继续逮捕和流放。我们已经做好了。”

“既然饥饿无法打倒我们，他们还用上了监狱、放逐和绑架。龚德拉这个神，并不是为他人殉道的基督教的神。龚德拉这个神只会为了自己的自负去杀害别人。”

“毕竟，龚德拉先生并不在乎什么流放。他想象的是自己去巴黎、马德里或者瑞士挥霍的场面。坐的是豪华车厢，住的是头等酒店。龚德拉神把自己的女儿安置在豪华套间里，而不在于被流放或被监禁的工人的孩子会怎么样。”

“这就是万能者龚德拉。别的东西他都不在乎。”

“龚德拉先生，你的身上有许多美德。在你的帮助下，我们班达斯的所有工人团结了起来。在你的帮助下，实现了工人阶级三十年来最强大的声援运动。在你的帮助下，你的资本家伙伴们也尝到了罢工的滋味。在你的帮助下，整个比斯开进入了紧急状态。在你的帮助下，已有并且还会有更多人被流放。龚德拉先生你多好啊！我们该怎么报

答你呢？”

“但你的女儿睡得很安详、住的很舒服……如果你继续敲打我们的团结，只会迸出火花，而在你的工厂，也就是在我们的工厂里，机器会继续生锈下去。它们是不会开动的。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也决心为它继续斗争。”

传单里的话成真了。他们又流放了四十多人。同时还发生了新的逮捕、刑讯和威胁。

为了和索利斯¹⁷谈话，我们的代表团在四月的最后几天里去了马德里，他们被故意拖到五月初才得到接见。在他们坐火车返程之前，早就秘密策划好了：他们要在布尔戈斯被逮捕，然后流放。由于收到了我们的消息，他们才在决定性的关头为了我们的罢工赶回毕尔巴鄂。

警方得知他们回来后，就立即把他们传唤到警察总部。在那里，最高警察长官和其他高级官员都在场，安全总局的特派员凶狠地斥责了他们：

——“你们已经不再代表任何人，当然，你们也不能举行任何会议，或者给工人提什么意见。”我们的领导者们回答他——“我们是由自己的同志选出来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受着他们的信任。此外，我们身上还有官方工会的职责，是他们派我们去马德里的。”——“在警察面前，工会什么也不是，我要告诉你们，你们什么也不是，最好注意一点自己在做什么。”

抗争开始变得无望。公司利用我们的处境发布了最后通牒，尤

¹⁷ 何塞·索利斯·鲁伊斯（José Solís Ruiz，1913年9月27日——1990年5月30日），弗朗哥法西斯政权后期重要人物，1951—1969年任民族工团主义中心全国代表，1957—1969年任“国民运动”总书记，1975—1976年任劳动部长。——中译者注

其是威胁要按照劳动合同，把我们中的许多人赶出家门。

由于受到警察的迫害，我们又无法举行集会，再加上被威胁赶出家门，我们向工会提出请求，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来做出我们的集体决定。但是被拒绝了。

代表们以我们的名义发表了复工的声明，虽然他们都非常清楚，我们决不是情愿复工的。

这一刻是残酷的，许多天来我们饱受折磨，报纸却这样宣布我们回去工作的消息，以下是 R·阿西隆在《北方报》（La Gaceta del Norte）上写的话：

“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消息，因为这个对于其他人、对许多家庭和国民经济造成了不愉快影响的问题，已经圆满结束了。人们经历的这场社会噩梦，虽然迟了一点，但还是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对此，我们将交由读者来评判……

罢工结束了 我们的斗争仍在继续

我们有三十二名同事被留在了外面，他们被解雇了。

不难理解，其他回去工作的人在那些日子里都受到了痛苦和愤怒的折磨。

在那里，我们的刽子手变得更加歇斯底里，但他们同样紧张地担心着我们的报复。他们也不可能不紧张。

我们看上去是被打败了，但我们已经赢了。永远是胜利者的他们，却输掉了这场最重要的战役。因为他们深刻了解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没有换来什么，却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结果。

当我们的抗争结束的时候，在管理层发表的最后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工作表现良好”，他们也“知道我们没有积极参与冲突”。这是他们允许我们回去的理由。他们自己都知道这些话是假的，我们就像是一个人一样在战斗。回来之后，等待我们的自然是加倍的暴虐。

那些在罢工中继续工作的无耻东西，他们都爬上了重要的位子，这为的是让我们今后的行动变得更加困难。在每台设备旁，都至少有一个他们的人。不难想象我们接下来是怎样在这些地方进行战斗的。这里的对抗，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都同样激烈。

在调动职位后，卡佩拉斯特吉把他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其他人都在谋划什么，你们也要加入进去。”“无论你们看到或听到什么，都要立即汇报。”

实在是个悲剧，我们的阶级兄弟们——我们的剥削者是相同的——成为了反对自己人的“第五纵队”。但这是不足为奇的。

无论如何，不管发生什么，我们都要继续战斗。

但当务之急是，我们的同事在对付工贼的时候被罚了一笔钱。于是，我们开始为比较窘迫的家庭筹集必要的钱。我们不想动用现有的资金，因为被解雇的同事（还有被捕和被流放的）的处境也很艰难，他们可能长期需要帮助。

在对我们的严密监视，尤其是紧急状态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再一次尝试——作为唯一的办法——合法募集资金。为此，我们几个人向工会提出了我们的问题。工会告诉我们，应当把这件事交给人事主管。第二天我们去找他。卡尔巴乔说他要请示上级，过一天再回复。

他们当晚就给了回复：我们的三位同事后半夜从家里被带走，流放到西班牙的各个角落，一直待到紧急状态结束。

但是，在经历了重重困难、克服了无数恐惧之后，我们最终还

是设法办到了。

这样的情况下，管理层继续进行着恐怖和“歼灭计划”。他们和以前一样处罚我们，奖金也被减少到了 70% 等等。

不用多说，这些情况对生产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新员工的经验不足，还有我们中间一些人的离去，更是雪上加霜。这是资本主义为我们的罢工付出的另一个代价。对其制度的揭露、一部分工人阶级的觉醒，必然增加他们在生产中的损失、客户的流失，以及公司内部不断的抵抗。但是有传言说，龚德拉会夸大班达斯的情况，用来给巴斯科尼亚的危机找借口，把它作为解雇九百名工人的理由。

罢工结束三个月后，我们在九月又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一些人询问工会，什么时候才能选举代表团和联络员，并要求落实罢工前的协议。新任的社会部副书记，狡猾的巴亚斯建议我们给管理层递一份联名信，因为在现有情况下，很难让我们选举代表。

这封信是由所有人一起起草，并在上面签名的。我们的两位同事将它交给了人事主管。

得到的答复也是意料之外的。交信的两个人在几天之内就收到了政府的回信：

“鉴于最高警察当局向省政府提出的申诉；

本月七日，您与另一位同事一起向‘班达斯冷轧’管理层递交了一封由该公司多名生产者署名的文件，其内容如下：

‘以下签名者要求通过由自己任命的委员会与公司管理层进行会谈，讨论公司在 1966 年的集体协议。

1967 年 9 月 7 日于埃切瓦里’

您无视规定，不经工会上交这份文件的行为，表明您同时也是这份文件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这一行为将在工人

中间引起混乱，其有可能导致公司发生新的集体停工事件，从而影响到公共秩序与社会稳定。

鉴于上述事实，您犯有现行 1959 年 7 月 30 日《公共秩序法》第 2 条 C 项、Y 项中的行为，我司依照上述法律第 18 条和第 19 条，对您处以 25000 比塞塔的罚款。”

不难想象，我们以后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斗争。对于我们来说，针对性的迫害仍将继续，但是，由于他们犯的大错，工人的事业已经迈出了巨大的一步。

但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样的。新的工人队伍将走在前面，所有人将团结在一起，实现最终的目标。

在领导者被解雇后，斗争变得更困难了。但在我们中间，更多的人肩起了责任，他们在一线的工作中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公司用解雇来“去掉病枝”，结果恰恰相反。即使他们用武力让班达斯工人去了其他工厂和地方，最重要的东西还是留了下来。他们不是病枝，而是长出的新芽。我们的团结依旧如故，连同离去者托付给我们的勇气与意志。

这些人被开除后，找工作时遇到了重重困难，可他们依旧满怀希望继续斗争，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

我们的处境慢慢恢复了正常。工会曾保证在经济、求职和住房等方面给被解雇的人提供帮助，却迟迟没有兑现。

工人阶级再一次地肩起责任，向那些为了它的事业付出一切的人伸出了援手。这样做不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团结，也是为了看护它所拥有的最大财富：它的领导者。

到这里，我们已经讲述了在整场罢工中发生的故事。接下来的第二部分中，我们来研究那些应当格外重视的方面。

第二部分 一些基本方面

罢工的经济来源：声援运动和工作

对于半岛上的工人阶级来说，经济来源是罢工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我们没有罢工权和真正的阶级工会，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一样，我们也没有工人为罢工建立的基金。强制上缴的官方工会会费（占我们总收入的 2.6%），主要用来供养内战结束以来不断膨胀的弗朗哥官僚机构，或者用在其它隐瞒去向的次要用途上。

正如《国家条例》和《公司内部制度条例》规定的那样，资产阶级法权不仅不满足于剥夺我们的权利，还要在劳动者身上加以重负。

所有这一切的直接和明确的目的，是要扼杀长期罢工的一切企图。如果工人——不顾所有禁令和法律威吓——发起了罢工，他们在几天之内就会遇到经济难题，然后家人就会劝他们回去上工。饥饿永远是让我们低头的好办法。因此，多年以来的所有罢工历时甚短，并且都遭遇了重大的困难。罢工者筹集资金的尝试，一直以来都受到严厉的惩罚和迫害。除了动静大的阿斯图里亚斯、巴斯克等地区的总罢工外，报纸的沉默也加剧了这一情况。整个工人阶级几乎都对这些冲突一无所知。在一家公司里进行的孤立罢工，总是被毫不费力地粉碎，除非它能速战速决。但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家总会用饥饿、工人无法组织、社会政治部（及其审讯）、殴打和逮捕，迫使工人空手而归，不给反抗的机会。我们可以说，三十年来，大大小小的罢工都没能成功过。但它们促进了工人斗争的持续与新领

导者的诞生。同时，它们还时不时地提醒法西斯资本主义，就算后者能无数次打倒人民，资本主义给“顺民”的面包和足球、为“逆贼”准备的监狱，是绝不能战胜人民的。

班达斯公司最后一次发工资是在 12 月 10 日，结算了上个月的工资。正常情况下，我们会在当月 20 日拿到下一笔钱。

虽然大多数的家庭都能撑到那一天，但还要考虑到子女众多，或是有特殊情况的人。

从一开始，所有人都希望尽快搞清楚跟钱有关的事。一般来说，这方面的问题容易吵架，而在当时的紧张气氛下，问题就更棘手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保持着团结和冷静。

我们让最有文化、最慷慨正直的内部人来管钱，由他们来决定应当帮助哪些家庭。

为此，我们打印了一些表格，让每个人写下家庭情况，然后写上自己是否需要帮助。配额大概是每十天 500 到 1000 比塞塔。尽管有重重困难，我们总能按时发放补助。

大家始终认为拿到的钱是神圣的，所以自己也有管理的义务。

我们的工作

12 月 20 日之后，为了让大家手头宽裕一点，免得钱不够花，我们决定尽量打工。就是说，不管多苦多累，每个人必须尽力找活干。一周后，将近四分之三的人至少能补贴家用了。

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去干苦工了，比如露天作业等等……但他们下午来集会，加入大家充满同志情谊和团结的气氛中时，对这些辛苦都是毫无怨言的。

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接下来可能的数月罢工里，不要为

了钱的问题慌起来，同时也是为了维持家庭开支。

做了这个决定后，我们组织了一个委员会负责找工作。这些同志整天都往工地和职业介绍所跑，找了很多（甚至包括许多公司高管），为大家找活干。最后大伙都找到了活，也为其他同事找到了营生。在集会上，我们按照职业宣读了每个人找到的工作：电工、装配工……而我们绝大部分人，包括办公室职员在内，都在各个建筑工地上打短工。

毕尔巴鄂银行的阴谋

毫无疑问，我们解决经济问题的办法引起了管理层的焦虑。在没看到办公室员工回来上班，或者收到请求复职的“求职信”时，资方需要“新的说服方式”。

虽然他们的手段没能奏效，却催生了“资本家的团结”。龚德拉——他在毕尔巴鄂银行也担任董事——想出了一个阴险的计谋来破坏我们的经济状况。众所周知，半岛的大银行直接控制着大多数产业，所有的大小公司基本都受制于它们的贷款。不用多说，它们会借助毕尔巴鄂银行的力量来对付我们。实际上，银行联络了贷过款的所有公司或工厂，通知他们，如有班达斯的罢工者在那儿打工，应立即开除。

显然，银行不会承认自己的所作所为。但事实胜于雄辩。几天后，有些人在集会上发了言：内维翁装配厂开除了我们四十个人！明天阿里戈利亚加（Arrigorriaga）的雷索拉（Rezola）水泥厂就要和我们结账了！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在场的人都怒火满腔。有些同事的话让我们找出了头绪。“——经理通知我们必须离开的时候，很委婉地讲，他这么干是违反自己本心的，这是公司的所有者毕尔

巴鄂银行的命令。”“当时我们在费尔米卡（Formica）上班。下午四点，他们也说自己收到了毕尔巴鄂银行的指示。我们在那里连一天都没干满”……

很明显，把工人赶出内维翁装配厂的就是龚德拉的女婿——也是他最忠顺的手下——吉列尔莫·巴兰迪雅兰（Guillermo Barandiarán）。内维翁装配厂的倒霉蛋只能听上头的话，把我们的同事解雇。

罢工四个月后，政府给宣布紧急状态找的借口是“过去几个月内的非法行为……影响了工作自由权（！）”它指的想必是一些公司在招募新员工时遇到的困难。毕尔巴鄂银行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在四个月前否认了我们的这种权利，这显然违背了《西班牙宪章》，毕竟都是他们说了算。

可他们的打算完全落空了。因为我们大都在小作坊和小工厂里面打工，毕尔巴鄂银行的爪子才不能扼住我们。那些被解雇的人也慢慢找到了新工作。过去几个月里，我们在各方面得到了支持。比方说，从班达斯来的人，求职的时候都会被优先考虑。

声援活动

虽然我们在找活干的时候得到了真诚的帮助，但不难理解，这不足以撑起所有人。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找工作，而大部分人只能打零工。因为什么活都得干，很多时候工资都非常微薄。

因此，比斯开和半岛各地工人的声援起了重大作用。这里还得提一句，我们获得的援助当中，大多数确实来自工人，但其他人也提供了大量帮助。我们将尽量客观地指出哪些人提供了支持。

需要花上几周时间，这场罢工的重要性才能被理解。当我们公开第一份声明，表达坚定立场后，到处都发起了声援活动。

如上所说，我们最后一次领工资是在 12 月 20 日。虽然有些拮据，我们还是凑到了够用的钱。有些工厂的工人把他们的积蓄捐了出来，让自己的代表转交。难能可贵的是，其中有一家厂由于经营不善已经停工数月了。

在开始的那些天里，一些神父和教会人士也帮助了我们。

除此之外，一年前我们就开始每人每周攒下 25 比塞塔，用这样的方式建立起了罢工基金。其中一部分用来支付律师费，以及工人进行厂内组织工作的开销。在罢工初期，这些资金帮了大忙，得以印传单、支付旅费等等。

一开始很少有人要求经济援助，除非有特殊情况：孩子太多、生病等等。既然我们有自己的基金，那么圣诞节的额外开销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了。工人家庭都有了买新鞋子和新衣服的钱，而平时他们是花不起这个钱的。

在一月份里，我们得到了大量援助，这些钱甚至让我们在官方压力下还能坚持一段时间。全部储备金都放在警察管不到的安全地点。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它存在何处。



补助的分配

从一月开始，我们每十天发一次补助。当然，我们不能为了钱闹矛盾。有些人抱怨说，没必要拿钱的人也拿了，还说这些钱没被管好。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在传单上要求大家不管怎样，在钱的问题上都要诚实。让我们引用其中的几段话：

“所有人都必须工作。如果你不找工作，你要补贴就是不公平的！有些人这样做了，这是不对的。现在大多数的人都在打工，虽然他们的活又累又脏。他们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走得更远，为了坚持到底！如果你的家里没什么问题，而你又不想工作的话，那就别要补贴！”

在另一段中说道：

“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全都得到了补贴。我们已经重复了无数次，我们的家庭不会缺少任何需要。因为我们有全体工人的支持——还有什么比它更重要呢。”

很多情况下，我们也会面临临时需要。比方说，有些同事的亲人去世，不得不出趟远门，还有些人得付房租等等……他们得到了我们的充分理解与帮助。管钱的人立场如下：坚持最公正的态度来决定每个家庭是否需要帮助，然后尽可能满足需要。拒绝某人要求之前，会先考虑他是否真需要帮助。绝大多数人全心全意投入斗争中，谁要是在金钱上要小心思，就太荒唐了，我们对每个家庭的决定都予以了最大尊重。不要忽视这件事的意义。它跟许多事一样，都能这样解释：我们富有热情、勇于自我牺牲，面对各种困难时，

有工人的精神支撑着我们，使我们担起责任，绝不辜负良心和整个工人阶级。

其他方面的声援活动

我们敢说，没有一个比斯开的工厂和车间没捐过钱来支持我们。他们通过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通过工厂委员会或者地下工会的积极分子，定下日子把援助交到我们手上。

一大群人声势浩大地来到了巴萨乌里的集会：“我们也是工厂里的……给你们带钱来了。要是你们继续干下去，有什么需要就尽管开口。”“我们学徒工也带了一点钱。”这些 14 到 17 岁的孩子为能参与斗争，流露出了激动。前几天里，他们在集会上非常认真地听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在自己的工厂展开行动向我们请教了一些具体问题。在这一刻的见证下，谁知道他们会不会成为这一代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算是成功了。

比斯开的退休工人也在这段历史上书写了激动人心的一章。从集会召开的那些天起，他们就坐满了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的长凳。他们的目光中，虽然饱含着长年累月的艰苦劳动留下的疲惫，却掩饰不住罢工带来的巨大满足。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在那场本来能给人民带来解放、却最终失败的战争中，曾是工会或政治组织的积极分子。多年来，这些人一直在半岛上从未有过的残酷条件下劳作。不难理解，这场热火朝天的工人斗争，就像是让他们重新回到了斗争岁月中一样。

声援活动这一章里，为什么我们要提到退休工人呢？很简单，他们的经济状况让我们不能收他们的钱，可怎么也说服不了他们。他们被拒绝的时候都非常生气。“——别管我们怎么样，你们必须坚

持下去，无数次的饥饿都没法打倒我们！它也决不能打倒你们！”我们只能哽咽着，在清单上写下：巴萨乌里的退休工人……比塞塔。奥查考加的退休工人……比塞塔，每位退休工人 180 比塞塔。在社会政治部闯入奥萨巴同志家里的那个晚上，他们带走了支援班达斯的几个装满钱的信封。其中一封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迹写着：“卢恰那的退休工人”……

还有一次，我们的几个代表被邀请到了圣马丽娜结核病疗养院。一位教士在那里等着，他说：——“这几天里，我们在疗养院收到了大量的捐款。病友们都很关心你们的罢工，他们决定把钱捐给你们还有你们的家人。大家都很激动，齐心想帮忙。这里是我们要收来的钱。病友们还说，往年的这几天在巴萨乌里募集来的钱，也要交到你们手上。”这些帮助对我们的意义是难以言表的。当罢工结束时，我们所有人都去了那里和他们共度了一个礼拜天。

声援运动在不断蔓延着。省里的许多教区也开展了很多募捐。几个娱乐中心也组织了捐款活动，学生们都积极参与。

随着 1967 年的到来，从马德里、加泰罗尼亚、萨贡托和巴伦西亚等地，陆续发来了支持我们的信件和电报。从一月份开始，半岛各地的许多公司和工人组织都向我们派了工人代表（法国的法国总工会（CGT）和民主劳工联合会（CFDT）代表也多次拜访问过我们）。他们的任务，是把公司里收集的钱，以及声援斗争的信件（有数百工人签名）交到我们手上。我们的同事也都回了信。其中一封信的内容如下：

“同志们：

我们已经进行了五十二天的罢工。我们将继续保持坚定和团结。我们又怎么会不希望所有工人与我们团结在一起呢！大家都意识到，我们的罢工也是整个工人阶级的胜

利，并决定将它继续下去。

你们的工会代表亲自把你们的心意交到我们手上，这是无法估量的帮助，我们永远不会忘。当然，我们不敢保证什么。有太多的事情是我们无法一一回报的，而你们的心意也在其中。

你们的钱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有了它，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用太担忧经济问题了。不要担心，饥饿打不倒我们！你们和其他工人的支持让我们能坚持下去。

我们希望亲口告诉你们，班达斯冷轧的工人有多感谢你们。而我们只能以抗争的胜利当作回报。这场胜利同样属于所有兄弟般支持我们、使我们坚持到最终胜利的工人。

一个亲密的拥抱。

全体班达斯冷轧公司代表团与联络员
1967年1月21日于埃切瓦里”

毫无疑问，他们的到来意义重大，这代表着就算相隔千里，就算沉默和迫害将我们分开，就算在建立联系上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工人们还是向寻求团结前进了一步。更不要说这些来客带来的热情了。他们所有人都来参加我们在巴萨乌里的集会，将它变成了战后以来最重要的、可能也是头一场数月之久的工人演讲会。

这些来访也对他们产生了影响，因为那些密切关注我们罢工的人，他们的组织、他们的团结和他们的意志，都被来访留下的深刻印象所鼓舞，相信战后工人运动的新阶段正在开始。班达斯轧制公司——它已经在比斯开外边，让“埃切瓦里”声名远扬了——它已经和人民的其它光荣斗争一起，成为了反抗资本主义的象征。

我们的大会 传单：工人运动的两所学校

（一）我们的集会

多年以来——和所有反对这一政权的人一样——工人们一直都不能自由集会。街道、广场和郊外是资本主义留给我们的“活动室”，虽然在这些场所，公共权力总是像看管犯人一样盯着我们。很多时候，他们还殴打和监禁我们。

的确，在少数情况下，我们能在教区等场所得到庇护，一些神父认为他们有义务为失去家园的人提供住所，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这也因为神父们自己就享受着特权——比如说他们的教区也是一种特权。

前面的章节里，已经描写过我们的集会。如果要谈我们的罢工，没法不提集会——它们是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当地的教区里举行的——每一天里，它们都是斗争的中心、工人觉悟的精神源泉，大家的声音响彻会场，使之充满团结的气氛。

要描述它们可不容易。为了展示集会的全部意义，或许我们得走进记忆深处。毫无疑问，官方数月以来都在想方设法阻止我们集会。他们威胁主教和神父、派几队“灰头盔”国民警卫队和秘密警察包围工人，他们使尽了浑身解数。如果一种办法不灵，就采取另一种更强硬的手段。

与许多其它罢工一样，我们开始在街上集会。比如离埃切瓦里不远的巴萨乌里广场。12月中旬，我们在奥查考加的教区学校里集会，到了圣诞节前，我们已经能在巴萨乌里圣佩德罗的宏伟教区里举行集会了，我们在那里还抗争了几个月。

然而，政府大搞虚伪的指责：“教堂混进了外人。”“圣洁的所在

不是用来干这个的。”“这些集会没有官方批准。”等等。

在巴斯科尼亚的董事会上——他们不需要警察在场和“官方批准”就能开会——龚德拉汇报说：“主教没有禁止在巴萨里教区举行集会，都怪那个……”“省长坚持要等马德里的指示。”“我要再去见卡米洛·阿隆索·维加，必须让他禁止这些集会。”……

巴萨乌里的会场能允许三百人坐着、约一千人站着开会。在刚开始的几天，那里只有六百名班达斯工人。但很快，每天都有上百名工人从比斯开各地赶来，到了后来，很多人只能等在会场外面。他们把在这里发生的事激动地告诉了同伴，这使得巴萨乌里成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中心和培养积极分子的一所真正的学校。

在工人斗争蓬勃发展的年头里，工人实际上是没法集会的。少数人只能利用自己家、公共场所和酒吧等地维持联系。而最近，在郊外等地举行的集会越来越多了，但这些集会总是孤立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采取最重要的、最有教育意义的行动：成立一个工人的讨论会。在其它时代里，群众的意识，也就是无产者的觉悟，就是通过这些讨论会、协会或者“人民之家”进行伟大觉醒的。这个政权无法容忍它们。

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还是坚持了几个月。日复一日，我们的领导者和许多罢工工人、众多的工人积极分子、学生和知识分子等等，我们以三十年来被禁止的语言发出了强烈的呼喊：这是我们阶级尊严的、反对剥削的斗争语言，也是所有被压迫者团结起来反对压迫的语言……

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已经对工人世界里——这是一所反抗的大学——满怀期待的同志们予以了回应。他们在讨论会上一直对我们说：“坚持下去，你们是所有人的象征。”“将罢工进行到底，你们不会后悔的！”“你们能做到如此团结，不用说，我们要向你们的罢工好好学习。”“你们不光只有自己，你们什么也不缺，但除此之外，

显然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你们的激情、勇气，还有保持团结的能力，以及在疲乏和迫害下坚持斗争的能力。”

许多人说，工人只对足球和斗牛感兴趣，而这也是他们所希望的。是的，这些东西是用来麻痹我们的，为了不让我们参加工会和政治等活动，他们拿体育来填补日常生活中的空白。而在这里清楚地表现出，文娱活动并没能占据我们的生活。多少个日子里，我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倾听着工人们昂扬的话语，它给我们带来了多少激励、又怎样使我们的斗争充满了意义啊！在多少个场合里，我们用无记名投票证明了自己的团结一致啊！不，大多数人决不是被少数人带着走的！这样做顶多可以应付几天，很明白的是，如果绝大多数人不同意继续罢工，一切都是不可能发生的！

管理层对这些心知肚明。这就是为什么在需要征求所有人意见的重要关头，他们都不允许我们表决。

是的，就在太阳底下、就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以及一些警察和叛徒的眼前，我们的罢工每天都在集会。集会上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事，在大家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可以说，每一场集会都是以某些不寻常的事而留在记忆中的。在那些集会上，涌现出了多少工人的领导者、多少朋友啊！

要一一列举它们，一本书是远远不够的。在这里，让我们盘点某些对工人来说意义重大的事件。

班达斯女工的声音

在这里，需要提到我们的妻子，她们不仅对这场罢工，而且对我们的家庭生活，甚至对整个工人运动来说，都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

她们从一开始就加入了我们的斗争，占领了工厂，闯进了巴萨乌里工会会场。即便是许多天之后，局面变得错综复杂，我们得不到外面的消息，不断陷入孤立，但我们觉得还是要让她们参与进来，这与她们切身相关。在一次集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全体认同的问题。我们决定为她们举行一次特别集会。每个人都保证自己的妻子会参加。

12月29日，巴萨乌里似乎出了什么怪事。从下午四点半开始，成群结队的妇女走上了街头。到了大约五点，两百多名妇女已经在会场门口等着了。五点半集会开始的时候，有三百多人到场了。她们坐满了长凳，男人只能站在后面。

她们到场后分发了传单，上面充满了节日的气氛：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今天，班达斯的大家庭都聚在了这里。

为了给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创造更美好的未来，男人们和女人们，我们的工人夫妇应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亲密团结。

如果我们在家里保持和睦，如果大家都经历相同的希望与痛苦，那就没有人能打败我们。想想我们的父母亲跟祖父母，他们曾在更加困难的时期进行了奋勇的斗争，捍卫着资本家一直想要夺回的东西。

我们得到了全体比斯开工人的支持，我们什么也不会缺。

我们将在家庭中相互理解，我们能在家里得到支持、鼓舞和力量！

夫妻两人将共同来讨论问题和家里的需求。为了我们的团结！

全体工人家庭的团结万岁!”

然后，我们的一位同志解释了现在的情况：——我们所有人都在抗争，为的是没有一个家庭流落街头，为的是让复工成为向解放跨出的一步，让它对于剥削者而言，不会是那么轻松的胜利。她们必须理解我们牺牲的意义，并且参与其中，因为我们捍卫的是整个工人阶级的权利，而我们的家庭也在其中。

我们希望她们也完全认识到自己也是班达斯的工人，与我们一样每天忍受着压迫，甚至还有屈辱，因为她们不得不去拒绝给我们和子女足够的面包、文化、自由和责任的那些人家里，去做临时工。除此之外，这也意味着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作为奴隶的妇女，往自己真正解放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步。我们不能接受她们仍然囚禁在家庭之中，无力与我们分担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责任；尽管我们有时还是会这样做，但是，在工作和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她们应当与我们完全平等地分担责任。

“你们为了资产阶级妇女永葆青春，自己却过早地枯萎了。你们擦洗的盘子上，盛放着揉进我们汗水的面包。对于那些享有特权的人来说，我们家庭的情况是很正常、很公平的。是的，你们生来就是为了擦盘子，而我们就是要流汗，就像他们生来是为了享受服务和管人一样。但我们不能这样想，我们应该为了一个没有阶级和特权的新社会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需要的东西才能得到满足，在那里所有人都要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劳动。

从现在开始，从这场罢工开始，我们将并肩战斗。所以，我们希望你们今天到这里来，你们要发言、提出想法、提出批评等等。希望你们讲出来，你们对我们的组织、资

金的分配等等，都是怎么看的……”

然后，一位女工（同时也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和斗争多年的积极分子）也向班达斯的女工们致辞。在她的话里沉淀着丰富的经历，所有人都能完全理解这些简单的话语：

“你们在场的事实，就是这些年工人历史上的创举。我们一直都习惯于被忽视，我们的生活都是由别人来决定的。在家里、街道里、市政府里，到哪儿都是这样。他们说我们唯一的职责就是为了家庭和孩子。而正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家园，我们同样有义务和我们的丈夫站在一起，在这里共同决定切身相关的事情。在上学、物价、工资和住房等问题上，我们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们难道就低人一等吗？我们难道不重要吗？我们不接受资产阶级社会规定我们扮演的角色，许多时候，我们的丈夫和身边的环境也都受到了它的毒害。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更多地参与罢工事务，这为的是让你们自己也参与决定。因此，你们的参与对于实现真正的团结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轮到你们了，不要为了做作的胆怯而不作声。最重要的是真诚，还有尊重他人意见。”

没过多久，妇女们开始讲话。起初她们很羞怯，然后很自然地出现了批评的声音。我们的几位代表回答了她们的问题、建议或指出的不足。经济问题引起了一些小争执，最后都圆满解决了。几位妇女还到讲台上发了言。其中一位以坚定而平静的声音，面对在场的所有人说道：

“我认为我们要做的是克服胆怯，不要再为钱的问题吵来吵去了。你们已经听到情况是怎么样的了，所以我认为，我们不能再抱怨了。重要的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对待我们的丈夫了。”

另一位也补充道：

“现在我们不是为了赚钱，我们是要抗争下去。每个人都有自己家庭的需要，不要再不公正地责怪别人了。刚开始那会儿，说实话，我们确实做得很糟。后来，我的丈夫也找到了临时工的活。我和丈夫一起在管他赚来的钱，还有一些邻居帮我们凑的钱。他在艾德萨干活，那里的人告诉我们：班达斯的事业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下一次我们会来帮助你们。”

像这样，她们在好一段时间里都在发表着自己的意见。毫无疑问，当看到她们也团结起来、听到这些鼓舞人心的话时，所有的疑虑烟消云散，她们中间也产生了觉悟和非凡的热情。

我们学到了多么重要的一课啊！起初，我们还担心集会开不开得起来。我们不知道她们是什么反应，事实上，我们当时不相信她们能这样冷静智慧地表达自己。最后我们充满了自豪，以后我们会看到，这些集会对维持我们家庭的团结和士气起了多大的作用。

这次集会的第二天，我们收到了两名班达斯女工的来信，信中要求我们在集会上朗读。来信原文如下：

“我们要接着团结下去，可别被这种事情动摇：收账的来敲门，然后我们关上门问丈夫，你们不打算上班吗？”

他们回答说：你们自己去做做看吧，看看厂里会怎么对待你们，然后你们也会加入我们了。我们不希望丈夫过了三个月，还要回去被当成新员工，也不想要任何人的丈夫没工作。我们三个月来一直支持他们，和我们的丈夫在一块，我们需要他们，他们也一样需要我们。

我们的丈夫前面还在干活，现在把活都给放下了。我们不是在说，也不是在想，他们不想干活只想休息，我们这些女人不这么想。如果女人把罢工想得很坏，我们的团结就要完蛋。罢工的意思，不是让我们不过日子了，是要给班达斯大家伙争取好处。然后我们还要感谢克莱门特先生，他就要离开我们了，到圣诞节还要请他给班达斯做弥撒，他还说要感化我们，教民们想了想，然后说，哦是的，特别是要感化龚德拉和所有的管理层。

我们要接着站在我们丈夫的这一边，我们的丈夫也不用看我们的臭脸，我们要好好管家，也要把想法跟他们讲，我们还要感谢忙着没停过的代表团和联络员。

我们要感谢办公室的人给的帮助，还有何塞·安东尼奥每天为我们操劳各种事情，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的丈夫。

没有别的话了。一名班达斯女工。”

“班达斯轧制的同志们

在 29 日开的家庭集会上，我想表达自己的真诚意见，昨天我没这么做是因为还没经验，而且要尊重丈夫的意见。

我要感谢所有人，在你们的努力下我们建立了牢固的团结。

我的意见是要抗争到底，直到得到我们的权利。

我们都同意听从你们领导的组织。

所有的男人都在干活，女人也做临时工，所以家里不会缺面包，面包要是不够了，相信他们总有办法的。

就像昨天一位先生说的关于钱的问题，我发自内心为他的话鼓掌。

为了班达斯的需要而从其他公司收集来的钱，也是为了明天的战斗，这样一来，如果别的工厂罢工的话，我们也能去帮他们。

现在我们要咬紧牙关，再次勒紧腰带，给所有人作出样子看看。”

这些话语再清楚不过地表达了一个阶级的朴实与斗争精神。在粗俗、堕落又不利于团结的环境中，我们的妇女仍旧保持着激情与希望，她们懂得与他人建立关系的全部意义。

这是一个尚未腐朽的民族的品质，它让剥削者再也睡不安稳了，因为我们会继续斗下去，不彻底胜利绝不罢休，我们的行动不仅是向前的一步，也是一声响亮的“不！”，它是一个象征、一次见证。一个民族只有接受奴役的时候，才会成为奴隶。如果它起来战斗、起来反抗，它自内心深处就已经走向自由了，总有一天会得到完全解放。相信我们就是这样，而这就是罢工的意义所在。



声援的声音：大学

另一件有特别意义的事情，是学生第一次参加了集会。毕尔巴鄂各个学校自由公会（las Cámaras Libres）的代表秘密集合，为了向我们表示支持和敬意，他们决定参加集会。

1967年1月14日前几天，也就是判决前夕，我们那里到处是人。超过一千五百人（大多数是工人）把会场和门口围得水泄不通。学生们钻了进来，跟我们的代表说明了想法。好一会时间里，几位工人领导者都在发言，就像每天一样，表达看法并为工人打气。一片肃静中，他们继续着自己的发言。退休工人们的热切关注、学徒工眼中深深的敬佩之情、全体班达斯工人脸上的自豪与满足，整个庄严的印象深深地打动了这群学生。“我们也想自己集会能有这样的气氛！”——“直到现在，我们的集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安静和秩序。”——“我们得让同学也来这里，这能学到多少啊！”……

接着一位学生走上讲台，宣读了他们在自由公会会议上写的信。当一位工人代表请他们上台演讲时，我们充满了期待。因为对这里的所有工人来说，学生和大学，这两个词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总是把它想象成一个更优越的所在。我们身处的战斗异常惨烈，但我们也对学生感到相当的同情。

这位学生真诚地开始“忏悔”（*mea culpa*）：

“我们属于世代将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背叛你们工人世界的那一部分。今天，在大学中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许多人已经睁开了眼睛。我们不希望未来再一次背叛。我们的愿望是与你们一起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但是我们还没能给你们什么。只有时间才能证明，我们的决定最终把我们带到哪里。

我接下来宣读的这些话是在几个小时前匆匆写出来的，它在公会会议上得到了一致通过。这些话代表了我們真诚的敬佩与支持：

谨代表毕尔巴鄂大学区代表大会，代表高等工程技术学院，代表德乌斯托大学经济系、法律系、哲学系与社会学系。致班达斯工人们：

对于我们而言，今天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我们在反抗压迫的行动中走在了一起，这使我们忘记了，我们来自压迫者这一边。

过去的44天里，班达斯的564名工人在罢工，这是争取正当要求的唯一办法。它再次证明了，我们社会的紧张局势是由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引起的。这一制度不利于个人劳动的解放，造成了人对人的剥削。这一制度是由少数特权者的共同利益决定的，他们毫不留情地利用其集权的力量扼住整个社会，阻碍这个社会的前进。因此，这场罢工对于我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其集体性质，尤其是当前体制正驱使人们走向极端的个人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坚信个人只有在社会中才是完整的。

(2) 它表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团结，要比体制的任何镇压手段都要强大。

对我们来说，你们的态度与见证就是一种教导。现在，我们决定走进人民、向人民学习。虽然我们大学生将自己定义为脑力劳动者，但我们还是不了解，并且与劳动的世界现实脱节。出于自负，我们曾觉得自己更加优越，现在我们对脱离你们的世界感到自责。对于所有人来说，大学

不幸从未将其财富（即知识分子）用来服务社会，而它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权者服务，人民从来不能过问这笔财富到底用在了哪里。我们从没有与人民对话过，也没有接受过任何批评。

而现在，你们表现出了工人的空前团结，为了民主自由，你们在斗争中勇敢面对镇压，而我们希望作为脑力劳动者与你们团结在一起。

从现在开始，我们希望和你们一样成为真正的劳动人民的力量，我们希望这种团结不仅仅是在口头上，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现在全心全意地为你们服务。

1967年1月13日于毕尔巴鄂”

最后的几句话引起了激烈的掌声。大学生们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来到人民中间。而在巴萨乌里的这一晚，我们能隐约看见被压迫者事业的胜利将会意味着什么。

从那一天开始，在好几个月里，每晚都有新的学生团体把募集到的钱交给我们。

我们还听说，半岛各地的学生游行也发出了这样的叫喊声：学生一埃切瓦里！学生一埃切瓦里！学生对工人话题的关注是个新现象，它影响很大且引人注目，更蕴含着未来斗争的新机遇。对此，已经无需多解释了。

怀着真诚的希望，我们相信并等待着。

工人领导者的声音

难以用短短数语来讲述我们班达斯的领导者做出的贡献。或许要再次指出，他们无数次成为了集会的中心，也成为了集会中最重要的部分。

这些人付出了不可思议的努力，他们在五个月之久的罢工中挺身而出——这考验了他们的勇气与创造力——但是他们从未束手无策。随着他们的语言一天天变得有力，他们也成为了真正的工人演讲家。

开始集会之前，我们都在小组里讨论。想发言的人会告诉我们的代表，由他们来决定发言的顺序。我们的领导者最后还要组织自己的发言，以免遗漏什么要紧的事。下面是他们的一些话：

“显然，在几个月的罢工里，我们一直在花钱，我们的家庭手头也更紧了。但我们需要意识到，罢工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它不是为了几千块比塞塔，而是为了工人阶级的胜利。”

“我们正在揭露现行制度的一切腐败。每过一天，敌人的真实意图就会暴露一分。对我们来说则是相反，它在一切方面都表现了我们的诚实与勇气。”

“如果我们的抵抗最终被武力摧毁了，有些人将被留在工厂外面。有人说，如果出了这种事就等于败了，所有牺牲都白费了，因为这跟搞一场十天的罢工换来的东西没什么区别。我要告诉这么想的人，你们不理解工人运动，也不理解这场罢工的意义。十五天的罢工和四个月的罢工一样吗？如果我们几天就屈服了，我们还能成为历史吗？谁见过 12 月 15 日的班达斯工人？工人意识的觉醒，随之

而来的声援运动、团结、勇气和组织带来的力量，对工人斗争的推动，这些都具有非凡的价值。”

这里不仅有我们班达斯代表熟悉的背影和声音，全省的众多工人领导者——能来的都来了——也同样被我们熟知和爱戴。他们几乎天天都给我们送来整个比斯开的支持。

“我们代表全省的工人来到这里，大家都希望成为这场壮观战斗中的一员。”

“你们不会因为缺少经济上的支持而被打败。为此，我们就站在你们身后。”

“深受你们信赖的领导人会一直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的抗争证明了某位领导人说过的一句话：你可以欺骗所有的人民一段时间。你也可以永远地欺骗一部分的人民。但你绝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的人民。”

无法一一列举半岛各地工人代表予以我们的无数支持。我们的一位领导人讲完后，他们说：

——“我向你们保证，这样的事情我们从来没见过。你们给所有的工人提供了一个无价的典范。”

——“我们带来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钱，而是加泰罗尼亚工人给你们的团结与亲密的拥抱……”

——“我们在这里和你们度过了一段历史性的时刻，回到马德里之后，肯定会把你们的斗争一五一十地讲出来。在家里、在工厂里到底该说些什么，才能表达出你们的英勇抗争、你们的团结力量呢？”

——“我们已经知道，你们现在什么也不缺了，比斯开的工人也全被带动起来加入到你们的斗争中，有必要的話，我们的家也会为了你们的孩子开放……”

——“到你们这来后，我将带着一颗充满激情、勇气和力量的心回到我的土地上。你们已经成为了工人抗争的中心，你们的斗争就是他人的榜样和萌芽。”

这些充满同志情谊的场面在不断重演。我们的一些妇女还摘下身上的东西，比如胸针和纪念章等，让这些人带回自己的土地。

——“把这个当做班达斯工人的纪念，带回去给你们妻子。愿我们永远保持团结。”

——“回去告诉他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些日子里的帮助。我们也在为所有人的孩子战斗着。我们将尽己所能抗争下去！”

还有一些人摘下了便帽，在帽子上签上许多名字，让这些代表带给他们厂里的工人。这样亲密的行为是说不完的。很多时候我们在一起吃了饭，到了车站才告别。

在集会上

当然，集会并不总是愉快乐观的。有些集会比较特别，它们揭示了我们遭受的困难，展示了镇压是怎样不断加剧的。

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我们去开会时，国民警卫队挡在会场门口，因为上面下了禁令。我们坚决不走，守序地等了两个小时。我们的代表决定，要做点什么来抗议这一不公平的禁令。到了巴萨乌里警

备司令部，他们被告知，命令是由国民警卫队的中校下达的，由于事态紧急，他们决定立马到毕尔巴鄂的军营去找他谈谈。同中校会见时，他们提出了抗议：鉴于罢工的情况，这些集会绝对是必要的，况且它们只涉及公司内部冲突。军官表示他会把这些话传给省长，一切都要等上级的批准。此外，他还要两个人留在那里。接受了条件后，我们的代表迅速返回巴萨乌里——人们已经在街上焦急地等待了两个小时——最后在晚上 9 点，终于能开会了。但我们又迎来了一次打击：我们得知，我们的同志奥萨巴已经被西班牙政府驱逐出境，警方正在找他。（其实前一天晚上，也就是 2 月 2 日，警察逮捕了他的朋友，因为他们把奥萨巴和拜访他的那位朋友搞混了。由于这一错误，我们才提前知晓了政府的盘算。）

在两名秘密警察和两名国民警卫队的陪同下，主席宣读了奥萨巴同志的信，信里说他被迫消失，对我们道别并鼓励大家继续斗争。

以下是其中的几段：

“班达斯的同志们：

在这些光荣的时刻里，和你们分离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事。但我们没有在思想上分离，因为我整天都在念想着大家……

……一想到有叛徒胆敢打破**团结**，我就开始气得发抖。现在我比任何时候都清楚，那些叛徒将会有应得的下场。在我们写给公司的信里说得很清楚。我们是一个整体，不允许差别对待，也绝不会分开……

就算重复到你们都厌倦了，我还是要讲下去。我们的**团结**是不可战胜的。必须视它为最重要的东西。不要让任何人打破它。收手吧，你们是没法愚弄我们的，你们不能破坏我们作出的榜样。如果罢工在饥饿中结束，或者你们

用武力逼迫我们复工，那也是一个光荣的结局。但如果是由几个班达斯工人的背叛，那就不一样了。

我还有些话要告诉那些不介意自己的同事会不会留在街上，那些毫不理解工人运动，也没有工人觉悟的人：好好想清楚你们要做什么。你们的人生会被你们打算犯下的罪行毁灭。

而你们，工人阶级的骄傲，班达斯的雄狮，你们在工人斗争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英雄壮举。在你们面前，管理层再也不能趾高气昂了，因为他们知道，你们是不会出卖自己的，只能用武力让你们屈服，让我给你们一个兄弟般的拥抱，将我的一切托付给你们。你们给了我工人的精神。和你们在一起的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从你们的榜样中，从你们每天的境遇中，我懂得了要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为结束奴役的斗争。

我们很快会再见的。只有经历苦难，我们享受胜利时才会更加愉悦。

我只求你们一件事：别让龚德拉赢了，不能让他再胡作非为。无论如何，你们要抗争。只要有工人阶级的支持，只要我们还有钱就没有理由低头。即使我们不能并肩作战，也请你们继续下去，不要放弃。要知道我们的罢工意味着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他们拼命扑灭它。

现在我也要向你们的妻子道别，这些出色的女工提供了很多帮助，也代我向你们的孩子问好，我们正在进行的斗争，正是为了争取他们的自由，让他们能享受生活的美好，而不用像我们这样，活在这个野蛮的社会。

我还要给这些天里所有给予帮助的人一个拥抱，有如此多的人从班达斯外面来到这里，与我们并肩战斗，毫无

保留地支持我们。

带着愤怒和勇气反击我们的剥削者吧，别被他们打败了，要用我们的苦难和团结来建立一个充满爱、正义与真理的世界。”

那是一个艰难的夜晚。经过了痛苦与愤怒的锤炼，我们的意志像钢铁一样坚不可摧，就算拿枪口对准我们，也不能叫我们退后半步。

过了几天后，国民警卫队撤走了。而秘密警察又围住我们。命令是从马德里下达的。阴险的卡米洛直接接手了这件事，他可是不择手段的。

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la Junta Social del Metal）大多数的激烈抗议下，才让我们使用巴萨乌里工会在建的新大厅。工会这么做是觉得，我们迟早要投降的。

这个房间，他们只许我们用三天。最后一次集会上——尽管这是我们的集会，但它是由工会的政治干部，野心勃勃的巴萨乌里地区新任代表卡里克斯托·罗曼（Calixto Román）主持的——我们又对当前的问题进行了表决，再一次地表现出抵抗到底的一致决心。工会在丢尽脸面之后，就把我们赶走了。

然后，我们开始在桑土楚（Santuchu）的卡门教派（las Carmelitas）修道院和教区等地进行“朝圣”。警察找上了我们——就我们的人数和规模来说，这并不难——还一路护送我们到最后：秘密警察、武装警察的大巴和吉普车……就是说，拿枪逼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一堆人在找到新地方之前，只好接连几天在公共广场上开会。尽管困难重重，我们的士气没有低落。领导者继续带领我们的行动和集会。他们的声音每天都在激励着、鼓舞着我们。

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局面开始变得无望了。在五月的头几天，

警察包围了我们集会的奥查考加教区。尽管带队的中尉向神父保证，只要我们离开就万事大吉，但还是收走了我们的身份证，抓走了没带证件的人。

五月的第二周，也就是我们抵抗的最后一周，就连在公共场所聚会都不行了。这就是我们受到的迫害。为了召开最后一次集会，我们的代表试着得到工会的批准。工会的代表和省长进行了协商，在跟公司方面谈过之后（！）拒绝了我们的要求。

自负的龚德拉，他想让我们在最后一刻拼命挣扎，就像是为他蒙受的耻辱进行报复。

我们的代表团别无选择，只能通过工会向报纸发出一份声明——经过了审查和修改——在尊重每个人自由的情况下，劝说大家回去工作。

对我们来说，这几个钟头是戏剧性的。每个人都不甘心投降。我们受了那么多的打击、那么多的不公，大家都觉得必须继续下去。我们尤其不想把领导者留在外面。

在公司的围墙边上——就在整整三年前，第一次进行罢工的小空地上——我们在那里最后一次开会。经过激烈的讨论，最终做了决定。战斗结束了。但是这场战役仍在继续，因为剥削者和特权者还骑在我们的头上。

我们没法一一列举这五个半月里，集会上发生的一切。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了它们的意义。即使不能举出所有人的名字，也没关系。班达斯的工人们，比斯开的领导者们，以及半岛各地的学生、知识分子和新闻工作者等等，他们都是这场壮观声援运动的见证者，他们将告诉人们，我们既没有沉睡，也未曾被蒙蔽。等着我们的不是坟墓的沉默，而不过是监狱。有时从栏杆之间，有一声呼喊穿过铁窗与高墙传了出去，引起了回响。我们相信，这是来自班达斯和所有与我们一同斗争的人们的呼喊。

（二）传单

法西斯资本主义下的集会权，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它的知情权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半岛上发行的报纸，不过是为体制服务的工具，唯一的区别在于，一些报纸纯粹是法西斯主义的，而另一些则倾向于资本主义。在通讯与旅游部长弗拉加·伊里瓦尔内¹⁸——他的任务是逐步消除对政权温和批评的出版物——的打击下，少数杂志也只能勉强发行。近年来，尽管很守规矩，它们大多数还是被消灭了。

对媒体的控制，是资本主义最常用的手段。通过这种方式，他们也在思想上奴役着我们。对社会有巨大影响的电台、电视和报纸掌握在他们手里。很显然，他们愿意让给我们工会自由，甚至政党自由，因为只要我们没有夺取经济权力，他们将继续控制大部分的国家机关和新闻媒体——也就是让人们的脑袋空空如也，只打算消费他们的产品，并对其社会政治宣传束手无策的最有效工具。英国、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家，就是这样，虽然看上去有着自由，其实少数人控制了越来越集中的巨额资本，他们领导着国家的生活，用报纸来产生决定性影响。例如，在联邦德国，一个老板就控制了几乎 80% 的大型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和杂志里充斥着所谓“逃避现实”的

¹⁸ 曼努埃尔·弗拉加·伊里瓦尔内（Manuel Fraga Iribarne，1922 年 11 月 23 日——2012 年 1 月 15 日），西班牙外交家、法学家。1951—1953 年任西班牙文化研究所秘书长。1953—1956 年任教育部教育委员会主席。1962—1969 年任通讯与旅游部长，在任期间大肆迫害反弗朗哥左翼战士。1966 年参与制定《新闻法》。1967 年参与制定《宗教自由法》。1975—1976 年任内政部长。1976 年发起成立民主改革党，1977 年改组为“人民联盟”1989—1990 年任人民党主席。2012 年在马德里逝世。——中译者注

话题：“性问题”、色情图片、连载小说、犯罪故事、体育……都是为了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现实问题，接受“既定秩序”（在半岛上也有类似的《故事》（El Caso）和《嘿！》（¡Hola!）等等知名的杂志）。

这些“新资本主义”国家与西班牙之间，唯一的真正区别在于，后者通过法西斯集权的方式来控制和影响，不需要任何伪装。比方说在比斯开，三家报纸中的两家——《北方报》和《西班牙邮报》——是由大资本直接控制的，而第三家《铁报》又是法西斯主义的官方喉舌。

不难理解，对于班达斯的这场罢工，它们有什么态度——关于这一点，书里的好几章都讲过——又会得出什么样的社会和政治结论。

工人们被完全剥夺了在自己的报纸上表达思想和提出问题的权利。过去的三十年中，只有通过（难以传播的）地下出版物，我们才能保持并充实自己的思想。

以上论述有助于理解，对于班达斯的罢工者以及其他工厂的同志来说，这些传单价值几何，虽然它们经常出现在本书中，我们还是要简单地讲讲它的故事。这是没法绕开的，因为它自始至终伴随了整场罢工。

罢工开始后的短短几个小时里，它就到了我们手上。在这些艰难时刻，难以解释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只有过去三十年里经历过罢工的工人，才能完全体会到这一点。最初几个小时的气氛非常紧张。一切都是悄悄组织起来的。我们关于以前罢工的记忆只有痛苦和迫害。大家充满了焦虑。没人知道罢工成败如何。管理层不断威胁我们，企图破坏工人团结。大家很难及时得知情况，一旦有人尝试联系其他部门或车间的同事，立马会被公司当成可疑分子。

在罢工开始时，这些都或多或少发生了：激动、威胁、担心、警惕和困难。每个人都留在岗位上。在习惯听到轧制设备、起重机

操作和十二吨钢管不断滚动之声的大型厂房里，这样的安静实在是一种折磨。我们只能紧张地听着主管们的脚步声，他们走过来多半是为了瓦解抵抗。突然，所有人都没料到的情况下，这些传单到了我们手上。它们悄无声息地在人们手中传递着。很容易从短短的几行字中，感受到我们信任的领导者的精神。集体的意志得到了表达，行动的团结也有了保证。从那一刻起，我们已经不担心什么流言和骗局了。

正如本书开头提到的那样，传单的出现让我们能在占领工厂的头几天，与我们的妇女取得联系，让她们送吃的，再到巴萨乌里工会去。在每个街区里，她们把传单发给其他人的家庭。我们在传单上解释了，这场抗争也是为了她们，为了我们孩子的未来，这让她们非常感动，也解释了后面发生的一切。

传单的价值还不止这些。后来，在我们被赶出厂的几天里——那些天我们在巴萨乌里广场上开会——它传达了领导者的话，并表达了所有人的意见。它的到来与分发让所有人亲密无间。在小组讨论中，我们讨论了当天的新闻与口号，听取了每一个人的意见和批评。最后，我们回到家里，把得到的消息告诉家人，很多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都在研究罢工并想办法解决每天传单上提出的问题。

当我们在奥查考加和巴萨乌里举行集会后，传单和集会变得更加密不可分，相辅相成了。前者收集当天的决议、领导者们的行动、有关罢工进展的新闻，最后提出新的问题以待下次集会上解决。

但是传单不仅是为了罢工者准备的。那些日子里，全省许多公司的代表也赶来集会：——“喂！我的两百份在哪儿？”“可以的话，明早给我们公司留一百份……”“方便起见，你们要不每天专门给我们厂印个五百份。”许多时候会吵起来，因为大家都想要，传单却没那么多。

我们可以说，在这 163 天里，比斯开有了第一份工人日报，这也是过去三十年来，整个半岛上第一份工人的报纸，比起少数统治者的喉舌，它肯定诚恳和真实得多。

除了每天出版之外，大约每个月会特制一份三到四页的精彩报道，讲述罢工的基本态势。这些报道主要供给比斯开以外地区的工人阶级，因为他们的代表坚持想了解我们的进展。

传单的制作

从一开始，我们当中有人专门负责写作。另一些人准备材料，再打印个两三千份。最后，还有些人负责分发。警察——就算他们急了眼，还一再迫害工人——没能阻挠它的编辑，或阻止它的分发。每一场集会开始前，传单都会神奇地出现。罢工的五个半月里，几位同志每天冒着被“当场”逮捕的危险送来传单。好几次他们差点栽了，但都有勇有谋地逃出了罗网。

负责传单的同志还完善了自己的组织，在无法开会的日子里，他们居然把传单邮寄到我们手上！为此，他们记下了我们的住址，用睡觉的时间来准备材料，写地址，贴邮票。

在三月和四月里，传单得到了加倍的“关照”。有关部门对我们每个人的房子、教会和活动场所等都进行了大量的登记。他们一直在搜查，还没收了 16 台印刷机。警察未经许可就闯进了阿里斯教区的小教堂，但是扑了个空。同时，警方还无数次审讯了我们的领导者，结果总是一样。有关部门干啥都不顶用。在后来的采访中，最高警察长官承认了他们的完全失败——他把这归咎于给我们提供场所和印刷机的神父——并感叹道：“不管怎么样，这些传单让我们摸

不着头脑，在教堂里我们见到的是老朋友桑丘！¹⁹”

当然，他们到最后也还是摸不着头脑。复工当天发布了最后一期传单，它对我们斗争的全部意义做了激动人心的总结，并纪念了那些被解雇、关进监狱，还有流放的同志们。

毫无疑问，传单是使我们不断觉悟的富有创造性的工具之一。它每一天都会给这场斗争指明目标，并体现了罢工的真正民主性质。它们是罢工的鲜活历史，它们反映了我们的团结与斗志的价值，反映了工人的声援活动，反映了资本主义的恶行——它每天都会用新的压迫手段，为我们的传单提供素材。

我们可以断言，在这几个月的短暂而深刻的经历中，传单和集会就是工人运动的两所真正学校。



¹⁹ 此处引用了《堂吉珂德》，比喻扑了个空。——中译者注

技术人员的做法

工程师、
律师、专家、
经济学者……

这和利己主义没有关系。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法西斯资本主义的三十年独裁统治下，社会的各个角落早已彻底腐化。它关闭了通往政治自由的道路，将文化限制在狭隘的眼界里，而这几代的大学教育铺成了一条向上钻营与野心的荆棘路。它在资本主义为所欲为的底层，用金钱的鸦片熏染这些技术人员。魔鬼总是把残羹剩饭丢给最忠实的仆人，让他们为己效力。而其它的选择意味着监狱、诽谤和放逐。当然，还有失去社会和经济上的特权。

我们说它已经烂到底了，因为毫无疑问，资本主义从没有如此贪婪露骨地表现出它对金钱的狂热、它的利润至上法则。资产阶级从高高在上的金钱神坛——少数人在那里玩弄着多数人的生活——陷入了欲望的泥沼²⁰。好在，他们在权力的狂欢中蒙蔽了双眼，认为人民永远无法摆脱沉重的枷锁。但是，人民对他们从特权的餐桌上慷慨撒下的面包屑没有兴趣。好在，暴露于污秽中的无产阶级，同样染上了最粗野最顽强的个性。他们承受的野蛮行径和无止境的剥削（十二小时工作日、吃不饱的工资和监狱般的工作制度），让他们在迫害下变得坚不可摧。即便是粉碎我们，夺去我们的一切，工人仍然保持着鲜活的革命热情，尤其是一些人，他们从卑贱和屈辱中

²⁰ 本书作者认为 60 年代的资本主义“烂到底了”，可是 21 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社会比 60 年代更烂十倍。回过头看，60 年代被今人看成充满朝气、反抗和生命力的时代，但当事者感觉深陷泥潭，充满苦闷，渴望寻找出路。——李星注

挺身而出，即便面对恐惧和饥饿，即便要与一切对抗，也会有人起来斗争，就算被打倒也会重新站起来。

我们工厂的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马图拉纳、卡尔巴乔、佐利亚、菲利皮尼等人，他们也没能超出金钱、奴性、无道德又无底线的野心。他们贪婪无度，因手握权力而自负，作为优秀的技术专家而瞧不起我们，把工人视作二等人、纯粹的物件，视作比轧制设备更廉价的机械。

我们很多都来自农村，班达斯是我们进的第一家工厂。所以我们无法做比较。这些专家是不是比其他厂的专家更坏？重要的是，他们很好地完成了主子赋予的使命：压迫、惩戒和控制；让我们相信提什么要求都没用、迫害我们的领导者等等。

这些要视他们的个性和行为方式而定。在艾罗多伊当经理的几年里，他们乖乖搞着“人性化管理”。姑且还没有那么让人咬牙切齿的不公平。

我们只有一个食堂，所有人都能在那儿看到艾罗多伊。食物和价格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对待。工程师、专家和其他主管也会来这吃，可能是看到经理在这儿吃饭吧。

在巴斯科尼亚和龚德拉主持公司后，情况就变了。上面不断下达过分的指示，技术专家们也照做了。这些人抛弃了“民主过头”的食堂，涌向了巴斯科尼亚的饲槽，新经理在那里把金链子亲切地套在他们的脖子上，让他们成为驯服的奴仆。

巴斯科尼亚有四个食堂：一个给工程师和其他的高级干部、一个给专家、一个给职员，最后一个给工人的。第一个食堂（它在另一栋楼）一直都吃得很好：汤或杂烩，菜单上主要有两样：牛肉或鳕鱼；时令水果、蛋糕，咖啡或一杯名牌葡萄酒，又或卡洛斯一世白兰地。菜单一级一级往下降。最后轮到工人时，就只能吃到 8 比塞塔的一碟菜豆和一块面包。

说清楚这些是有必要的。这就是龚德拉的作风和性格。不论是工作、工资还是养老金，其他方面也一样。他玩的总是这一套。比方说，1960年以来，技术专家们的工资已经涨了超过150000比塞塔，一些人涨的还要多。而工人的工资从没有涨过25000比塞塔，正如前面所说，这都赶不上物价涨的快。

接下来的几年里，有将近四十名专家从班达斯辞职。但他们不是为了抗议工人受到的不公对待，而是因为龚德拉的亲信，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态度令人难以忍受，这个人为了奉迎上意，连最亲信的人都毫不顾忌地驱使。

留下来的是奴仆中最听话的、狗腿中最无耻的。他们逐渐爬上了高位。希斯内罗斯当上了运营经理、卡尔巴乔从法律顾问升到了人事主管、卡佩拉斯特吉从部门工程师升到了生产主管、菲利皮尼当上了工程师的头、马拉图纳这个冷酷和狡诈的经济学者也当到了调查主管、佐利亚·莱奎利卡没什么脑子，却当上了挣钱很多的质监主管，等等。

他们爬得有多高，就对我们有多狠。很明白，他们的晋升和对工人的压迫之间有着直接关系。理所当然。当一个人为了钱和野心，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就很适合提拔到管理的岗位。

就这样，我们在班达斯的处境越来越糟糕。如果把这帮人对我们的不公全部讲出来，那可是三天三夜讲不完的故事。他们算得上无所不用其极了。

我们只需举一个例子：工会选举。那时，工人们在奥查考加偷偷开会，决定投票表决。我们分为四组来选候选人。一切都组织得很完备。选出自己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也是我们在公司内部斗争的一种方式。管理层得知我们的计划后，马上采取了措施。当然，我们并不指责公司的做法。我们是在你死我活的战争中。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被压迫的劳动者捍卫自己，反对有权势的压迫者的战

争。让我们厌恶的是他们的手段和伎俩。而且在某些时候，他们应该感到自己背叛了工人，他们自己也是劳动者。卡佩拉斯特吉和卡尔巴乔在工作时间召集了专家、师傅和技术人员。除了他们不信任的一小部分人，所有人都叫去了。“你们在犯迷糊，必须组织起来，你们看不见工人在鼓捣些啥吗？我们必须把自己的代表选进去，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后来几天的工作时间内，他们聚在一起选出卡佩拉斯特吉当候选人。没人反对，大多数人因为怕事和奴性照做了，有几个人没有马上签字。后来，他们的把戏还是不顶用。十二名代表团成员中，有八名从车间产生，联络员的绝大多数也都是勇敢地捍卫我们的利益，在剥削者面前为我们挺身而出的同志。

他们在罢工中的行径

我们的罢工开始了。师傅们也很快加入了我们。现在，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卡尔巴乔这些人，已经不再说什么“我们必须选出代表，保住我们在公司里的利益”，而是说“你们就是公司”，“你们是管理岗，你们有责任。你们不该罢工”……

刚开始，他们尝试用威胁和恐吓来打破我们的团结。国民警卫队用暴力赶我们出厂时，他们全都插手了此事。

几天后，巴斯科尼亚的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的第一封信上了《铁报》。他穷极辞藻为公司申辩，写了一堆晦涩难解的技术观点。但这还不够。到了十二月中旬，他在那份报纸上登了第二封信，内容如下：

“主编先生，
请以您的宽宏大量，再次允许我用以下文字劳驾您，

虽然班达斯轧制的问题较为复杂，我尽量在此简明扼要，为澄清有害的误解、缕清思路，以便问题更快解决。

贵报在12月10日和15日的版面上，评论了劳工代表于9日所做的决议，这一决议事关班达斯公司轧制车间的奖金制度，贵报（在前者的标题中）表示其内容是有利于工人的。请允许我在此说明，不能从这份决议中，得出那份十二、十三名车间工人的声明——他们认为这种奖金公式会损害他们——中的结论。

劳工代表的决议中，承认班达斯轧制公司在关于车间奖金的所有问题上都做的正确，甚至引起冲突的奖金计算方式，也要比正常标准下开的条件更好，但为了正式生效，它需要劳工代表的官方裁定。此外，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这一观点已得到或多或少直接干预本次冲突的其他官方人士的认可。

澄清这一点是最基本的，因为工人群体在这一点上犯了错误，才加入了罢工——以及不遵守规章制度——但实际上，并不存在损害他们利益的情况，各类声援活动也滋生了诸多问题，并对目前的情况有所影响。

主编先生，您一定能理解，假如劳工代表的决议正如贵报说明的那样，本公司将一如既往地基于减少各种损失的最大愿望，从一开始就承认它。

主编先生，最后要说的是，工人21日不在厂里上班，因而拿不到圣诞节的特别奖金，公司是毫无过错的，正如我前面所说，班达斯轧制公司始终以最大的细致来处理各种问题，要求时刻遵守纪律，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圣诞节是人和人之间的爱的节日。我们大家都认可这一点，因为我们是平等的人。爱也包括权威，因而也包括纪律问题。

感谢您的关注，恭敬地向您致敬，

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
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

我们没有很快答复，后来我们将下文寄给同一家报纸：（斜体部分在发表时被删去）

“主编先生：

我们希望在这份日报上刊登这封致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服务研究主管，胡安·何塞·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先生的信。

洛佩斯先生：

这封信专门写给你，也写给在班达斯轧制公司的冲突中，站在资本这一边的人。我们觉得有些话会冒犯你，这并非我们的本意。但是，如果说我们工人在日常生活中一直受着侮辱，那现在正好有机会让我们多多少少平等地坐在一起，你们会看到工人的真理有多少分量。

首先，班达斯的工人想感谢你在1月19日星期二在《铁报》上发表的那封信。是的，因为它激起了我们的愤怒，同时也坚定了我们的立场。

11日星期一，在《周一小报》（*la Hoja del Lunes*）上发表了菲利克斯·加西亚·奥拉诺（*Félix García Olano*）的一篇关于圣诞节的文章。这篇文章里提到了工人很感兴趣的话题，它说：“资产阶级的行为不过是体面的下流。”无意冒犯，但我们觉得，你也认为“工人群体”不够“体面”，我们认为你的信里只有两种品质：体面和下流。前者

是因为你说尽了甜言蜜语：“宽宏大量”、“细致”、“人与人之间的爱”、“公司会一如既往地基于……的最大愿望”，而后者是因为，在这些话后面，掩盖的是你虚伪和卑鄙的真正意图。

这一点都不让我们感到奇怪。毕竟，你不过是一个典型的、远离人民的资本主义技术官僚。你的科学是冷酷、麻木不仁、没有灵魂的科学。你没有发明什么，你做的不过是接受和顺从它。我们懂得，你在班达斯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剥削。大家都知道，巴斯科尼亚的经理层总是说：“注意员工的人数，每个工人要花我们十万比塞塔。”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我们工人是一项支出，是为了提高利润，厂里必须降低到最低限度的开销，而利润就是你们唯一崇拜的神。所以在你们看来，我们在公司里的处境是很正常很公平的，现在你们还想把这场冲突和整件事搪塞过关。

尽管我们已经厌倦重复这一点，但为了再次让你明白，同时也让所有人明白，我们要再次说明，班达斯的冲突是由于——尤其是新的经理到来后——我们不断受到无理对待。此外，我们的收入减少了。不仅是车间，许多部门的职称和奖金都降低了。所有情况下，管理层都没有考虑过谁的意见，无视了工人的要求。

然后，你们还把这些做法用在了其他组织（比如工会）上。在冲突的早些时候，你们对工会的地区、省和国家级别官员的态度十分恶劣，以至他们要求对公司处以罚款。你难道不清楚罚款的那些事吗？

对你的信，我们最惊讶的，是你对劳工代表决议的巧妙解读。你想说的不过是，就算劳工代表没有进行裁判，情况也对你有利：就是说，管理层随意规定的标准，无论

如何都是正当的。只要这一标准还是不公正的，我们就会不停地揭露它。

如果你不理解的话，我们在这里告诉你，劳工代表关于奖金问题的结论如下：

(1) 管理层非法克扣了大量的奖金：包括电解镀锡、热镀锡、金属板车间、起重机与维护等部门。

(2) 如果没有发生这场冲突，你们永远不会听取早就提出的意见，而且有这么多的比塞塔从我们手上被偷走了，你也清楚，要是你们承认这一点会有什么后果。因此，劳工代表让你们支付自 10 月 3 日起整整六个月的奖金。

(3) 多年来，你们没有给我们提供计算奖金的表格，这违反了《国家金属业条例》第 45 条和我们的工会协议中的第 31 条。你们一直都在随意玩弄数字。

你说这些有利于“工人团体”，我们可不觉得。

我们还要问：如果说，你们先是待我们十分无礼，解雇我们 560 个人，然后又要我们复职，但是把我们中的十到十五个人拒之门外，我们才非法挑起了这场冲突，那么对于管理层的非法行为，我们应该解雇你们多少个呢，洛佩斯先生？还是说纪律和权威只适用于工人呢？我们厌倦了不管多小的事——即使是工作上的正常失误、在白天打瞌睡和迟到一个小时——也要受到严惩，而你们可以肆无忌惮地盗窃奖金、违反规定和滥用职权等等，却屁事没有。我们不能否认，当权威成为压迫的工具，而纪律成了让弱者受强者剥削的鞭子时，我们应当出于义务起来反对它，我们也很荣幸这么做。

你还说“工人团体”是“犯了错误”才保持一致的。你对我们都了解些什么！由于你来自资产阶级的世界，你

最大的不幸就是无法理解我们工人世界的伟大财富。

你的最后一段话，也是你这些天吓唬我们的无数威胁中的又一杰作。你知道是谁想出在报纸上登广告招人，还用书面申请这个主意的吗？我们今年确实拿到了特别奖金，但不是金钱，而是同志情谊和团结。总之，我们知道这些“价值”是不能当钱来花的，因为它们对于一些人来说是无法理解的。

你还说，人和人之间要有爱。都是空话。我们要的是事实！

最后，让我们很惊讶的是，出面解决问题的都是巴斯科尼亚的员工。班达斯的管理层哪去了？他们只有时间去给运镀锡铁皮和金属板的货车装卸吗？你还要当心，因为巴斯科尼亚的工人来到班达斯后，会作为新员工失去一切。可不要在你们身上发生同样的事了！

我们承认，我们在尝试对话，但这太难了。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涯告诉我们，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不管怎样，我们的埋头苦干不过是在给他们创造更多利益罢了。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这封信让气氛变得更为紧张，班达斯罢工的意义也越来越重要。当然了，公司的狗腿子继续忙于对工人耍花招。

“新员工”们

罢工最初的二十天里，工厂完全停止了运作，仓库里的货物纹

丝未动。由于公司代表团的警告，资方从巴斯科尼亚调来起重机操作员的企图失败了：这些操作员也威胁要罢工。当时，公司虽相信我们不会很快投降，却也不急。只是看到我们连额外的奖金也不要，他们才明白，这场罢工没那么快收场。

然后公司有了对策。我们没有完全搞清楚，但似乎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上面想出了一条妙计：——“工程师和专家负责货车的装卸。”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干劲十足，也许是觉得以后能拿到好处。这一指示是挨个亲口传达的。不难看出：狗腿子之间没什么团结；每个人都是为自己拼命，为了往上爬；谁也不能相信；别人都是竞争对手。可能有人不想这么干，但不同流合污也不行。只有三四名专家拿出了拒绝的勇气，留在了办公室里。卡佩拉斯特吉还时不时地暗示，像什么：你很忙吗？“唔是的，不过这几天不着急。”显然，如果他们都拿出勇气，结果就不同了。但并没有，因为他们被划分了等级。

12月20日的传单有以下内容：

“那一天，工程师和一些人从办公室的窗口嘲笑给我们带食物的妇女，现在轮到他们被笑话了。菲利皮尼、卡佩拉斯特吉和所有的侍从都‘当起了工人’给货车装卸。总有一天，我们会向你们这些叛徒和工贼算账的。这不是为了报仇，而是为了正义。

你们将一无所获，因为我们并不着急，我们就等着看你们轧制、切割和打磨。要命的是，你们到时候就知道当工人和被压榨是什么感觉了，到时候你们也会想加入罢工。”

从12月20日直到罢工结束，他们试了各种办法破坏罢工，甚

至开起了机器。一些人负责操作起重机——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卡萨多、伊尼亚拉等等——其他人打下手，比如苏加萨、索拉斯还有狡猾的拉米雷斯……由戈依科切阿和德诺负责警戒。看样子他们担心受到袭击。

12月22日的传单表达了大家的愤怒：

“我们要求卡尔巴乔立即惩办卡萨多和菲利皮尼，因为他们装一包镀锡铁皮的时候，把货车的座椅（cartola）弄坏了。要罚他们40天的钱！这些二把刀“工人”还打着领带。看样子他们已经嫌累了，怎么不扣他们工资啊。”

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平时上班有多难，即使犯了小过小错，也要被公司惩罚。

一些工程师的信——回信

1月2日，一颗炸弹落在了毕尔巴鄂。是的，一批工程师在毕尔巴鄂的《周一小报》上发表的信，像是一颗真正的炸弹。立场不同，对此事的看法就不同。

我们将这封信抄录如下：

“总经理先生：

首先我们对这封信能刊登在《周一小报》上表示感谢。

我们是一群工程师，希望对班达斯轧制的劳工冲突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报纸上、机关（Cifra）的公告上，以及上述公司的工人在《铁报》上发表的信中，可以得知，身为专业人士：

专家和工程师，我们正在干装卸货物的活。

单就这件事来看，坦白说这也挺好的，虽然我们本身也属于劳动者，但距离真正的工人世界实在是太远了，当一回工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也许没有人会像体力劳动者那样专门来创造财富。在人类发展的伟大任务中，没有人像他们这样付出牺牲，甚至要冒生命危险。但我们总是看不起他们，为自己有点知识和技术而自负，而这些不过是在特权下得到的。事实就是这样，尽管他们是最大的社会群体，但从工人世界中走出的大学生只占了百分之一。

在我们谈论的这件事中，这些人做的都是让我们觉得自己去干就很丢脸的工作。但我们想让你们看到，不管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周围的环境，都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所以不能根据他们的地位，就觉得这些人是“坏”的。不，这只是环境的结果、是这个制度的结果。

为了意识到这一点，必须清楚地看到，实际上，在资本制定的法则中，无论是对脑力劳动者还是体力劳动者而言，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都是为了利益最大化。因此，资本毫不犹豫地让人去剥削人、让社会劳动服务于物质利益，而不是服务于人。它扼杀了人们的理想，迫使其为资本效劳。

对于体力劳动者来说，他们的处境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专业人士来说——我们再次重申，这类人也是劳动者——资本不过是允许他们进行一些最表面的管理、利用他们的自私心和不团结，再给予他们更好的社会地位和更优越的生活（更高档的消费水平）。这样做的结果很明显：

首先——资本将专业人士的技术占为己有，把它用在劳动世界里为自己服务。

其次——专业人士看不到自己的利益和体力劳动者是一致的。毕竟，他也只不过是具有某种特长和技术水平的工人，对于资本来说，他也不过是生产手段而已。

简而言之，尽管专业人士看上去保持着中立，但他们还是将自己卖给了出价最高的人，站在资本一边反对工人。而在班达斯轧制公司，我们不想这样。

最后，我们能做的，只有对班达斯轧制的职员和工人表达敬意，因为他们坚定地站在了劳动者的立场上。

再次感谢您百忙之中阅读我们的来信，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一群工程师”

不出所料，第二天在全市所有的报纸上，都刊登了工程学院的虚伪声明，在1月4日也发布了工业专家学院的声明（里面意思差不多）。报上刊登的内容如下：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向我们寄了以下声明：

毕尔巴鄂工程学院理事会（Junta de gobierno）有义务声明，昨日在毕尔巴鄂《周一小报》上发表的关于比斯开一家公司的劳工冲突的信，只是个别工程师的个人意见，这些人的身份和人数也尚未核实。

上述信件与劳工冲突完全无关，我们也收到了大量谴责与反对的意见，本委员会认为，这封信中关于工程师的社会职责的观念是侮辱性的与错误的。

多年以来，在致力于工业发展和劳动条件改善的过程中，工程师赢得的声誉要远远超出这些个别观点中的看法。

学院理事会”

“巴斯克工业专家学院的官方声明

毕尔巴鄂工业专家学院理事会及众多校友对《周一小报》刊登的文章表示抗议，那些不知道有什么资格自称‘一些工程师’的人发的议论与劳工冲突无关，他们‘超纲’了，至少他们不能对技术专家的社会职责如此冒犯，文中的指责完全是不负责任的。

学院理事会

1968年1月4日星期三”

工人世界也很快做出了回应。当然，不管是《北方报》、《西班牙邮报》还是《铁报》都不会刊登我们的答复。工人代表向《周一小报》发了很多封电报。为表示对诽谤和谎言的抗议，也给工程和工业专家学院发了很多封。作为回应，各公司的代表团也给各自的管理层写信，要求谴责这些声明。

我们给毕尔巴鄂工程学院写了一封更详细的信，内容如下：

“致毕尔巴鄂工业工程学院理事会

先生们：

我们不希望加深你们与工人之间的分歧，而是相反。

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些工程师署名并发表在《周一小报》上的信，忠实地反映了我们每天面对的可悲现实：工程师和其他专家都将自己的利益与资本的利益视为一体，几乎没有例外。

对我们来说，要证明你们在所有的冲突中是怎样站在资本这一边的——如同在我们公司一样——也不是一件好

受的事情。

你们的声明都是空话。里面甚至还说‘上述信件完全与劳工冲突无关’。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严肃的，不能不加评判地就把这些事实放在一边，还把它们当做‘侮辱和错误’。

因此，我们完全反对你们在报纸上的声明。随便写这些话、无视任何在日常工作中发生的事，这样做是很容易的。我们要求，将我厂正在从事装卸的工程师和专家的行为公诸于众。我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希望看到你们所说的‘工程师们在劳动条件的改善中’都做了些什么。

我们寄希望于一个与现在不同的未来，让专业人士服务人民，而这些人写的信是为了表明他们决心放弃资本主义赋予的不公平的社会与经济特权，而你们相反，出卖了自己的技术，更糟的是，出卖了自己的良心。

真诚的，

签名：班达斯轧制工人”

工程学院还不满足于那篇无聊的声明，甚至想弄到《周一小报》那封信的作者实名，以便控告他们。看样子，他们怀疑是否确有其人。当然，抱有这种想法的工程师确实不多。后来，《周一小报》的主编确认了作者是真正的工程师，而不是像猜测的那样是神父，另一方面，他们的法律顾问找不到指控的依据，只好作罢。

这里要指出一点，班达斯轧制的运营经理，工程师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当时还是工程学院的秘书。

班达斯的全体工人，以及整个比斯开的工人阶级都注意到了这件事，并为这些同志做了辩护。作为声援，我们写了一封信：

“致向《周一小报》投书的工程师们

同志们：

这封信起笔的时候，我们想说一件事：你们在1月2日星期一寄来的那封了不起的信，在所有工人中间激起的感受，是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表达的。

但是，我们要以所知的最好方式告诉你们：我们的共同愿望是向你们致以工人世界的感激，感谢你们在信中表达的一切。

你们将工人的最大悲剧——几乎所有科学技术专业人士的背叛——公之于众，他们将知识和个人出卖给了剥削我们的资本主义。

我们向工程和专家学院写了一封抗议信，给你们抄送了一份，我们抗议那些不满足攻击你们，甚至还要捍卫不应得荣誉的人。

我们都知道，在那封信上签名对你们可能意味着什么。这是将自己完全归属于工人阶级的唯一道路。受到迫害，就是你们说出实话的标志。但是，你们还拥有我们的支持。我们将竭尽所能捍卫你们，除了我们之外，其他人也是如此。新一代人正在涌现出来，他们充满希望、前途远大，而你们也在其中。

你们的立场，使我们坚信斗争不是没有成果的，最重要的是，你们在走狗的坚固战线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以团结和工人情谊的名义，致以我们的友谊。

班达斯轧制公司工人”

当然，班达斯的工程师和专家将在整个罢工期间继续为公司装货。也许，当看到自己不齿行为被曝光后，这伙野兽变得更残暴了。

事实就是这样。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他们唯管理层之命是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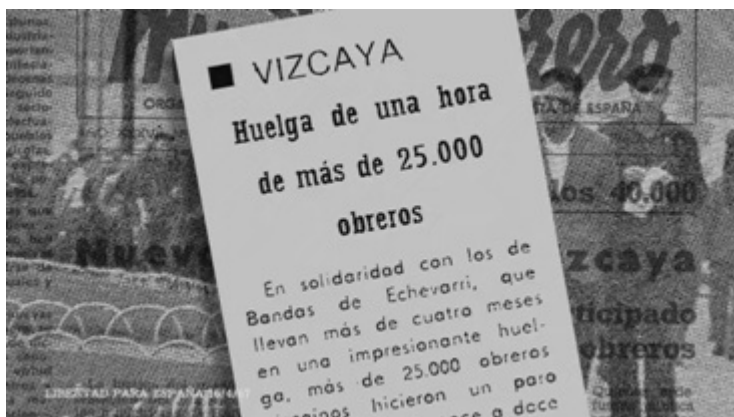
有时候，他们会秘密拜访师傅和潜在叛徒的家，收买或威胁他们复工，以此破坏我们的团结。他们还花了很长时间调查每个罢工者的背景，以便决定除掉谁。为此，部门主管工程师、人事主管和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的办公室开了会。他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真正的密探档案，里面有我们每个人的照片、个人信息、工作职务、受过的处分和对每个人“危险”程度的批注。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把它放在桌上，用来决定复工时要不要开掉某个罢工者。不难想到，各部门负责人都提供了本部门工人“颠覆”活动的细节和资料。我们来看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

“他是个害群之马。他经常反对十二小时工作，也没有留下来过。”“那个人也要开掉。一出事，所有人都问他拿主意。你们都看到他是怎么被选进代表团的，又弄出了什么乱子。”“把他开掉！这人老是提要求，他也是罢工开始最先停工的。”“这是个带头的。他一直向劳工法院投诉，每次麻烦都有他！”“所有人都认得他。听说他还在巴萨乌里教区的集会上搞煽动。”

在这些会议上——加上最高警察长官提供的名单——列出了所有被解雇者的名单。

我们前面说过，在罢工的最后阶段，管理层中有几个人去了加利西亚、莱昂和萨拉曼卡，蒙骗工人破坏罢工。

也许，这些技术专家和他们在罢工中扮演的角色，值得深入思考，接下来我们将提供更多的材料。



背叛的奖赏

经过 163 天的抗争，罢工结束了。只因我们不肯屈服，他们就用了无数的镇压手段。

在紧急状态下，他们给了罢工最后一击，不仅是班达斯的家庭，比斯开很多地方的人都吃了苦头。总之，整个工人阶级与其他一些社会大众，在这些日子里经受了极大的不公。

面对我们的痛苦——进一步说——因为我们的痛苦，他们得到了喜悦。因为我们的贫困，他们得到了满足。因为我们的不安，他们得到了心安。

我们都住在毕尔巴鄂公园旁的吉亚德（T. Guiard）大街上。经理的女儿维多利亚·龚德拉住在三层的豪华套房里。她婚后没有子女，但房间很多……佣人也多……

住在那里的人不用担心解雇，或者被房东赶出家门。也不用担心进监狱或是被流放。三十年来，警察从没用登记、审讯和殴打，惊扰过他们安逸的美梦。由于她父亲代表的资本主义的恩典，这些

只会发生在工人的街区里，发生在那些反对他们的权力、反对他们的政治思想的人那里，一句话，发生在千百万人的家庭里。

5月20日晚上八点。客人们进了她家的大门。不用费力就能认出他们。来这里的都是班达斯和巴斯科尼亚的走狗：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伊瓦拉、卡德纳斯、乌鲁蒂亚、卡萨多、伊尼亚拉、佐利亚、马丁内斯·萨瓦雷塔、德·诺、乌达巴雷纳、戈依科切阿、博兰、奥尔蒂斯、萨尔杜阿。

已婚者都带上了衣着光鲜的太太。

龚德拉一家在门口满意和慈祥地接待了他们，如同老师奖赏最听话最用功的学生。

不用多说，血腥味还未散去之时，他们就急匆匆地举办这场晚会，是为了庆祝我们被打垮，奖赏最忠诚的刽子手，奖励他们在经理的英明领导下想出的，或是原先就藏在脑袋里的无数诡计、卑劣与谎言。

晚餐很丰盛。应有尽有。这些人一边吃喝、一边厚颜无耻地谈论近况。

突然，经理夫人要求大家安静，然后经理开始致辞：“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令人不快的几个月里，管理层对大家的合作深感欣慰。好在一切都圆满结束了，我们可以再次怀着热情服务公司，我们就是它的一分子，每个人都应该各司其职。

公司向大家表示感谢，感谢各位忠实捍卫了公司的利益，我的女儿也会给诸位的夫人献上一块金表，作为庆祝我们完满胜利的纪念。当然，我也会赠给单身人士精美的手表。

我希望，经受了这数月风波之后，大家的团结会更牢固，而在将来，我们还要为了公司和家庭继续保持这样的关系。”

在场的人热烈地鼓掌，然后领取了奖给他们奴性的赏赐。总是这样，在他们早已沉重的枷锁上，又加上了更多的金子。

但他们的无耻还不仅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或许只是被奉承冲昏头脑，他们还想给经理送一份大礼。但是，他们的想法没能一致。让我们来听听卡佩拉斯特吉和菲利皮尼的不同意见：“我们不同意。龚德拉先生给我们送了手表，还给了比平时更多的钱。现在还要我们反过来掏钱，那不是亏了！当然面子上要过得去，稍微两千比塞塔意思意思就好了。”

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四十只手表和这份大礼。我们也不会忘记接受礼物的人——他们知道这是用他人的血汗换来的——这些人进一步卖身投靠了资本。

对于未来的技术专家们，这是一件重大的教训！是的，一旦你为了私利，给压迫人民的那些人服务，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走到哪一步。这里有一个现成例子：他们走向了憎恶与背叛，趴在了那些通过剥削攫取财富的掌权者脚边。

官方组织的态度

本书的各章节，以及三十年来半岛上的经验，足以说明官方组织的态度，我们不想再做更多的展开。

其实，从官方组织的态度上可以看出一切，它们是在履行本职工作：通过各种镇压保持社会与政治上的独裁统治，以便大地主、金融和工业寡头能在它的秩序下，保住权力和特权。

我们罢工中的情况也不例外。但由于其持续时间之长，就像上面描述的那样，官方不得不出面采取了一系列的行动。

在这里，我们只关注对将来的活动有用的方面。

官方工会

民族工团主义中心的巧妙手段，值得特别注意，它是战后成立的长枪党垂直工会，旨在束缚工人，让工人臣服于法西斯。

后来，早在新《工会法》颁布之前，政权就试图让民团工会“美化”当局、掩盖过去，并让它履行新的使命：同化工人阶级并以此来领导它，让它慢慢走向非阶级和去革命性的（但至少是改良主义的）工团主义，这是渴望完全融入西欧和世界资本主义的垄断大资本想要的结果。

虽然在民团工会的“掩盖”下，雇主和工人之间仍有着深刻矛盾。为了这一目的，他们到处宣扬省劳工代表主张的、关于提高最低工资和其他谁也没听说过的社会改良的一文不值的决议。工会签署的集体协议完全是为了资本主义的利益而制订的，他们却伪装成工人的胜利。他们以“投票给更好”（*vota al mejor*）的口号，发起了广泛的工会选举运动，后来又找借口把真正的工人领导者排除在外。我们都很清楚这是骗局，而工会仍假装在捍卫工人，如此等等。

不管有没有粉饰太平，让工人接受这个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在充当资本主义利益傀儡的工会，实在很难。但是，即使他们也明白是白费力气，仍然继续拼凑这些组织。他们大谈改变法律和自由化，却不想还给我们失去的自由。

这场罢工再次验证了我们的观点，即长枪党的工会始终都是为了金融和工业寡头服务的政治工具。

最初的阶段，它在马德里工会官僚的授意下，让我们上了一些当。它对班达斯管理层做了“点到为止”的批评，并多次要求省长对公司罚款²¹，因为他们拒绝工会官员进入公司、不承认工会仲裁委

²¹ 龚德拉后来马到马德里撤销了这些罚款。——原注

员会的报告（它有利于工人，提到了引发罢工的直接起因是奖金问题）、不让工会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进行培训，以及不让它进行后续调解。

不难看出，它的角色是可悲的，它根本不是旨在与资本主义斗争的真正工人组织，但在发生罢工时，它的职责又是给罢工者提供经济支持，以及各方面的帮助。

矛盾的是，民团工会的“调解”及其假装支持工人事业的企图遭到的失败，正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法西斯政权下实行的暴力。

对于龚德拉和他那伙人来说，当他们早就与内政部长卡米洛商量好“最佳方案”的时候，不管是跟工人对话还是通过工会调解都毫无意义。

在这样一个建立在暴力之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只有反抗才能逼他们让步。因此，他们自己创建的工会，虽然往往是忽悠工人的，但由于主子的过错，工会无力完成任务，并且由于滥用权力和政府提供的保障变得腐败了。

露出真面目

从我们宣布自己找辩护律师开始，工会支持我们事业的态度大为改变。不过我们早就不管它们了，从罢工的前一年开始，在看到工会既无耻又无能后，我们向法院提出的所有要求都绕过了民团工会的法援。

毫无疑问，给工人打官司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终审判决能够展示工会律师的“得力”，以及他们受到工人“信任”。

但是，尽管发生的事情出乎意料，他们还是无法正面对，还用自家的报纸喉舌（毕尔巴鄂的《铁报》、马德里的《人民报》等等）

在审判过程中使出了阴招。1967年1月17日（休庭的日子），《人民日报》在某一版面插入了以下声明，这份声明和民团工会倒是很相称。

“劳动版面。工会绝不会放弃协调的尝试。工会承认工人的私人律师。

工会律师起草了564人的诉讼要求。

西班牙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向我们寄送了以下声明，其内容如下：

“正如《人民日报》昨日在《N. de la R.》中，关于《埃切瓦里案判决书》（第12页）所声明与肯定的那样，工会法律服务处有义务表明，比斯开民团工会的工会律师与社会部顾问秘书，将始终尽最大努力为‘冲突’中的564名工人提供法律与技术上的支持。

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的律师研究、制订并起草了564份诉讼要求。后来，在将此事移交法院之前，工人逐渐不再向工会寻求支持，但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其中十二名工人已自行撰写诉讼要求。这十二份要求中，十份由于与事实相矛盾，因此在法院面前无效，其余两份能够经由工会律师进行辩护。

工会法律服务处再次感谢杰出的律师兼教授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昨天他在听证会上，以非常确切和特别的方式公开对工会组织表示了赞扬，并表示比斯开民团工会的法律顾问在此前的冲突中得到了埃切瓦里工人的信任，他们在必要时总是得到了工会的法律帮助。”

1月31日，当所有的报纸公布了对我们不利的判决时，他们又

发布了以下声明：

“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负责人已于昨日中午发表声明，宣称工会法律服务处根本没有介入过关于班达斯轧制公司 564 名工人解雇案的审判。

本机构起初负责工人的起诉，并起草了 564 份诉讼要求。当然，我们进行辩护的方向与鲁伊斯·希梅内斯先生和阿隆索先生不同，因为他们否认了由公司律师鲁伊斯·萨拉斯所证实的，作为诉讼要求基础的诸多事实。但是，员工未经解释就拒绝了工会法律服务处的律师服务，后者对刚做出的判决没有任何干预。”

对他们来说，我方律师的辩护词是否因证据不足而存疑，或者我们的行为是否和辩护词中的一致，都不重要。但这还不是他们最过分的地方。

正如上文所述，工会和我们的审判撇清了关系。后来管理层炮制了署名“班达斯工人”的一堆信件，这是企图分裂我们的无数招数之一。有趣的是，不仅我们收到了，其他公司的工人领导者、代表团和联络员也都收到了。为了抹黑我们的立场，在工会的帮助下，资方利用工会提供的个人档案，偷偷地将这些信寄给了许多现任或曾经担任过工会职务的工人。这种龌龊事，他们在整场罢工中干过三回。

协助镇压

另一个需要强调的地方：工会与警察的关系。我们将从以下事

实看出这一点。

审判结束一周后，在宣布判决前——整个半岛对此予以了极大的关注——比斯开的工人领导者正在动员全省工人声援我们的事业。巴萨乌里的某次集会结束后，每个公司的员工都让几名代表留下来讨论。讨论很激烈。“可以给法院寄一封几千人的联名信”——“我觉得最好派一个代表团去马德里”——“我们在其他时候就是这么干的，这次的事闹得比较大。我建议在工会和法院前面举行一次和平示威。”过了好一会，他们才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所有人第二天都去了工会，因为通过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组织游行，必须得到省长的允许，虽然大家都知道他会怎么答复。

会议于上午十点，在毕尔巴鄂当地的民团工会会场召开。省劳工代表给社会政治部的警察打了电话，不到十分钟，他们就闯进了大厅。在场的工人拒绝离开，并要求劳工代表到场。后者一口拒绝，在与会者的坚决态度下，警察也暂时撤出了房间。最后，为了破坏工人的行动，金属业社会委员会的若干成员被捕，并受到了审讯。尽管如此，在整个1月27日，仍有五千名工人走上了毕尔巴鄂的主干道。

警察的干预并非偶然。当地工会一直都处于“秘密”警察的控制下，吉普车和巡逻车经常停在它门口。对于弗朗哥政权来说，没有什么地方是神圣的：工会、大学、修道院、教堂，什么都能随意践踏。当然，只有银行和董事会才享有政府的信任。

也许，比起禁止我们使用当地工会更糟糕的，是他们再次禁止我们在巴萨里和奥查考加举行集会，是让我们在紧急状态下，在大规模流放、监禁和审讯中，以及罢工结束之前都保持沉默。有三股势力参与了逮捕：公司、警察（提供个人档案）和工会，后者还提供了它认为最危险的工人领导者的名字。

工会拒绝工人使用会场，而雇主却随时都能在这里开会。四月

中旬在毕尔巴鄂工会举行的活动中，有 65 名老板到场，包括龚德拉。讨论了比斯开工业目前面临的困境后，龚德拉报告了班达斯冲突的进展：——“罢工者没有表现出示弱的迹象，而是相反”，“到目前为止，警方的手段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好几次通知马德里方面，需要加强政府干预”。然后，苏维里亚（Zubiría）伯爵接着发言，提醒大家要小心工人阶级中间不断产生的造反态度。伯爵先生是无数董事会的成员和西班牙凡士通的总裁，这些“美德”让精明的他成为了一个毫无社会责任感的新资本主义组织的头目，这个组织叫做雇主社会行动（Acción Social Patronal）。他补充道：“为了遏制这种局面，我们必须敦促政府拿出强硬手段，消灭冲突蔓延到其他公司的威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话得到了一致认可，显然他还把这些要求传达给了马德里（一周后就宣布了紧急状态）。

虽然是一则轶事，但费尔南多·龚德拉与同为巴斯科尼亚董事的佩德罗·安普埃罗（Pedro Ampuero），他们与安普埃罗先生的私交、全国工会代表索利斯·鲁伊斯在工会中的谈话，也颇为重要。在罢工一事上，他们想得到索利斯的支持，索利斯自然也会答应。

但是这次会议和它的内容，通过工会传到了一些工人领导者耳朵里。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迅速开会，决定向索利斯拍发以下电报：

“我们在马德里听到消息，安普埃罗先生，龚德拉先生与您进行了谈话，并且您答应在班达斯的冲突中支持管理层，比斯开金属业工人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您立即作出说明。”

事情败露后，索利斯急忙下令让比斯开工会的省劳工代表找出是谁发的电报，再杀鸡儆猴。当然，那群工人领导者早有防备，工

会拿他们没辙。

总之，可以说在民族工团主义之下，当局总是通过政治指令，或者通过工会中的全部要害职位，试图控制并在必要时扼杀所有工人行动。

1939年7月23日，国民运动部给工会官僚下的秘密指示中，也明确地证明了这一点——它在今天也具有相当的意义——其内容如下：

“……我们不要忘记，工人阶级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工会应该让他们守纪律，叫他们乖乖听话并用新的信条教化他们，而我们决不能忽视他们的动向和潮流。因此，工会的管理干部必须要完全值得信赖，必须要忠诚。”

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民团工会内部的代表团、联络员以及社会委员会（当然它们是民选产生的）都产生了反对这种法西斯信条的压力。在我们的罢工中，这种压力对罢工的开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有时能迫使工会支持我们的事业。显然，工会的干预作用相当有限。我们能利用的，最多不过是工会为了掩饰其为政权服务的本质而顺便采取的行动。

要证明工会内部代表团、联络员等的不断抗争，他们对我们事业的捍卫与支持，看看省金属业社会委员会全体会议的记录就够了。当然在上述支持者中，必须排除民团工会耍弄阴谋安插的长枪党份子，比如莱图里奥、德尔·巴耶、萨拉苏亚、莫兰、阿雷那萨、贝尔多梅和其他一些人（这帮货色一直弃权或者投反对票。有时候，他们还试图让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打消工人的抵抗决心。他们的任务是破坏罢工，还有给工会政治干部通风报信）。我们从中引用几

段话：

“我们谴责工会法律服务处在报纸上有关班达斯轧制公司问题所作的声明。”

“本次会议的大多数宣布，支持由巴萨乌里地区社会委员会主席向比斯开省长先生递交的要求进行和平示威的文件。”

“巴萨乌里地区社会委员会主席表示，不仅是工会上级，各方面都不允许班达斯轧制公司的工人在当地工会举行会议。”

为了给我们的代表团和联络员争取十二月和一月培训的机会，工会内的各公司代表团和联络员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不断向工会施压，让它在经济上支持罢工者。当工会的政治干部回答说这不关他们的事，或没有资金时，他们就出示了一份文件，上面的内容是工会当时要求所有省劳工代表发动募捐，支持在直布罗陀罢工的全体西班牙工人。当时涉及的还不是劳资矛盾，而是政治罢工。

所有工会活动的要害在于，它在合法性之内是行得通的，在我们这里，它可以掩护我们的非法性，阻止当局的干预。

我们的许多工人领导者也利用了工会的便利，通过在民团工会的“官方职务”顺理成章地加入了罢工和我们的集会，否则我们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最终，这些方式也惨遭践踏了。工会不允许社会委员会举行会议。警察接到了命令，先是禁止社会委员会的成员参加我方集会，然后禁止我们所有人开会。宣布紧急状态之后，六名省委员会成员与几名地区委员会成员也上了流放名单，另有许多人遭到监禁。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为了把他们从民选的职位上赶走，他们中

有很多人受了处分。这是上头的命令，借口都是随便找的。下面是其中一件处分，它的内容跟其他处分几乎一模一样。

“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服务处

根据指导文件的规定，工会决定解除您的职务，处分当即生效。下面附上处分通知。

我们再告知您，根据全国金属业工会主席的指示，一并解除您的全国金属业工会社会委员会成员资格。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主义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1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签名：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盖章上写着比斯开工会组织法律顾问）

处分通知

根据1948年2月2日《有关撤销工会职务实施细则》第9条的规定，鉴于：

（1）在去年3月19日的第三工会省级代表选举中，您以选举人的资格参加，而在同年同月14日受工会传唤时，您未进行投票且无故缺席。

（2）在巴萨乌里金属业社会部委员会于三月的会议上，通过了一份题为《有关新工会法》的文件，其中含有针对工会组织、工会高级干部及成员的冒犯性言论。

（3）对于阁下的两项批示：今年3月17日至4月6日，在省长先生主持下，由工会代表于4月6日签署的文件；比斯开金属业工人代表于3月17日签署的文件。

以上帝、西班牙及民族工团革命的名义。

1967年7月26日于毕尔巴鄂

文件秘书

莱昂波尔多·巴雷达·费尔南德斯”

毫无疑问，被解职就说明这些工人完成了使命。在西班牙，受到迫害是可靠和办事有效率的证明。

劳工部

有一个更直接参与镇压罢工的部门，它就是劳工部。它是内政部底下的部门，从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²²担任副部长（部门的二把手）就说明了一切，他是法西斯麾下一只最凶险的猎犬，担任这一职务之前，他担任的全是警察职务，始终不离他的养父“唐·卡米洛”左右。

起初，他担任阿隆索·维佳手下的调查处长，后来在“卡米洛”被任命为国民警卫队最高长官时，他跟随养父担任了同样的处长职务。在桑坦德、比斯开和巴塞罗那担任文职的那几年里，他也表现出了残忍——回想一下1962年的罢工，那回的紧急状态和流放等等，还有萨里亚的嘉布遣事件²³——这与他在劳工部的新职务很相

²²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 (Antonio Ibañez Freyre, 1913年9月25日——2003年5月9日)，西班牙陆军中将，内战期间加入叛军。二战期间志愿参加蓝色军团，参加了苏德战争。1960—1961年任桑坦德总督。1961—1963年任比斯开总督。1963—1966年任巴塞罗那总督。1976—1978年任国民警卫队总司令。1979—1980年任内政部长。2003年去世。——中译者注

²³ “萨里亚的嘉布遣” (los Capuchinos de Sarriá) 是嘉布遣的一个教区。1966年，那里的修道院举办了一场学生大会，也称嘉布遣大会 (Capuchinada)。当时警察将修道院包围了三天。这场会议得到了广泛的支持，甚至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响应。——中译者注

称。是为该政权的逻辑，或许对于统治者来说，这人也是内政部长的最佳人选。从他上任开始，他就从社会政治部调人来填充劳工部的队伍，比如把毕尔巴鄂分局的刑讯专家拉·奥斯（La Hoz）调到了他的部门。

自从他多年前担任比斯开省长以来，就是龚德拉的私交，冲突一开始，他就给后者提供了帮助和合作。在十二月的头几天里，他通过毕尔巴鄂劳工部代表伊瓦拉·洛斯特，除掉了我们中的一些人，因为他们声称罢工是公共秩序问题。他从头至尾都建议管理层不要调解，必须毫不妥协地粉碎工人的抵抗。到了十一月下旬，公司谋划赶走我们的同志奥萨巴。正是他给就业局下的指示，拒绝给奥萨巴办新的证件，方便公司那边动手撵人。

计划是这样的。虽然奥萨巴自 15 岁就在西班牙定居，他还保留着古巴国籍，所以必须由公司每年重新办理外国人的专门证件。自从 1963 年 11 月他进入本公司后，他的证件就没更新过了，因为雇用外籍工人要额外交税，公司一直在办证这事上违法。当然，更新证件纯粹是例行公事，就算不去也没事。

但这次当局另有打算。一月初，管理层“毫无征兆地”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就业局得到了不配合的指示。随后管理层前往马德里，讨论何时把奥萨巴驱逐出境。跟安全部门负责人谈过话后，伊格纳西奥·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给巴斯科尼亚打了一通电话，让他们通知奥萨巴他被解雇了。卡尔巴乔（再次厚颜无耻地充当了他主子的工具）负责了这件事：——“我们很抱歉。公司让您更新工作证件，但我们得到了就业局拒绝办理的通知，因此您不能继续留在本公司了。”奥萨巴回答了一句大实话：“没关系，不管我在哪儿，我都跟你们接着斗。”

虽然和罢工没有直接关系，但必须提一件事：由于福利摩多（Frimotor）一家工厂的坍塌事故造成了 19 名工人死亡，伊瓦涅

斯·弗莱雷四月来到了比斯开。考虑到比斯开的局势，如此规模的事故可能引发严重的事端。因此，当局必须及时控制事态。

由伊瓦涅斯·弗莱雷负责这桩重要差事。报纸发表了他的讲话，大力报道了副部长先生对遇难者和伤者家属的承诺。

但是，死者无权举行集体葬礼，同事也不能参加葬礼。因为这可能引起可怕的变乱。就是这样。在这场灾难面前，伊瓦涅斯·弗莱雷破坏了规矩，让每个遇难者分别举行葬礼。只在几天后——没有任何工人能到场的情况下——当局才在教堂里组织了一场隆重的葬礼。即便如此，那个星期六的中午十二点，还有大批治安部队在附近巡逻（后来，主教在省长的压力下，禁止阿里斯教区举行弥撒）。

利用这次访问，弗莱雷调查了罢工的情况，回到马德里后报告说，需要采取新措施结束工人的抵抗。即便受到了如此多的镇压与暴行，我们的抵抗仍然没有屈服。

劳工部与“人才引进”

来自加利西亚和西班牙各地的工人讲述了他们的辛酸故事，我们已经看到，工会和劳工代表在这桩丑事中，都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这都是那些工人同志的功劳，下面这份文件证明了那帮人是怎么做的。

这是一张由省劳工代表全体授权的表格，交由申请用人的企业填写并将表格交至就业局，我们之前说过，该局的上级机关是马德里的劳工部。

我们摘录的这张表是一位莱昂工人给我们的，这名工人在三月从工会手上拿到了它。上面的内容是：

“就业局负责人先生
各省移民服务。工作申请（样表由雇主填写）

一：公司信息：

（1）名称：班达斯轧制（比斯开高炉与巴斯科尼亚有限公司）

（2）注册地址：毕尔巴鄂 C 大道 36 号

（3）工作地点：比斯开埃切瓦里

（4）工作内容：冷轧

（5）工作地点的员工人数：700

二：岗位要求

（1）需要的员工数量：30 至 40 名工人和职员

（2）年龄及性别：41 岁以下男性

（3）专业类别：短工和职员

（4）申请时间：四月内，除非另有安排

（5）公司招员工的地点：莱昂

（6）若要面试，向谁或在哪里进行：不需要，试用期
三个月

三：就业的收入-劳动条件

（1）劳动合同的期限：无期限

（2）正常的工作日之外是否会有加班：是

（3）正常的工作日与加班的总薪酬：工人每天 145.60
比塞塔，职员每天 168 比塞塔

（4）健康证明：否

（5）对于每个家庭，妻子补助 300 比塞塔，每名子女
补助 200 比塞塔，以下情况将提供额外补助：

①：向公司或各省 SOE 寄送挂号信

②：由公司亲自到个人住址或就业中心签订合同

(6) 如果您就取后在公司一直工作到 7 月 18 日，您将一次性获得 5000 比塞塔

四：食宿条件

(1) 公司是否提供住宿：否

(2) 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工作地点是否会提供住宿：
是

(3) 公司是否提供就餐，以什么标准提供：午餐，每顿大约 10 比塞塔

五：公司补充的条件

上述公司雇主方所填表格中的条件均为硬性规定。

本申请一式两份，将转交给公司工作地点的省劳工代表处与就业局。

如果截止期限(第一条第四项)还未招满预订人数(第二条第一项)，公司将通知就业局延长参考期限。

如果在工作地点进行的公司体检中(第三条第四项)，员工未通过体检，公司将把员工送回原籍地并退还各项费用。

工人从住地到工作地点的旅费，由就业局管理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承担。

劳工代表 (难以辨认的签名)

写着‘劳工部’字样的盖章

莱昂代表

公司

原件由费尔南多·伊瓦拉·奥拉兰先生签名”

这些组织不允许我们为维持罢工而设立工会基金，不借给我们

会场等等，却全力支持肮脏的勾当，用五千比塞塔的诱饵（如果干到7月18日）来骗人参加什么“工作促进会”！这就是他们可悲的工贼角色。更过分的是，他们拿所谓的“国家劳动保护基金”来当差旅费！还有一个恶劣的地方是体检。公司不想在当地让工人体检。它只想凑够人。人凑够了之后，它就把质量不佳的“货物”拿预付的邮费退回去。



内政部

跟以往一样，内政部对我们争取解放的尝试进行了致命打击。它不管我们是不是在搞政治。它关心的是，任何揭露体制弊病的活动都必须消灭。不要说这场吸引了全部反抗力量的罢工了，更何况它还推动着工人的团结与觉悟。

即使在审判结束后，当局也找不到什么直接干预的机会。当罢工的影响不断扩大时，我们采取了遵守法律程序的战术，这让他们不得不承认，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毫无疑问，当局从一开始就动用了警察机关来掌控我们的行动，监视我们的领导者。然后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小动作：支持龚德拉搞报复、向主教施加压力禁止集会、向安全总局报告等等。但实际上，要么是担心引起丑闻，要么是没意识到事情会发展到哪一步，直到二月，官方才开始直接和变本加厉地镇压。

二月的第一天，我们的代表团成员莫亚在巴萨乌里会场的门口被捕。他被带到了毕尔巴鄂警察总部，为了让他透露我们组织的信息，他在那里被殴打了五个小时，警方尤其想知道每天的传单从哪来的。

那几天里，他们还宣布将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驱逐出境。警察和龚德拉在报告上说，就是他在让罢工继续。2月3日，由于警察抓错了人，奥萨巴得以在被捕之前逃走。

得知他们要对我们的同志做的事情之后，所有人都非常激动，我们给省长写了以下这封信，并在信后附上了数百个签名：

“阁下：

以下签名者都是埃切瓦里班达斯冷轧公司的工人，我们来信是为了表示抗议，我们得知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而且似乎已经证实——为了掩盖真实动机，在虚伪的理由和借口下，我们的同事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被下令驱逐出国。

我们所有人都非常了解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加西亚。我们知道，出于对工人阶级的热爱，为了正义事业，他三年来无私地同我们一起工作和生活。

我们知道他根本不是粗俗的煽动家，政府根据掌握的情报，也应该知道这一点。正是因为他的冷静，公司内部冲突最终都没有演变成暴力和混乱——尽管遭受的不公正

待遇，使我们完全有理由这么做。

我们知道，公司施压让他的工作证件被没收，而那么多在西班牙工作的外国人从没遇到过这样的事，这显然是不公正的，因为他被剥夺了赖以生存的手段。

现在他要被驱逐出境，而他待在西班牙的十五年里，唯一的罪过就是靠自己的双手劳动，还和我们所有人一样，向一个麻木不仁的公司讨回受损害的利益——而这个公司却能随意丢掉几百万、丢掉那么多的票子，它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让国民经济陷入贫困，给许多依赖其生产的公司制造了麻烦。这就是垄断的特权。不仅如此，它还让五百多个家庭挨饿——我们的同事是被当做不受欢迎的人开除的。

为什么要向他下手，而不是让真正的罪魁祸首，让那些人——他们要对一切的冲突负责、对数百万的损失负责、对因工厂停工在两个半月以来给其他公司造成的麻烦负责、对我们的家庭经受艰难考验负责——让他们来承担责任？

作为他的同事，我们为他感到骄傲，我们和龚德拉先生一样享有公民权利，我们也知道龚德拉的意见被当局听进去了。我们工人难道没有让官方听取意见的权利吗？如果少一些龚德拉再多一些奥萨巴，就不会有班达斯轧制发生的那么多可耻的事了。

对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下手，就是对公司全体工人下手，我们认为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因此，我们致信作为本省最高长官的您，请您主持公正，保证何塞·安东尼奥·奥萨巴继续享有他至今以来的所有权利。

我们将此信抄送给了安全总局局长阁下。

我们希望您主持公道，上帝祝您长命百岁。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一日于毕尔巴鄂。”

当月 14 日，安全总局下了驱逐令，宣布奥萨巴为“不受欢迎的人”，然后下了“搜寻并逮捕”的命令。

当时，除了要扑灭罢工之外，龚德拉和当局还要利用它来证明罢工的“政治性质”。为了找到奥萨巴的住址，龚德拉还向马德里施压，想找到所需的证据。由于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在 2 月 25 日凌晨 3 点半，由一个叫塔马约的人带队，安全总局的几名探员迅速从马德里出发，前往毕尔巴鄂开展行动。在三个多小时的搜查中，七名警官在他的房间里只找出了与班达斯冲突无关的信件和出版物。和奥萨巴住在一起的安赫尔·加西亚·萨拉查被捕。在 26 日星期天，为了让他坦白奥萨巴的下落，问出后者在罢工中的作用，他遭到了塔马约一伙人 18 小时的拷问。他们还费时甚久，试图从他嘴里撬出有关印刷机等等的情报。他们空着（或许因为审讯而受伤的）手回到了马德里，因失败而蒙羞。（后来，在六月的《西班牙警察》杂志第 66 号上，《政府警察》版面上发布了内政部的以下指示，表彰镇压这场罢工及其周边声援活动的警方团队：

“公开表彰——毕尔巴鄂社会部地区探员长官……探员……、副探员……

〔译者：下略二十人名单〕

1967 年 5 月 9 日政府第 8931 号命令。

公开祝贺他们。在此，同样感谢毕尔巴鄂最高警察长官先生和所有比斯开警务人员，以及所有在该地区表现杰出者——1967 年 5 月 31 日政府第 8948 号命令”

龚德拉看到他的计划再次受挫后，又去借助了政府的力量，当然他可以说自己和它们毫不沾边，就好像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以前的所作所为，还有他和唐·卡米洛的私交一样。（要了解他们之间的紧密关系，请记住我们之前提到过的，龚德拉和其他几名资本家提名了卡米洛·阿隆索·维加担任金属业中心总经理。在1962年的罢工中，巴斯科尼亚的管理层通过唐·卡米洛在毕尔巴鄂的这位好友，得到了关厂令。）

三月，马德里也下令禁止集会，对我们的镇压又进了一步。

四月——当时工人的声援运动达到了高潮——在阿雷纳尔声援我们事业的游行中，许多女性在暴力镇压中受伤。在省长对公司的全面支持曝光后，他在当地广播电台宣读了一份声明，将它发在报纸上，抨击了工人的立场并威胁我们复工，因为支持被解雇同事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好处。它的内容如下：

“政府得知某些骚乱分子打算在今天下午举行示威，大家应当明白，这场示威是完全非法的，它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并且触犯了《公共秩序法》，有关方面会将其强行解散。

大家知道，除了那些已经决定解雇的人，班达斯冷轧公司为了让这些工人复工，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因此，这些由西班牙的永恒之敌煽动的阴谋什么也捞不到，它为时已晚，这些非法行为什么都得不到，只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惜他们将在示威游行中，因不听从官方的建议而受到治安部队的弹压。

我想再次诉诸工人阶级的理性，不要听从你们最坏的敌人煽动违背法律的指示。省长。”

然后，在4月21日召开的部长会议上，发表了紧急状态的声明，流放了五十人，进行了大规模监禁、审讯和搜查，我们的罢工就此结束了。

在办公室里，费尔南多·龚德拉和他在马德里的“员工”卡米洛·阿隆索·维佳进行了一场谈话：

“卡米洛！我们终于赢了！”

“费尔南多，恭喜！祝贺你的巨大成功！……”

“上帝啊，卡米洛，都是你的功劳，是我们欠你的！……”

也许这些对话——它们是完全真实的——能证明，我们所处的制度有多野蛮，以及本书说明的资本主义与弗朗哥政权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确切。

我们的罢工是否是政治性的？它是由谁组织的？

是的。我们无法否认这一点，也不会为这一点感到羞愧，相反：我们就是用罢工在搞政治。

在其他章节中，我们讲过半岛三十年独裁统治的真实情况。表面上是弗朗哥和他的党羽在统治，实际上并非如此。真正的统治者是两百名金融和工业寡头，他们通过大银行的理事会控制了75%的产业。这些人才是政治生活的真正主人，是他们制定了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是他们让监狱里塞满了工人而非雇主，是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到马德里去，要求什么惩罚、什么紧急状态……

我们的罢工是政治性的，它代表着过去三十年来工人阶级想要实现的一切。我们还可以说：一名工人或农民提出的最小要求，就算他本人不知道，那也是一种政治行为。我们的罢工亦是如此。

只需要在我们的工人机构的世界里，在工会、法院和劳工代表等等中间生活过一刻钟，就能确认它的整个政治性质。西班牙的政

治就是大资本与大地产。一句话，就是剥削。

在二十五年里，不管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所有的罢工都将根据《刑法》第 222 条被视为危害国家的行为。后来法律才依照国外的标准进行了修改，现在它们分为了政治罢工和劳动罢工，但也只有纸面意义。当他们想要镇压和压迫时，这些统治着所有公共生活——政治、报纸、广播和电视——的人就用独角戏来为自己辩护，没有人能提出反对意见。班达斯就是一个例子。

最无耻的是，这些人为了主宰政治生活，挑起一场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内战，进行了三十年的统治，现在还想不让我们碰政治：“这是政治的”。我们要问，如果政治真的有那么糟，现在的统治者怎么能这么傲慢？为什么还要崇拜政治生活的头领、崇拜你们的元首？……我们已经看透你们了：所有的战争都是坏的……除了你们的。所有的政治都是玩弄阴谋……除了你们的。谁也没有权利讲话、批评和指责……除了你们。

我们看穿了这出把戏。你们假装政府和资本家不是一回事。这出把戏很巧妙，就好像你们和政治没什么关系。但事情很清楚，政治和国家就是为你们的利益服务的。没有什么比现在更接近你们的梦想了。政权是提线木偶，你们就藏在幕后笨拙地操控它。在哪里都是这样。你们在公司中的木偶是卡尔巴乔、马图拉纳、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等人。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是索利斯、阿隆索·维加、伊瓦涅斯·弗莱雷、罗密欧·戈利亚²⁴之流。你们有足够的钱收买他们、腐化他们。对于卡尔巴乔等人，一份不错的薪水就够了。对于索利斯、卡米洛等人，就让他们坐上理事会的交椅：“荣誉要给

²⁴ 赫苏斯·罗密欧·戈利亚（Jesús Romeo Gorría，1916年9月12日——2001年4月2日），西班牙商人。1936年内战爆发后加入叛军。1938年参与起草《劳动法》。1942年起在国务委员会工作。1957—1962年任劳工部副部长。1962—1969年任劳工部长。1970—1976年任伊比利亚航空公司董事会主席。1976年退休。2001年死于马德里。——中译者注

配得上它的人。”

为了再次用事实证明我们的话，下面列出了政府成员的名单及其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总理

卡雷洛·布兰科

- 副总理兼副秘书长
- 海军上将
- 与博雷洛·奥塔尔家族、大地主和塞维利亚银行家有关系
- 与主业会²⁵勾结（一个宗教政治组织，它在垄断资本主义中起到重要作用）

阿尔曼多·德·拉斯·阿拉斯·布马里尼奥：

- 总统法律顾问办公室主席
- 阿斯图里亚斯工商银行董事
- 巴斯克-阿斯图里亚斯航运有限公司董事
- 西班牙里奥廷托矿业有限公司董事

发展计划委员会

劳雷亚诺·洛佩斯·罗多：

- 部长
- 加利西亚不动产有限公司总经理
- 大西洋银行主席卡斯米洛·莫林斯·李沃特的内兄
- 主业会成员

比森特·摩尔德斯：

²⁵ 主业会（Opus Dei）是一个天主教教团，1928年10月2日在马德里成立。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一些主业会会员在弗朗哥政府中担任要职，对经济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中译者注

- 发展计划委员
- 奥穆尼亚保险有限公司主席
- 伊比利亚公共设施与建筑协会首席执行官
- 巴塞罗那纺织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卢卡斯·贝尔特兰·弗洛雷斯：

- 发展计划委员会秘书长
- 乌尔吉诃银行研究处主管

多明戈·迪亚斯·安布罗纳：

- 灌溉转型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先前由他的兄弟阿道夫担任，后者现任农业部长）

米盖尔·萨里斯·波尔索拉：

- 钢铁工业基础委员会主席
- 前任金属工业总经理（在他的授权下，与阿斯图里亚斯钢铁业联合会签署协议）
- 阿斯图里亚斯钢铁业联合会主席（协议一经签署，他就立即从总经理的位置上离职，担任了这一职位）
- 主业会的成员

劳工部

赫苏斯·罗梅罗·戈里亚：

- 部长
- 阿拉斯出版有限公司（由主业会控制）首席执行官
- 塞弗尔特与比恩索瓦斯有限公司主席

安东尼奥·伊瓦涅斯·弗莱雷：

- 部门副秘书长

- 步兵中校
-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的养子

工业部

格雷高里奥·洛佩斯·布拉沃：

-部长

- 伊比利亚石油精炼有限公司董事
 - 比尔瓦伊纳渔业有限公司董事
 - 杂志、报纸及出版有限公司（主业会）董事
 - 前塞斯陶工厂（西班牙海军建造）经理
- 并与我国的金融寡头关系密切

安赫尔·德·拉斯·库尔瓦斯·冈萨雷斯：

- 部门副秘书长
- 比尔瓦伊纳渔业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商业部

福斯蒂诺·加西亚-蒙科：

-部长

- 毕尔巴鄂银行前总经理，兼该银行及其子公司（毕尔巴鄂工业银行、
商业银行及拉科鲁尼亚银行）董事会成员
- 加纳利海运有限公司董事
- 伊比利亚钱币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成员

阿方索·奥索里奥·加西亚：

- 埃索投资有限公司董事
- 埃索石油（西班牙）有限公司董事

- 造纸中心有限公司董事
- 与西班牙信贷银行关系密切

内政部

- 卡米洛·阿隆索·维加
- 部长
- 陆军中将
- 西班牙人民银行（主业会）董事
- 金属业中心有限公司主席

国民教育部

- 马努埃尔·洛拉·塔马约:
- 部长
- 特种金属及研究特许有限公司董事
- 主业会的成员及其逐步控制教育的工具。曾用警察手段镇压大学。

司法部

- 安东尼奥·玛利亚·奥廖尔·乌尔吉诃:
- 部长
- 伊比利亚水力发电有限公司董事
- 约迪奥彩绘玻璃有限公司副主席
- 西班牙影业业有限公司主席
- 塔尔戈特许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等等
- 阿尔弗雷多·洛佩斯·马丁内斯:
- 部门副秘书长
- 加斯布塔诺有限公司秘书
- “希尔德萨”主席

- 几家由主业会控制的电影与出版公司董事会成员
等等、等等……²⁶

这样的关系我们可以继续举例，但这些资料已经足以证明我们的观点。

是谁组织了我们的罢工？

我们的罢工是由工人发起的一场工人自己的罢工。在我们看来，为了人民的解放，建立地下工会组织来进行正直的斗争是完全正当的。但事实上，没有任何团体组织或领导了这场罢工。由我们的领导者走在前面，我们共同进行了罢工。我们觉得这不一定是最好的做法，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要让所有人、全部的人都组织起来。

我们一再声明，我们开始这场罢工是由于公司内部原因：奖金问题、不公平的惩罚等等。在罢工的几个月里，尽管我们多次要跟这一制度的政治面目，也就是政权打交道，但还是把斗争保持在了脚下的这块土地上。为了争取我们的要求，为了战斗下去，不能给当局干预的口实。在仅限于公司内的斗争中，没有武器、没有国民警卫队、没有“灰帽”和秘密警察，我们完全赢得了胜利。没有武力干涉的话，公司就只能很快投降。他们很清楚这一点。最后，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停止了这场把戏：流放、驱逐、紧急状态、禁止集会、镇压声援游行、监禁、审讯……是的，他们证明了资本主义才是我们的真正敌人。这个政权不过是一根鞭子，是干“脏活”的

²⁶ 资料摘自《西班牙的未来：政治与经济民主》（Un futuro para España : la Democracia Económica y Política）、《西班牙视野》1966年版（Horizonte Español. 1966）及《西班牙的垄断》（Los Monopolios en España）——原注

工具，用来让他们自己的手看上去是干净的。（罢工结束后不久，资本家们在内古里（Neguri）举办了一场宴会，当安普埃罗见到龚德拉的时候，上去给他了一个拥抱，还叫道，“瞧啊，我们比斯开的英雄！”难道能把一个让国家的镇压机器给他效劳的人叫做英雄吗？我们要问：他算什么英雄？是把六十位工人领导者流放，把一百五十人逮捕，把一人驱逐出境，对我们进行了无数殴打与威胁，在五月一日叫来三千警察，还对我们诽谤中伤的英雄吗！是的，卡西尔达·安普埃罗，这就是费尔南多·龚德拉的赫赫战功……不要忘了，还有我们比斯开的英雄在巴斯科尼亚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分红与董事席位。）

我们的平均年龄不超过三十岁，大多数人来自农村地区。我们的领导者大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为人朴实，毫无保留地投入斗争，只相信正义与真理，做好了开除和投进监狱的准备。在他们中间，加入工人组织的人并不多。我们相信这是应该走的道路。要像我们这样取得成果的话，各个工厂不应该孤立地斗争，而是要有组织地行动，要与整个工人阶级和所有的小组团结在一起。尤其是在埃切瓦里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它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拥有各种思想、来自各个小组和派别、来自各地的人们，他们都在我们的集会上得到鼓舞、帮助与支持。没有人在这场罢工中玩弄党派的阴谋。也许是因为，只需一眼就能看出，我们的行动是团结一致的。也许是因为，要将属于所有人的事业变成某人的功劳是要冒险的。总有一天，当自由再次闪耀时，我们就能知道都有谁参与了事业。在这之后，那些正直勇敢地加入斗争的小组也会得到更多的荣誉。但这是以后的事情了。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要在各方面、在工会和政治生活上继续斗争。

我们要搞政治

了解到是资本主义在操纵现在的政治后，我们的政治任务就是揭穿政权炮制的假象：人民在真正参与公共生活，能够对当局的行为和立法产生影响。我们必须每天加强与政府对抗的意识，认识到后者听从的是剥削者的命令，意识到与它斗争就是在攻击资本主义最有效的镇压工具。法国工人这样做了，他们组织了一场全国性的政治罢工，为反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一边增加缴费，一边减少疾病与事故的补贴——采取了大量行动。同样的事也鲜明地发生在了南美，在那里，工人、农民与学生的游击队英勇地为了推翻本国完全将自己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伪政府，为了农民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而战斗着。

可悲的是，经过三十年对我们思想的不断歪曲，许多工人对这个问题并不了解。比方说，我们的一位同事曾说：——“什么政权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的是，我们的权利要得到承认。”另一个人回答他：——“但你没意识到，这些权利要得到承认，直接取决于制订法律的人吗？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有一个代表工人利益而不是资本家利益的政府。”

从上面可以看出，必须消灭“工作问题”和“政治问题”之间的区别，就好像只有前者和工人有关一样。在一些荒唐的政治问题上，比如为了通过《组织法》而举行的全民公决闹剧，或是家族代表的选举之类，工人都得被迫投票。这种可悲的做法让大家疏远了政治。工人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对侵犯他们阶级利益的公司、市政、省直至国家的中央机关进行最大的抗争，直到工人夺取政治与经济权力为止。

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搞政治，直到鲜血和自私给这个词留下

的污名被清洗干净，它将恢复自己真正的含义：人民当家做主。正如我们所说，我们想让受压迫者，想让工人，不仅仅是关心工资、生活保障或者多放几天假期。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他们不要去管经济、法律、新闻和国际政治，乃至权力机关，让剥削无休止地继续下去罢了。



第三部分 思考

给工人积极分子的思考

我们写这本书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给这场工人斗争留下记录，而是希望以它的正确和错误，为所有在半岛上与资本主义战斗的人提供经验，对他们的实践有所帮助。

我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经验有局限性——由于我们行动的内容、我们厂的特点以及各厂的情况差异，其他人适用的策略理应有所不同，等等——但我们完全真诚地相信，有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在斗争中始终会涉及到人际关系问题。其他的经验，就要看怎么运用它了。

在罢工的发展中，斗争达到了顶点，在此之前我们还经历了大约三年的磨练。如果不提这三年的行动和组织，就无法解释我们在罢工期间的做法。

我们相信，从根本上讲，以下因素使我们能够产生集体意识，并起来抗争。

简单来讲，就是两方面：技术和人。

技术方面：

一. 工厂委员会或小组

（1）组织结构及其基本方面

多年来，与其他许多工厂一样，班达斯缺少有组织的工人行动，这会使我们的斗争经不起考验。避免这样的危险一直是少数人的责任。更清楚需要以有组织的方式斗争的那些人，要么能力很强，要么属于某个地下小组，要么是有别的原因。

1964年5月的班达斯罢工，标志着我们在公司里有了自己的队伍。当时我们在工厂旁边的空地上开会，让每个部门都选出了两名代表。

有时候，选举并不容易，需要用一段时间的行动来了解和检验未来领导者的素质，找出野心家、“大嘴巴”和必须格外小心的各种投机分子。

在最初阶段，假设公司的内部形势或镇压对我们造成了困难，我们会不经选举就召集某些工人。但是，临时组建的小组必须听从民主表决的意见。

选举的时机很重要。如果可能的话，必须等到引起普遍关注的事件发生。例如：讨论集体协议、奖金浮动，或者发生了影响全部或大部分员工的问题或不公正待遇。它确保了选举是民主的，且真正由工人领导行动，让他们感到自己不是被操控而是被代表着。

我们就像在搞真正的地下活动，因为公司、警察和政府都是一伙的，我们的行动有暴露和被盯上的风险。显然，选代表也有风险。

方便的一点是，公司委员会或小组的选举都在厂里集会时进行，每个人投票前，都会考虑为何投这一票。这些做法都会让管理层得知我们的动态，这可能遭到报复，但也会让管理层更谨慎、更尊重我们。我们还要意识到一个永不落空的法则：我们的立场越软弱，受到的压迫越厉害。

如果很难在工厂集会，可以在上班时间搞选举。但是，始终要

保持最严肃的态度，并采取不记名投票。

小组的人数与配置要灵活。至于后者，要考虑人数和个人能力，比方说，一个部门里可能要五名一线积极分子，目的是让所有工人都投票给他们五个人。应当明确，小组或委员会不应偏向这个或那个部门，而要兼顾所有人的想法。因此，部门小组的人数是次要的，但最好还是定一个最低数，确保掌握各方面的情况，以便完成筹钱、发传单等其它任务。

还有一个办法（尤其是在大公司里），就是由每个部门小组的负责人，在公司里组成一个团队，这样一来，解决问题的灵活性更高，更不易被发现。

上述小组定期（比如每两到三个月）或者有重要事态时开会，收集大家意见后，做出重要决定、安排新计划或重新调整行动等等。

要明确的是，我们所说的小组或委员会，与地下组织的积极分子小组有所不同，后者按照自己的标准行动、制订具体策略。他们的独立性，完全是自己内部问题，但他们必须接受工厂委员会的决议。

这些地下组织的成员一般都在同事中享有威望，也会被选为小组或委员会的成员。至少在公司的层面上，已经实现了团结——工人运动的基石以及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在我们的工厂中，应当承认大家虽然思想不同、分属不同的地下小组，却还是非常团结，从没有发生过领导者相互敌对的丑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将工厂委员会或小组当作一个现有工人力量的统一机构，它由工人民主选举、受到工人信任并捍卫他们的阶级利益。它不仅要在公司里领导斗争，通常还要在（比如全省范围内）更高的层面上组织行动。

关于公司代表团，必须指出以下几点。由于他们属于（被全体工人拒绝的）官方工会，所以一直存在争议：在工会选举中弃权，

还是把自己人选进代表团。主张前者的人认为，选上了也没用；主张后者的人认为，这个职务在策略上是必要的。

班达斯采取了后一种意见。在我们看来，对于目前在公司中搞斗争的策略，公司代表团是非常重要的部分，而且代表团的成员也要由工厂委员会的人，或至少可信任的人组成（并非代表团的所有成员都可信，因为某些人将自己卖给了资本主义，比如工程师和专家）。

公司代表团的重要性在于，公司倾向于用它来管人，它真的为公司效劳时，会给工人找一大堆麻烦。合法与非法行动并举之时，代表团能让我们的某些行动有正当理由。现行的法律下，即使代表团办不成很多事，在这个不断用暴力维持“和谐”的体制下，至少也能保持斗争的紧张氛围——而这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可以将代表团定义为工厂委员会的合法面孔，为了捍卫工人的利益，需要协调地下战术与合法行动。

就我们厂而言，大多数代表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他们在代表团和联络员岗位上英勇地捍卫了工人的事业，因此在罢工中遭到解雇。

尽可能回应工人一切需求的工厂委员会，在对资本主义及其压迫制度的斗争中，必须保持革命的行动路线，并尊重成员之间的理念与思想分歧。

保持革命路线是最根本的，因为我们的问题不能通过提高工资或减少工时来解决。的确，我们有这么做的权利，但重要的是，我们得意识到：只有资本主义被打倒，工业和土地的所有权交到劳动者手中，才能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实现解放。只要还没实现这一点，我们仍将在社会、文化和政治上处于最低贱的地位。以前是我们的父母，以后轮到我们的子孙。

小组或委员会的目的

许多人关注的问题是，所有道路都堵死的当下，小组或工厂委员会能做什么？

也许是出于经验，我们的回答是乐观的。我们认为，工厂委员会可以采取以下形式进行有效的抗争：

一. 建立防御手段：即使结果不乐观，我们也要为出于各类集体或个人要求而发生的工人斗争做好准备。如果问题很棘手，又找不到好的律师，事情就麻烦了。

二. 让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人加入工人阶级的统一行动，并由同志们将他们推选上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是由某个团体的领导，而是由群众选举在推动民主协调的共同行动。民主协调的行动能让各派别的人走到一起，但又不妨碍他们就行动的各方面各自讨论和指导。某些情况下，采取某小组主张的路线不会引起冲突或分歧，因为如果它是正当的，它反映的不过是多数人的意见。

三：通过日常活动教育领导者，同时也要进行学习、阅读，参与或组织培训班、讲座等等。

四：获得斗争的集体意识：当今的社会中，一切都是为了不让人们思考，让人接受资产阶级社会的压迫秩序。因此，最重要的是唤醒觉悟，让我们懂得为了变革而斗争。

如果工厂委员会的行动是有效深入的，履行了它的使命，它不仅唤醒少数领导者，还能通过集体的积极参与，激发大家的觉悟。我们重复了一千遍，我们的罢工不过是与同伴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坚强领导核心的努力成果**，它让我们融为一体，让斗争成为了共同的斗争。

五：将工厂中的行动提高到更高层面，比如说，通过属于其它

层面（比如省级）组织的公司员工，开展行动。

为此采取的行动

不难理解，仅仅选出小组或委员会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认真负责，还要持之以恒。

为此，必须好好利用一个重要的工具：集会。的确，举行集会很困难，但它们非常重要。

（1）必须定期举行。每次集会的间隔时间可以不同，但不应超过十五天。

（2）必须找到一个隐蔽性强的合适场所。无论具体情况如何，不建议使用个人住宅。

（3）在委员会成员中，指定某人负责通知集会日期、准备场所等等。安排好集会的行程，能够帮助它正常举行，并让与会者更认真地对待它。

（4）需要一位负责议程的人员。没有什么是比一场没人知道该做什么的会议，更让人沮丧了。他还可以指导会议，避免会场上有人“开小会”并确保每个人都参与到议程中。在议程中，将讨论和解决个人与集体的所有问题。各部门的代表应事先与相关人员做好沟通。

在会议上，向评审委员会提出的事项必须有足够时间准备，并提前十天交给评审委员会的书记。这些问题将被列入下次会议的议程。如果没有及时处理，公司代表团将着手处理这些问题。

（5）最好根据具体事情、对象等等，落实大家的分工。例如：向法院上诉；工人给公司代表团提出要求；管理资金；获取、传递及收集信息等等。很多事情没完成（或者做得不好），主要是因为没

人负责。

(6) 尽量避免少数人包揽过多事务。要考虑每个人的能力。每过一段时间要检验彼此的工作，用轮班制互相交替职责。

(7) 有时可以让其他工厂的积极分子，或能提供特别知识与经验的人参加集会。但要确保此举不会显得集会在支持某个地下组织。

讨论了集会之后，现在来说明委员会如何履行职责。

一. 建立防御手段，这或许是委员会在工人集体参与下采取的最重要行动。的确，目前的情况下，很难在法院和劳工代表等方面，让工人占上风。但是，尽管法律和规定都对公司有利，我们至少还能抗议不公平，抗议还可能获胜。无论如何，反抗总比忍气吞声要好。

以下是应当抗议的最常见不公平行为：

- 非法调整奖金和补贴

- 分配的工作高于认定的员工级别

- 加班

- 不给员工提供保险

- 公司的决议没有通过公司代表团

- 没有做好防护措施（口罩、眼镜、手套、通风与套鞋）

就要求从事危险工作

- 非法延长试用期（例如，每三个月续一次合同）

- 医疗条件差

- 拒绝给有毒有害的危险工作发放相应的补贴

- 非法削减员工班组的规模

- 使用童工

- 毫无理由就找经营状况不佳的借口（为了提出抗议，

最好通过年报来了解公司的真实状况。可能的话，应通过值得信任的人获取一手消息。这对于其他行动也可能很重要。)

-不公正的处罚

-未履行集体协议或内部规章等等的规定

(在抗议上述可能的公司行为时，出发点应该是，争取改善条件能够推动工人阶级的斗争。例如，在今天，反对在半岛上普遍实行的十二小时工作日就有着巨大的意义。资本主义强制两百万工人流动打工，还用让人精疲力竭的工时来压垮我们。除了让我们不能从事其他活动以外，许多人还对用超额劳动换来的、看上去更高的收入挺满意的。根据法律规定，每月加班不得超过 50 小时，每年不得超过 150 小时。)

我们都受过这些的损害。但我们感到自己得到了支持和保护，这种情感使我们与领导者连成了一体，帮助我们克服了曾多次让大家无所作为的恐惧。

至少有两种防御手段：法律咨询和罢工基金。

法律咨询：

官方工会不仅完全无用，他们提供的法律服务也不尊重、不认真对待我们，因此工人完全有必要独立组织起来。我们自己还有熟悉劳动法、与我们定期联系的律师，都为这个组织付出了努力。另一方面，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最好是在公司代表团担任职务的成员）应至少对相应的规章、公司或省一级（当公司没有协议的情况下）集体协议的内容、如何起草申请书，以及如何给管理层和劳工代表写信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不难理解，为了在合法条件下活动，上述内容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很难获取这些基本知识，搞培训就能帮上大忙。讲师可以是有经验的积极分子，或者是专业律师。

除了培训法律知识，许多情况下，这些培训也能解答工友们的提问、澄清疑问等等。

在公司代表团会议上，资方总是利用工人一方的无知，因此搞培训十分重要。当然，我们不会专门研究劳动法，这没必要，也不是工人积极分子感兴趣的内容，但至少要了解在我们看来对工人有用的法律。需要了解代表团的制度（例如有关投票、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等等方面）以及其他不用花费太大努力，某些时候作用很大，又直接影响工人的规定。对于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超出我们能力范围，应寻求律师帮助。

对于大型工厂，最好在月收入上达成协议，而较小的车间要视情况而定。重要的是，必须有这样一份协议。

律师可以以个人，也可以以集体的名义提起诉讼。他要把代表团会议上讨论的事纳入集体协议的准备条款。一旦发生集体冲突，律师的帮助是非常宝贵的。

当然，最好是找参与工人斗争的律师。几乎每座城市都能找到这样的法律人。有些城市里，甚至设有专门负责劳工问题的事务所，这对于交流经验和促成联系特别重要。要是没有这类律师，那就从头做起。一种办法是，让来自各公司的工人组织起来，弄一个办公室和足够的人手专门研究劳工问题。

对法院提起上诉时，应当寻求其他工人的帮助，让他们出席审判、推动声援，通过鲜明的方式表达对资本主义的反抗，以此来支持自己的同志。当然，轮班制的工厂更有利于这样干。

罢工基金：

毫无疑问，半岛的工人斗争面临的一项主要困难就是没有自己的基金。抱怨民团工会偷走了我们的会费，解决不了问题，只能靠自己设法补救。

尽管困难重重，委员会应艰苦努力，每月收一笔固定费用建立这个基金。

（不幸的是，就算罢工之外，工人平时连很少一点钱也拿不出。）我们将筹来的款项用在下列用途：

- 律师费；通常每月付一次，数目可以定期变动。

- 通讯和宣传开销，复印用纸、墨水、打字机及印刷机费用，手续费、旅费等等。

- 支付不公平的处罚。这是对抗经济报复、蓄意罚款等的有力武器，它由工人的评审委员会进行管理——这个评审委员会可能就是公司委员会，或者由委员会任命的几名工人——所有被扣工资、失去工作和工资等，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工人都会寻求帮助。评审委员会将做出最公正的裁判，决定是否支付部分或全部的罚金。

- 特别需要的费用。我们指的是非常特殊的情况，因为这笔资金不能与用于疾病或事故的基金相混淆。后者是合法的，虽然它并不总是能由工人管理。这里指的是秘密收集的钱，它直接用于工人的斗争。

- 对其他公司、罢工等的声援活动。同样，非常紧急的情况下才能动用它，因为给其它工厂筹的钱应与每月固定收取的款项分开。

这些或其他活动并不总是会动用基金，因为要按照重要程度来

花钱。同时，每月收取款项的方式也很重要。以下面为例：

(1) 要建立罢工基金，就得找个大家都感兴趣的时机，要让大家都知道，给不给基金捐钱完全是自愿的，还要让大家明白这样做的好处和用处。

(2) 每月收一次款，收款日期必须是固定的，哪怕有人自愿捐钱也一样。

(3) 指定专人收款，或者按照部门、办公室、车间和工作班次等进行收款。重要的是，每块地方都要有人负责，为此我们建议根据全体工人的名单，对整座工厂进行安排。

(4) 提供收据，上面写明支付数目和相应月份。一份给收款人，一份给付款人。只要不署名的话，这些收据是不会造成损害的。

(5) 指定专人管理基金，并定期查账。

可能有些人会有所抵触和怀疑，但捐款是自愿的，所以不会有人受到损失。用不了多久，当罢工基金发挥作用之后，一般可以适当增加收取的数目，但这同样也会引起抵触。

有一点必须注意，做这些事的时候一定要谨慎小心。由于罢工基金的用途，管理与收取基金的人会遭到针对性的迫害。

二．对于今天的工人阶级来说，如果有什么是不能不争的事实，那就是它的领导者是它的最重要财富。

在目前的形势下，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发挥个人能力。因此，那些已经行动起来的人有责任让他们的同事，特别是具有领导者资质的人也投身到积极分子的生活中。

如今，有许多小组，它们在许多方面上，都在设法增加为工人世界的解放而斗争的人数。作为公司内的一个小小组织，除了参与行动之外，工厂委员会还能起到更多的作用。

但或许，委员会能发挥的最重要作用，就是把各派别积极分子

的力量统一起来。前面已经说过，委员会必须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作为不同地下小组在公司中统一行动的工具。这是它的基本性质，因为在许多工厂或车间中，无需划分派别就能够行使它的职能。要强调的是，如果公司里有其它地下小组的话，它们应当在委员会中做到两件事：第一，将它们的力量在行动中统一起来，为所有人服务；第二，让它们的积极分子通过委员会开展活动²⁷，现在这些地下组织的最大问题就是，假如没有一个地方能让它们的成员有所作为，他们会因此而消沉。

在公司中活动的积极分子，必须尽可能地发掘出其他的领导者。没有什么比让若干人包办一切更糟了。

对于这项工作，我们的建议是：

-与同事尽可能多的接触，了解他们的能力。与我们认为愿意加入的人谈话。启发对问题的认识。

-通过身边现实来证明我们在这些秩序中受着剥削。引用数据，例如在半岛上，每一百个工人阶级的孩子只有一个能上大学。

-在委员会会议上抽出时间，汇报各部门人手的变动情况。

-给他们分配较小的职责，帮助他们获得经验。

-让他们加入各部门的小组。

积极分子的人数越多，工作就越有效深入。例如，当发生罢工时，只有久经考验的队伍才能发挥作用，把罢工坚持下去。班达斯的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

²⁷ 这些工厂委员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中译者注

三. 关于委员会搞培训的目的, 我们不可避免遇到一种困境, 即半岛上所有“反对派”都会遇到的一个问题。更不用说它在工人中间引起的特别困难了。问题就是, 在这个阶段我们是应该致力于行动, 还是相反, 应当致力于理论方面的研究。

问题的复杂性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我们在这里开诚布公地讲出我们多年抗争的经验。

在厂内工人组织的第一阶段, 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 我们认为行动是占主导的。由此, 领导者可以发展出新的积极分子, 并实现对积极分子以及工人集体的真正教育。教育不仅着眼于个人与集体意识, 同样还有理论与人文方面的具体内容。下面是部分有关内容。

- 通过分配(需要进行准备和了解的)具体任务来增强责任感

- 组织和开展会议与厂内集会等的的能力

- 通过需要准备的活动, 磨练一名领导者必不可少的演说能力

- 团队合作精神

- 通过公司的行径、公司代表团的争论与工人受到的迫害等等, 认识阶级斗争

每一天里, 我们都在悄无声息地工作着。在我们的工厂里就是这么干的。看起来它与其他工厂没什么两样。但是, 当罢工爆发时, 它就能惊人地展示出这些年的成就: 集体意识、团结、领导者们的准备等等。

当然,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反对学习教育。也许这个第一阶段就是用来打下基础, 以便在这之上, 用深深植根于基层、植根于行动的思想教育来教导大家。没有无思想的行动家, 也没有脱离日常斗

争，只想指挥人的理论家。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将这两个要素融合在一起并不容易。

所有这些的前提是，必须考虑到个人在能力上的差异。重要的是，两头都要抓：富有教义的行动与为行动服务的教育。反过来看，资本主义绝不想看到能教育群众的斗争实践。

也许工厂委员会在行动（这也意味着对工人的教育）中起了主要作用，但也不应当忘记学习的重要性。参与活动的同时，也要读书，参加研讨会和讲座。有时要与其他人，与其他工厂建立联系。应当提供笔记、小册子、书籍以及一切有助于激发觉悟的东西，以便人们有能力区分思想，并自由地接受革命的思想路线。但这要求最大的坦诚，不能根据派别倾向行事。

四．关于如何培养集体意识，鼓励所有人的积极参与，相信我们已经提到了不少。

我们建议设立消息点。委员会应当通过它，再通过各部门小组的成员，使每个人都掌握最新动态，听取建议与批评、澄清疑惑与担心。在这个岗位上，要求一整天里都保持最大的耐心，时刻要保持警觉。

为了便于通知，有两样特别重要的工具：传单（或宣传册）和工厂集会。

如果可能的话，定期分发探讨内部事务的传单，其他工厂的话题也可以考虑。要非常小心，因为传单会引起凶猛的镇压。如果感觉情况危急，就重新考虑如何使用它，要用在影响大家的要紧情况上。关于其它工厂话题的传单，最好由其他团体在厂外散发。

工厂集会是全体工人的会议，我们在会议上研究问题、讨论解决方案、表决决议草案、审查先前的行动、准备选举等等。它的价值不可估量。应当定期集会，例如每三个月举行一次。

会议负责人应当高度重视会议的筹备。集会组织方面的所有问题，委员会的特别会议都要考虑。应当以各种方式鼓励工人的参与和批评，也就是说，进行真正的集体领导。

出席率会根据时间和问题重要程度而有较大差异。必须确保开会时所有人都有空闲时间，即使最后出席率不超过 20%，也算成功。当然，有时参加的人 would 达到 40%、60%和 80%。

解决具体问题的同时，必须重视思想教育，但始终要采取便于理解的简明形式。这也是分发小册子、出售书籍的好时机。

如果可能的话，建议找一个合适的场所，但始终要保持警觉。

五. 为了保持革命性，必须将工厂的行动与更高层面的斗争联系起来。

大家都懂得，公司层面的孤立行动是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的。不能忽视每一个公司委员会或小组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国的有关斗争主要由城市工人进行——它们应当成为一支游击力量，要利用更高的机动性、多重的战线数量，以及能对工人产生直接影响的优势，在可能的条件与特定的时机下，在每个公司创造出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胜利的可能性取决于，在工会、政治与文化的阵线上进行协调一致的行动。

因此，每家公司的委员会和小组要共同努力，直到实现整个半岛乃至全世界的国际团结（我们的敌人懂得团结的意义，他们也在做同样的事，而今天的资本主义越来越集中在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大型国际垄断资本的麾下）。

在这里，指出统一或协调行动的具体方式并不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只要指出有助于它们的方法。

-各公司团体的积极分子之间建立联系。

-学习如何（至少在行动中）实现团结的具体经验（从各方面讲，班达斯的罢工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

-要始终争取游行示威、总罢工和公共基金等。

-了解有关冲突的消息，以便取得半岛或世界上的组织和团体的支持。

-推动讨论问题的会议。

-对罢工和解雇进行声援。

-当心各种“逢×必反”的立场，我们指的是那些死抱着老一套观念不放的团体和个人，在他们眼里，一切事物都是非黑即白的。

-如果有人怀着私心，危害团结的话，不管是谁，都要坦白地谴责他们。

-最后，要在各省、各民族乃至国家的层面上，建立协调工人力量的组织。

我们真诚地相信分裂问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需要直面它，至少在真正想要改变资本主义秩序的团体之间，应当将其克服。为的只有一件事：我们事业的胜利。



人际关系方面

我们在本章开始时说过，我们的一些经验在任何时候都有价值，因为它们涉及到了斗争中永远有的人际问题。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话题。它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在许多人看来，它好像是“多愁善感的”和“神秘的”。

半岛目前对所有形式的反对活动都予以镇压，我们被迫走入地下。而地下意味着怀疑、猜忌、分裂、不断分裂等等。这种气氛是完全有害的。团体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缺乏建设性的批评成为了家常便饭；流言满天飞；很少有人敢于冒着危险站出来。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对资本主义是最有利的。

结果是，许多战斗着的、经过斗争锻炼的人，都给束缚了手脚。

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我们受到限制，但我们认为自己积极地克服了这些困难，不让它们阻碍团结、理解与活动，不让它们造成严重后果。

为此，领导者需要改变这种气氛，播下和解的种子，通过对话、建设和努力来克服困难。

对于领导者（受到同伴认可，要为共同的斗争承担特殊责任的人）的形象，我们能举出若干方面。

具体如下：

-责任感：真正的工人领导者会投身斗争、行动和教育，他充分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使命：与阶级兄弟一起，为了人民与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具体到工厂和更高的层面上，意味着：

第一，领导者要会思考。他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思考发生的状况、应对的策略以及进一步行动的可能。此外，他必须让自己的想法在

工厂委员会内部接受批评（当然，也可以在其它小组或组织中讨论。但有关讨论通常是公司内部进行的）。

如果严格遵照了上述要求，那么这种思考、这种对公司具体情况的不分析，将提高行动的能力。在工厂里，有这样一群领导者：他们能够代表自己的同事，他们思考、定期开会和策划厂里的行动。这样一个工厂就成为了一个单元，它能够融入更大的斗争机体，执行重要的行动。

他们会思考和策划行动，这意味着需要决策并付诸实践。

第二，领导者在职责范围内，应主动行动。很多时候，由于缺乏思考或害怕做决定，他们才显得循规蹈矩，或者踟蹰不前。对于我们的斗争来说，没有什么比犹豫不决，永远等他人先干起来更糟糕了。可以说，如果领导者不投入行动，就算工厂已经组织起来，所有行动是白费的。

动机 意识形态

以上种种，都要求有一种精神、一个严肃的理由，让领导者为了斗争献身。

这意味着两样非常重要的东西：头脑与心。

虽然这是最基本的，但一位领导者要懂得斗争是为了什么，是在反对什么。他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弊病、认识到需要将它摧毁，需要建立以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新制度，并由人民掌握权力。

只反对公司，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好像只有你有权利拿到更高的工资²⁸。

²⁸ 关于这一问题，参见阿方索·C·科明（Alfonso C. Comín）的《南方的西

因此，为了明确思路，需要阅读、需要更多的思考。这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它是关于生活、社会及其组织的一系列观念。当然，这些思想必须始终保持革命的原则，建立在对生活现实与历史经验严肃的深入研究之上。毫无疑问，对很多工人来说，由于目前缺乏教育，他们很难分清一种思想是否革命。最重要的是，你要**真正想去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社会**，并通过对生活的现实进行严肃研究，采取**最有效的方式**作出改变。这就是我们所说“有头脑的”领袖。

但这还不够。领导者必须有“心”。在这个词中，蕴含着一系列的情感：他渴望成为表率，用付出与真诚带动其他人；他渴望与同事建立友谊，成为他们的一员，尊重他们的缺点与局限；他感到要起来反抗不公，并对所有不公的对待感到愤慨；他想要正直地为了团结而努力，充满激情地寻求一切有助于阶级兄弟解放的事物；他在思想上不能资产阶级化，还要消除受资本主义影响的其他人的自私与逃避。

这就是我们说的，拥有精神、爱与热情的领导者。真正的领导者会将他的知识和希望交给他人。为此，他通过行动、友谊和朴素加入到他人中间，促进集体的觉悟，让大家怀抱热情投入斗争。领导者是他人的鼓舞者。他抛弃了天真的幻想，明白会遇到种种困难，但仍坚定地**对胜利的那一天保持着希望**。

对话-统一的要素

我们已经指出，工人力量的分裂是不容忽视的痛苦事实。它在各个方面都产生了致命的影响。

班牙》(España del Sur)一书。——原注

在公司生活中，也许是因为我们整天都被迫呆在一起，所以这种团体之间的分歧与对立显得更频繁。

否认不同思想、看法和观点的存在是荒谬的。这些是人的本性。但重要的是，首先要在这些分歧之上建立起行动的统一，甚至在真正革命者的思想中求同存异。

这要求领导者们能够摒弃宗派主义和“逢×必反”的立场，但不能接受资本主义，也不能接受背后的派别活动。

没有别的路可走，只能在斗争中对话与合作。

工厂委员会也是这些团体共同开会的地方。在所有的会议上，无论决定怎样行动，都要以最大的真诚来正直地执行。如果发现有些团体的行为可疑，“撕下外衣”或者打破团结都是毫无建设性的。积极的做法是把话讲明白，要求他们回应批评。然后……继续前进。

毫无疑问，在这项协作中，必须抛开“我是老大，你们都得听我的”的心态。在协调不同组织、不同思想的人们之间的行动时，要听取不同意见才能做决策，因此，谁也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大家，只能以民主方式让大家接受。

也许，领导者最需要的品质就是包容、理解，做事有建设性，用友谊铸成团结，拒绝无原则的明争暗斗，把力气用来打击真正的敌人——资本主义。

在如此有害的窝里斗气氛中，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实现工人行动的统一，也就是说，为我们的事业创造胜利的条件。

然后，我们还要批评最消极的人和团体；制造分歧的人；冥顽不灵的人；满脑子“女巫”和“怪物”的人；只支持自己团体提出或开展的行动的人；哪里都要掺和一脚的人；不友好的人；相信全部真理在握的人；活在过去而不审视自己的思想和其他事物变化的人；不问动机与目的，一味批评和指责的人；还有完全丧失了革命性，泡在空谈里的人。

的确，我们在罢工中遇到过这样的人。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地下小组——至少是通过它们的基层干部——都配合了我们的抗争。不过，关键时刻，有些地下小组的领导人却想尽量缩小罢工的规模，也许只因为他们没有成为罢工的带头人，或是没能让斗争打出他们的名号。在这里，我们班达斯工人要问：罢工在五个月的斗争之后还没有扩展开来，这难道正常吗？当斗争的客观条件变得更加不利时，那些提出总罢工的小组，为了这一目标竭尽全力了吗？难道还有比这场罢工更合适的时机吗？对此，我们还可以说，某些团体之所以批评罢工，只为了反对其它团体，只因为罢工打乱了他们的计划。

我们不想再纠结旧事。我们想说，基层工人干部提供的支持，并不总是出于工人组织的推动，相反，它完全暴露了某些组织的反革命性质。这至少是我们当中很多人的感受。最重要的是，每个组织都要回顾自己与其它组织的所作所为，先放下毫无意义的争执。

如果现状不变，那么实现工人解放的巨大动力，不会来自各个反对派组织的“最高会议”，而是来自基层工人的行动，它们会让这个国家的劳动者站起来。我们希望，如果班达斯没能办到这一点，也至少接近了这个目标，并使之成为了可能。

我们真诚地相信，一些消极的问题是由某些工人组织造成的，它们在这些年的艰苦斗争条件下，迷失了真正的目标。饱受迫害的地下活动，无疑会让每个人都疑神疑鬼，使他们惯于说谎、不相信任何人，见到谁都怀疑是敌人，简单来说，就是变得不近人情、极端冷酷、斤斤计较、宗派意识严重，甚至走向反革命。

但是，如果认识到了所有这些——分裂、流言、宗派主义与教条主义——将导致的后果，就必须尝试去克服局限。

为了克服分歧与猜忌，我们付出了不断的努力，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厂里团结成功的主要原因。即使在罢工的紧张过程中，我们的

领导者也定期举行会议，以便检验行动、对立场和态度提出批评，真诚且毫不含糊地提出问题。有时会产生个人矛盾；但是，最后大家倾吐了抱怨、困难、情谊与团结，每个人都产生了信任与乐观的强烈情绪。这一切是因为它使我们确立了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是开放的、纯粹的，它没有个人的小算盘，而是促使我们为了实现目标，不断寻找最合适的办法。

在日常集会上，我们也始终在培养建设性的批判精神。人民能够克服千难万苦，在斗争必须面对的牺牲中变得越发高大，最终取得完全的革命觉悟，而这是不相信人民的某些人不具备的品质。总之，可以说，在班达斯斗争的年头里，经历了缺点、错误与局限，我们用健康的、建设性的行动巩固了团结，这种行动又建立在理解、对话、批评以及为大家服务的共同行动产生的友谊之上。那些可悲的人，他们在制订对于行动极其重要的理论公式时（比如加泰罗尼亚的工人积极分子罗维罗萨²⁹就说：“没有什么要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用”），却忘了在里面注入一种精神，一种工人在斗争与磨难中感受到的希望。

如果我们主张的革命是以人为本的，那么，我们要处理好斗争中的人际关系，首先是实现我们对工人团结的渴望，再是团结起那些同样遭受剥削的人们。

²⁹ 吉耶尔莫·罗维罗萨·阿尔贝特（Guillermo Roviroza Albet，1897年8月4日——1964年2月27日），出身于农民家庭。内战期间在巴塞罗那一家工厂担任工人委员会主席。共和国被颠覆后被捕并被判处12年徒刑，后获释。1946年发起成立天主教工人兄弟会并担任主席。此后居住于蒙特塞拉特修道院，并于1963年担任ZYX出版社主席。1964年逝世。——中译者注

给大学生的思考

由工人集体写作的书并不常见。更难得的是，我们认为要把目光放到学生的世界、放到大学中去。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感到迫切需要这么做。需要建立联系、进行对话，表达我们的思想。以前也有人这么做，也许收效不大。但我们想再试一次。

原因有几点。对于班达斯和整个工人阶级，最重要的原因是你们的立场，是你们在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的战斗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将以与你们不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这是一种直接的语言，它讲的是你们的行为、身边的现实和课堂外边的东西。

你们当然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你们的世界，就是所谓的世界观，能够把一切都合理化，弄出相对的概念，再让最简单的事实变得复杂。因为可悲的现实就是，你们处在一个充满利益与野心的世界里。

是的，你们可以反驳我们的观点，但你们不能否认这就是你们的现实，你们每一天的行为都在不断揭示这一点。

我们的话语是有力的，这种力量来自于我们在最痛苦、最野蛮环境中的生活经验，来自把知识卖给出价最高者的人的堕落和背叛。总之，这个问题并不复杂；它只是一个环境问题。

对于你们绝大多数人来说，“人道”只停留在了你们自己和你们的家庭中。这就是你们呼吸的、生活的环境。但其实，这种个人主义的狭隘自私观点，不过是反映了资本主义构建的资产阶级思想的本质。

早在憧憬人生时，你们已经受到了危险的灌输，而资产阶级生活的各方面也开始润物细无声。在青年时代，对于最优秀的那部分人，最好办的就是无形和不断地，就像你们呼吸的空气一样，用舒

适的地位和个人成功诱惑你们，而代价是你们的驯服与屈从。他们提供了一种空洞和毫无根据的思想，这些思想叫做“自由主义”、“西方文明”、“自由世界”以及其他一些含糊不清又不切实际的思想体系，而在这之上建起了对各民族、对弱者进行剥削的观念。在这种“西方文明”中，你们被安放在了西班牙的“既定秩序”下，就好像它是天经地义、无需争辩和不可避免的，从来没有人揭示过，这只是为了少数统治者的社会与经济利益强加的历史阶段。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这不是思想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引导你们的生活和志向的，并不是对这个世界的无私看法或思考。恰恰相反，是“找到自己的位置”和“社会上各安其位”的想法，然后是让你们少点不满、少些良心不安的谎言。

一般来讲，你们都是安分的。你们由于思想贫乏而堕落，被野心给腐化、被一点好处给麻木掉了，成为了这支资产阶级大军的一员，其特点就是主观的道德，对思想和问题真实见解的粗浅判断。而这是出于机会主义，你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不想意识到阶级的现实存在不会因为善意、秩序、人道或“消极的个别善行”——也就是同情、慈善和社会工作——而消亡。对个人而非制度的改变也是无用的，就好像不是制度对个人起到决定作用一样！那些主张众生平等的人道家，他们让某些人拥有一切，又让其他人一无所有；他们让一些人管理，而让另一些人为管理者服务。这些不平等并非孤立产生，而是通过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而建立的，只有被压迫阶级的胜利才能解决不平等。有的时候，我们在你们这些未来的专业人士中，看到你们想要“既不站在这边，也不站在那边”的中立态度。无需经过时间的检验，只要通过事实就能说明：你们到底属于哪一边，你们要捍卫的是哪个阶级。简单清楚的事实就是，中立是不可能的。你们的视而不见跟其他罪行一样严重，因为这意味着你们在支持强者的利益。我们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在街上看到有个

坏蛋在欺负一个女孩，我们能有三种态度：保护女孩，不插手，或者支持坏蛋（他用钱收买了我们）。实际上，尽管参与的方式不同，后两者是同样有责任且恶意的。只有第一种态度是真诚的，也是唯一帮助弱者的可行办法。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社会中的类似情况，比方说，我们和受害者有血缘关系：她是我们的姐妹；而我们没有制止凶手，事后才帮助女孩，跟她说暴力永远是不好的，但要忍受暴力。

专业人士其实也是劳动者，这些人也是拿工资过活的普通人，他们却觉得自己和工人世界没有交集。最关键的是，他们在情感上融入了雇主的世界，接受了后者的习惯和生活方式，以成为有产者的一员为目标。

渐渐地，当他们融入秩序后，锁链被拴得更紧，他们在出卖自己的路上走得更远，束缚也变得更重。总有一天，他们将完全融入这个圈子。

从那时起，他们不仅否认资本主义中不公正的存在，而且将准备好迫害和镇压任何工人反抗的尝试。

什么理由都行：“现行法律”、“境外势力”、“经济形势”乃至“保卫”上帝与祖国或者宗教战争。是的，这些玩意是为了掩盖这个问题——正如神学家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³⁰所说——“世界不是分成信者与不信者，而是分成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现在，让

³⁰ 何塞·玛丽亚·冈萨雷斯·鲁伊斯（José María González Ruiz，1916年5月5日——2005年1月28日），西班牙神学家。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早年就读于马拉加神学院。1931年西班牙第二共和国成立时，因骚乱流亡意大利，在梵蒂冈求学。回国后在马拉加大教堂工作，后因支持同性恋被解职。60年代起对马克思主义日渐同情。1968年因发表文章《基督教与革命》而被捕，后无罪释放，但其著作被销毁。1973年在马拉加以“赤色危险分子”为由被罚款10万比塞塔。1976年在马拉加参加大赦游行，支持“民主化”。1996年获安达卢西亚勋章。2005年逝世。——中译者注

我们来看看龚德拉、伊达尔戈·德·希斯内罗斯、卡佩拉斯特吉、菲利皮尼、洛佩斯·德·马图拉纳、卡尔巴乔等人。

不应忘记，这些人曾经也不过是学生，他们的财富只有自己的学位。可时间不会虚度。魔鬼在满脑子发财致富的人身上都留下了印记。的确，他们大都发了财，但是想回头的人，不得不加倍地努力才能脱去沉重的枷锁。但很多人已经失去了道德、失去了价值观，什么也没有了。这就是为什么要早点睁开眼睛。不然就太晚了。

举个例子。我们有人以前和部门里的专家谈过话；那个人看到了我们的处境，也看到了不公正。在一次需要他反对管理层的时候……他没有这么做。面对工人的指责，他的回答是：——“你们看到，我有老婆和孩子。”工人积极分子回答说：——“是的，朋友，但是除了老婆孩子以外，你还有羞耻心。”“工人难道没有家庭吗？我赚的比你多吗？看吧，监狱里塞满了工人和他们的家人，因为我们是团结的。还有，如果你觉得找不到其他工作，那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但你不要着急，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劳动者，在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不会介意拿起镐头和铲子。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站在你身后。”

回过头看，问题更清楚了。你们觉得自己和人民在一起吗？你们和这位专家有什么关系？你们如何看待资产阶级社会和阶级？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以后要为所有人服务？

你们以前有很多人都以可悲的想法为自己掩饰。尤其是，他们觉得与自己深深鄙视的工人世界毫无关系。他们代表的是尊贵、等级和成功，是在资本主义中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普通人只配得到失败和屈辱。因为善于扯谎，他们完全不在乎听到了什么。每一天里，他们在工厂和公众组织的无耻行径中，在他们全心全意为资本主义效劳的过程中，不过是表现出了他们对我们的鄙视。

最大的证据就是：他们牢牢抱着自己的统治阶级地位，让其他

所有人他们服务；蔑视体力劳动，就好像他们的财富并不是直接来自我们的劳动和汗水一样。为证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列举出在劳动事故中死亡、致残和受伤的人数。资本主义冒着表面的风险，摘走了我们的劳动成果。是我们在面对危险，我们在每天的劳作中燃尽生命，最后只换来填不饱肚子的养老金。我们看到有些人辩护说，当前的文化与道德——它由资产阶级支配，并为资产阶级服务——由于其“客观”与“公正”的特点，对每个人都同样有效。

更糟的是，近年来，在我们工厂中出现了新一代的专业人员：技术官僚（tecnócrata）。隐藏在“最新经济技术”和“工作合理化”背后的，是他们对工人更新式、更精致的不公对待。

我们该如何定义技术官僚？在职业、目标以及与人民的关系方面，上述的一切自然没有错。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新的特点：佯装出所谓“企业家形象”的虚荣和自负；同他的科学与高效相称的权力与荣誉。对技术的崇拜成为了一切，机器和人都变成了同样的生产要素。人的尊严和权利，都成为了毫无意义的东西，它们是绝不能被那些优越和专制的，因而是麻木不仁的人所理解的。实际上，一切都没有变好，而是变得更糟了。但目的是始终如一的：它们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为的是资本的利益。他们对我们的工作进行更高效的剥削，而没有从我们的工作中，看到有任何决定性的力量。他们觉得我们只能付出汗水。为了向他们证明，事实并非如此，只有向他们展示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将集体承担起责任，公司将以民主的形式由所有人共同经营，风险和产品将会平等地分配，竞争的动机将会变得更人性，而它也将改变这个合法盗窃的野蛮制度。

他的回答会是冰冷的，或许他会用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一本手册来回答。我们的话对他而言，就好像是毫无意义的多愁善感，更重要的是，他仅用来思考数字的“科学”头脑是无法理解这些的。

我们的痛苦、我们的抗议，都会遭到如此普通、如此肤浅又如此自私的答复：你们这些穷人对……富人生活得好有什么可抱怨的？

显然，从工人的角度来看，你们给的环境是没有出路的。但有许多其他的事物——也许更为深刻——对于我们事业的成功发挥了重大影响。

我们认为这些足够了。想理解的人自然能理解。人们是有可能摆脱这条路的。是的，我们公正地说，任何时代都有一小部分专业人士反对了主流，他们始终忠于人民，投身到了解放人民的斗争中。

现在，在这个新时代里，半岛人民结束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时刻已经来临，在新的希望下，已经开辟出了新的道路。

在今天的大学中——至少是少部分最觉悟最有能力的人——学生们走近了现实，深刻了解了他们的使命，领会了他们在过去、现在与未来的重大责任。

在这次罢工中，我们不会忘记你们的参与。一些工程师给《周一小报》写的信、由毕尔巴鄂自由公会通过并在我们的会议上宣读的声明、筹来的钱……你们也出席了审判、加入了声援的游行队伍，这些无疑代表着一种新的精神，一种打破旧束缚、改变立场的坚定意志。

当然，不应高估这场运动对人民的影响。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的骚动不过是为了学术独立、结社自由等表面要求，而没有真正提出对社会和政治结构进行深刻变革的需要。

这种肤浅的态度证明了某些思想家的看法，他们认为反对专制的——不属于无产阶级的——其他社会团体是无法彻底反对专制的。这样的看法是对的。这些团体只反对它们切身相关的东西，而不希望社会和政治制度彻底民主化。到了那时候，这些社会团体（比如知识分子和其他资产阶级团体）将会害怕真正的民主冲击其经济

特权的后果，它们宁愿与最反动的势力（也就是否认民族自由、思想与文学创作自由的那些人）结盟，也不会支持工人斗争。

在这里，我们不会深入它的内因。我们无意分析大学生活的整个现实。我们只是真诚地呼吁你们加入我们，为了让你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劳动者，为了让你们一起来加入反抗压迫的共同使命，然后建立一个更公正的兄弟般的社会。

如你们所见，在我们的要求中包含着巨大的期望。你们的行动会使它落空，又或是赋予其完全的意义。唯有时间作证。你们想或不想，我们都会在斗争中相见。重要的是，你们不要再一次站在对立的阵营了。

我们特别指的是还没有把自己出卖给资本主义的人、经常去上课的人、头脑还没有被体制驯服的人、就算违背自身利益也能追寻和跟随人民的人。

我们不是让你们来领导，而是让你们也出一份力，如果你们的意愿是真诚的，那么和工人世界一样，人民会将责任托付给你们。但不要只会教书，很多时候你们什么都得学，至少要学习真正生活的学问，这是与你们的技术截然不同的东西。

这个道理在雷吉斯·德布雷³¹的书《革命中的革命》（*Revolución en la revolución*）中诠释得非常精辟。这位知识分子——如今他在玻利维亚因支持游击队而被判有罪，他在那里将自己的理论付诸了实践——引用了卡布拉尔（Cabral）的一句话，它定义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用：“原阶级身份的自杀，是为了将自己完全与人民最深

³¹ 茹勒·雷吉斯·德布雷（Jules Régis Debray，1940年9月2日——），法国作家、哲学家。早年曾加入法国共产主义学生联盟。1965年跟随格瓦拉前往玻利维亚开展游击战争。1967年被俘，在遭受残酷虐待以后被判处30年监禁。1973年在萨特、阿连德、聂鲁达等人的斡旋下获释回国。1979年赴尼加拉瓜，参加了推翻索摩查政权的起义。1981年、1988年两次支持密特朗参加总统选举。2009年支持成立新反资本主义党。2010年支持左翼阵线。——中译者注

刻的愿望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革命工人而重生。”

一旦作为革命工人而重生，知识分子就能执行各种任务，同时又不必舍弃作为知识分子的可能性与需求。

在他接受的使命中，他可能会去作分析、掌握信息和揭露。当他来到人民的队伍时，甚至还可以帮助工人阶级了解自己的处境与使命。他必须始终警惕留有的资产阶级习惯，它们会让他利用人民，或是产生优越感。为了避免这样或那样的危险，他应当始终处在群众中间，应当尽可能地远离自身不公正的经济与社会特权。如果没有真正拒绝自己的过去，那么他迟早会背叛的，因为环境中的机会主义、肤浅和道德相对主义，会以难以察觉的方式改变每一个人，除非在这一环境面前竖起坚固的高墙，而在人民中间很容易就能找到这面墙。

作为建议，我们想给出一些加入人民的方式。做法很多，我们无法在此一一列举，因此，我们不能在这里把它一气讲完。

首先，有一件事很明显：必须要意识到问题的存在，并怀着足够的诚意进行严肃的思考，考虑怎样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和整个未来。也就是说，把这看作是一生的最重要使命：为了人民和全人类的解放，与自己的阶级兄弟一起工作。

为此，我们给出以下的方式：

-直接与工人积极分子接触、与投身斗争的人接触。

-通过谈话；参加讲座、研讨会；阅读书籍和地下出版物；进行不同职业的体力劳动，尽可能了解社会政治的现实。

-逐步融入人民的抗争行动，最大程度地协调工人和学生的斗争，将它作为同一事业的不同战线。

-加入革命团体，将自己融入基层。

-基于这种态度规划未来。

这些方法是逐步递进的，当然，最关键的是要参与斗争。

由于给出的做法有限，我们简要概括一下它的基本思路。

为了加入到人民中间，摆在大学生面前的真正问题就是要放弃作为压迫者的社会阶级，成为被压迫阶级的一员。因此，这意味着必须逐步转变习惯、环境、友谊和思想等。

从许多方面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洗脑”，因为它意味着对生活——婚姻、家庭责任、工作中的立场等等——的不同理解。

关键是要采取行动，不能停留在理论上。当然，就算留有余地，这种行动意味着承担风险。例如，在公司的层面上，组成工厂委员会是相当方便的事，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至少与工人领导者保持个人联系、提供消息或做其它力所能及的事。

有些职业具有更大的流动性和独立性，例如办公室工作、各种咨询工作、社会学校等。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不想举出所有的选择。最后，这一切都意味着一种全新的思想、全新的精神，它与现在背离人民、实行残酷剥削的资产阶级所鼓吹的思想和精神截然不同。

其实，我们提出的要求是，来自工人家庭的那些人不要背叛你们的阶级利益。对于来自资产阶级家庭的人，我们要求你们背叛它。



后记

我们来到了书的结尾。通过本书，我们想兑现开头序言里说过的话，“毫无疑问，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书。是的，我们希望用激情记录下在 163 个难忘的日子里，我们全部的感受、希望和遭遇。我们试图忠于事实，忠于我们的事实。”……

现在，我们想对自己的全部思考与目标，做个简短总结。就是说，指出推动我们前行的是什么，再向全体劳动者发出呼吁，将它托付给未来。

相信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的斗争不仅是为了吃得更好。对于那些——我们无恶意这么说——说我们比以前生活得更好的人，我们回答他：“现在牛也吃上饲料了，但它们还是牛。”我们不仅是为了改善经济状况而斗争，而是在为了建立一个由人民真正管理工厂、政府，还有整个政治与社会生活的社会而斗争。否则，对我们的剥削会以千百种方式继续下去。今天，我们能以许多工人为例，他们以冰箱和汽车做交换，停止了与资本主义的抗争。表面上他们过得不错，但他们仍然受着少数资本家操纵，因为资本家掌控着经济生活，并通过报纸、国际关系和大学，掌控着政治生活。

此外，我们的运动是国际性的，忘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北美矿工每月能赚四千美元，但他们满足于这些钱，没有去攻击资本主义，他们的公司——他们其实已经成为了帮凶——残酷地剥削玻利维亚的矿工，以及比他们无力得多的、所有贫困国家的工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半岛上的所有民族都对越来越有力地控制着我们工厂的外来美帝国主义资本并不陌生，例如：比斯开高炉、通用电力、陶氏乌基内萨（Dow Unquinesa）、赛法尼特罗（Sefanitro）、比

斯开金属工业、伊图阿特（Ituarte）基金会、阿迪亚奇（Artiach）以及其他很多公司。

这些有力地证明了书里每一页都写明的的事实，它让我们深刻地认识了控制着整个西班牙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也是瞒不住的。总之，本书总结了这个社会的主要特征，这些特征在罢工中也鲜明地体现了出来：

-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这部分人通过控制经济生活支配着人民的命运。

-建立在客观且深刻的阶级对立——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上。

-在我们的半岛上，资本主义阶级体制与法西斯独裁政治形式的相互依存关系。

-消灭被剥削者的各种组织以及他们不断增加的反抗的策略。

-经济发展的倒退——城乡之间的极大不平等，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消费品：电视、冰箱等。还有寡头们制造出的“福利”和“法治社会”假象。在文化和政治上亦是如此。

在集权之下，主业会的技术官僚等人采用了新资本主义的“备用方案”，这不过是为了掩盖——当然并无用处——垄断资本的利益。在别无它法时，他们马上提出了一个美式“民主社会”来分散我们的革命要求。但我们注意到了陷阱，没有掉进去。斗争必须继续，不管是和平还是暴力的方式，直到工人夺取政治和经济的权力，这也是结束资本主义剥削的唯一方式。在我们想要建立的新社会中，只要没有人试图保留特权，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


不知道斗争将继续多久，但我们绝不停手。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立场，与其他人团结一致，就有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在这场罢工之前，班达斯人并不了解自己能做到什么，但有了团结和斗争精神，我们能办的事有好多，包括唤醒自己以及成千上万工人中被忽视的力量。甚至还不完全属于工人世界的许多人也感到了自己的责任，通过宝贵的合作参与了斗争。

这场斗争必须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上进行，尤其是要使用最有效的武器：各工厂中的行动、工人力量的协调（这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大学生、知识分子等人的参与、罢课和游行示威，以及能对我们的目标产生影响的一切手段。用革命者的榜样，厄内斯特·“切”·格瓦拉今年在哈瓦那举行的拉美团结组织³²会议上的话来说，我们想向所有工人，以及所有加入斗争的人传达，“关键在于投入日益成熟的斗争之决心，在于渴望革命变革之意识，在于确信这一变革之可能性。”

如果说，作为不发达国家人民在帝国主义阶段为打倒资本主义采取的策略，“切”提出“要给压迫势力创造出第二个，第三个，无数个越南”，那么我们呼吁半岛上的所有工人来“创造出第二个，第三个，第……一百个埃切瓦里！”，对压迫我们的法西斯资本主义进行最后的战斗，同时打倒世界上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

到了那一天，我们经历的苦难、受到的迫害，还有我们的斗争，都将得到完全的意义。

³² 拉丁美洲团结组织（La Organización Latinoamericana de Solidaridad, OLAS）是由古巴牵头创立的革命反帝运动组织，1967年8月成立。该组织旨在通过游击战争将革命扩展到整个拉丁美洲地区，并打击美国企图控制拉丁美洲的企图。但是，由于切·格瓦拉在几周后牺牲，使得拉丁美洲团结组织原定的协调全拉美游击运动的设想落空，该组织实际已不复存在。——中译者注



30 Noviembre 1966
15 Mayo 1967

163 días
de lucha
obrero
contra
el capitalismo
fascista
del Estado
Español

Trabajadores
de laminación
de bandas
Echevarri

muestra huelga